

黑色文库 第二十集



唐彼得 著

花旗梦别神州泪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二十集

花旗梦别神州泪

唐彼得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7

花旗梦别神州泪

黑色文库 第二十集

作者/唐彼得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部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插图/ 包晓中 陈国忠

华盛顿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 作者 唐彼得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A Bittersweet Life for an American Chinese

By Peter Tang

Black Series Volume 20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7

www.laogai.org

ISBN 978-1-931550-16-1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25.00

目 录

出版缘起	7
四十年来家国（序）	吴弘达 11
引言	17

第一章 罹 难

童年	23
中学 大学	32
初恋	45
大难降临	54
思考	70

第二章 囚徒生涯

劳教收容所	79
板桥农场 饥饿+苦役	88
板桥农场 劳动、难友和解教	103
蓟县采石场 炼狱	122
探亲	135
蓟县采石场 我涉及的事件	140
苦涩轶事	146
写日记、相亲和学英语	173
漫漫平反路	180

第三章 劫后余生

海洋石油公司	203
自费留学	222
从动荡到稳定	235

第四章 尾声

宋光汉案的终结	247
回归	255
后记	265



高中二年级照



58年交大学生证照



60年大学毕业照



为人民服务
王月书

no. 133488 70年

1970年狱中照



为人民服务
王月书

no. 133488 79

1979年获平反时照



留用员工标准照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融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社会，如果不经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

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辨，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

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7年于华盛顿

四十年来家国 (序)

吴弘达

唐彼得的经历看来十分不幸。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跟他有类似命运的人，却并不罕见。彼得与我年龄上仅差几个月。当我在美国遇到他时，我们彼此之间意气十分相投。更何况他的祖籍是江苏无锡，我们可谓同源，又都在上海长大。他在 1955 年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而我就在他的学院的北面——北京地质学院，也是 1955 级。

在美国大家都各自忙碌，一直到了本世纪初，我在创办劳改基金会的十年之后，于 2002 年又办了观察网站，彼得始终很留心我的工作。他是基金会的劳改犯传记系列《黑色文库》的读者，两三年前，就已经表示愿意在文库中出版他的传记。我们迄今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机场，我转机，他专程来访，不过一个小时的面谈。再一次是今年 6 月 7 日和 8 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反右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彼得来参加了。但是我主办会务，十分忙碌，没顾上同他坐下来促膝长谈。

因此，表面上说来似乎彼此并非相知，但是，细看人生，我们的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唐彼得撰写自传的敬业态度令我肃然起敬，他几经修改，仍然不满意，最后让他的一位文友重新整理，在全书的结构和文字上都下了功夫，终于能将这本朴实无华，却又感性动人的

自传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趁着夜色，一页页读下来，实在难以掩卷。它把我带回到那些年代里。看看书中的人物，哪一个不都是我左右前后的一些人吗？

他阴差阳错逃过了右派这一关。先是幸运地考进了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是国防部军事性质的高校，我当时也曾想去，但政治上，不能符合共产党的条件。唐彼得进去了两年，感到政治压力太大，就要求退出到一般的高等学院。那时正值 1957 年反右开始，北航校方对他就放松了。他的转学使他躲过了反右这一关。然而，不论从出身和性格来看，他是难逃整肃命运的。

1964 年，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分子集团”的一员，有“叛逃共和国之嫌”，被送去劳动教养两年。劳教之后又“安置就业”在劳改队，一直到 1979 年的平反高潮。他比我晚去劳教几年，放出来却是同一年。

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阶段，即 1949 年到 1976 年，全是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指示下运作的，并且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共的中坚分子坚定地执行着毛泽东的政策。这 27 年中，除了 1958 年的包括大跃进的“三面红旗”、1960-1962 的大饥荒以及 1972 年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等大事件外，全国一直不停地在整肃，一个政治运动又一个政治运动，一直到毛泽东以及众多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倒下才算结束。

刚开始是土改，地主、富农被整。中共大规模地掠夺私人财产及土地。那时根本没有法律，以所谓“群众斗争”、“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就是毫无忌惮地杀人。1952 年又开始了三反五反，把全国私营的工商业主全都废了。从 1950 年的镇压反革命一直到 1956 年的肃清反革命，将国民党或其他政治活动分子

清除了。原国民党政权中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幸存，先大后小、一层层、一批批地整。同时又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仅存一点影响的宗教，一个不剩地消灭掉。大批的人被送去劳教，1954年开始有了一个劳改的法律。

按共产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讲，革命胜利了，“阶级敌人”基本上消灭了，应该“安心建设社会主义”了。但是毛泽东又接着搞他的阶级斗争——反右。反右不仅彻底地把几年前共产党支持的民主党派变成了花瓶党，而且把全国大约 20% 的知识分子，即一百来万的知识分子整肃了。反右结束后，1958 年 5 月 1 日大跃进开始前，全国展开三天打麻雀，算是对这场政治运动后果的检查。

1958 年的大跃进，没人敢反对，没人敢有异议。可是现实不会说谎，对荒谬的政策进行反扑。全国老百姓没有饭吃，大批的人饿死，连续三年饥荒，死了三千万。

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的发明，他想重新恢复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整肃掉刘邓以及当年的革命同伴。中国进入最黑暗的时期，生产停滞、教育中断、全国一度陷入近乎内战的状态。几亿人民处在物质赤贫，心灵荒芜、精神迷惘的沉沦中。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两年时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才逐渐尘埃落定，邓小平复出，开始推行改革政策，千千万万的右派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得到“平反”和改正，离开监狱，重获新生。唐彼得是他们其中之一，他不但侥幸活了下来，而且移居美国，可算是个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书的前半部，字字留着血，行行淌着泪，看似平淡，却又触目惊心。书中哪一个章节不能写一出故事？唐彼得在中国的前半生其实也是中国在中共治下的一部社会史。

唐彼得离开中国时，已经是事业颇为成功的专家工程师，

他任职海洋石油公司，为公司设计过难度很高的海面石油平台导管架，并且有时被派往外国进行材料的采购。此时他已经算是享有高待遇和小小特权的专业人才了。但是历经磨难的他，“居安思危”，知道只有在自由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作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有自由的地方才是自己的故乡和祖国。他选择了“自费留学”这条必须自力更生的路，几经周折来到美国。

八十年代初期出国的中国人都是口袋里揣着几十美元和带着挣脱枷锁的决心来到大洋彼岸的。1987年1月唐彼得口袋里有300美元，提着两只大箱子，除了衣服、日用品，还有牙膏、肥皂，在上海机场登机，来到美国车城底特律。开始的头七年，他放下身段，从最低层的打工仔做起，攒集学费。他当过富人家的管家、厨师、司机，派对上的侍应生，出租车司机等等。从来也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因为他敬业、诚信，别人也对他尊重，他的厨艺甚至艺惊四座，被主人不断挽留，但是他依然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读完学位，并进入公司，成为一个白领中产阶级。

唐彼得在美国的奋斗经历也是很典型的，我比他早两年到美国。开始打拼的艰苦时光中，也是有苦有乐，个中滋味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彼得的奋斗创业恰好可以印证我的个人经验，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为太多受过创伤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休养疗伤，整装再发的园地。只要是勤恳努力，正当守法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不仅是栖生之地，它还能提供你家园一般的保护和温暖。

不堪回首，四十年来家国！唐彼得和我这一代的中国人，被自己国家抛弃和伤害过，过了不惑之年才又选择了新的家园。然而就如作者书中所言，“我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是一个

中国人，躯体中始终跳动着一颗中国心，这个中国情是难以磨灭的。”但是，再看看他回到故国故土时的心理状态：“我回国时，即使住进星级饭店，也是恶梦不断，早晨醒来往往搞不清在哪里，是在劳改场所还是在美国家中，这种后遗症也促使我很早就入籍成了美国公民，我入美国籍别无它求，只想为自己增加一顶保护伞，不再无缘无故地送进改造场所。”我深信，当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时，所有国民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人就不必再承受这种情感和精神分割的折磨了。我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

引 言

午夜，大雪纷飞，伸手不见五指，我独自在旷野中行走，踏着沙沙的积雪。去哪里？总该有个目的地，但我不知道我的目标，只为纷飞的雪花而盲目地兴奋。雪花飘在脸上带来冰冷的刺激，我张开手臂，深深地呼吸，真想大声呼喊，私下欣喜这孤独的自由。

“呜，呜，呜……”狼在嗥叫。想起有人说过，狼常在背后用前爪搭在人的肩上，等你回头便咬断你的喉咙。我想如果有爪子搭在肩上，我就抓住它来个前滚翻。我有这样的体操本领吗？哪来视死如归的精神，啊，原来生命已没有太多的价值。

仿佛又在从前的部队。正想着终于回到了真正的社会，一种空虚突然袭来，到处是冷漠和敌意，一丝希望消失得无影无踪。

恐惧纠缠着我，毛骨悚然，看见警察队长脸色铁青，连叫加温，随着喀嚓一声，发出凄厉的喊叫，只见折断的手臂垂了下来。

我左冲右突，一扇扇无形的墙阻挡着我，心中充满绝望。

我推着装满建筑石材的手推车，顺着山坡奔下，艰难地控制着方向。

在田间小道上，一群衣衫褴褛、肩扛铁锹铁镐、腰挂饭具、水杯的鬼魅蹒跚而行。

奇怪，我不是在美国读书吗？怎么又回来了？为什么还要

回来？无限的懊恼揪住我的心，真傻，真傻！怎么这样糊涂，为什么命运这样捉弄我。警察队长恐怕已经知道我来过美国，怎么办？

我跌入深渊，向下飘去，向下飘去，……。

有人在推搡我，我想抓住他，但我无法伸出我的手臂，我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我狂呼着睁开了眼。我在哪里？心中惊恐不已。几分钟之后，我才确信这是我底特律的家，我的夫人正在唤醒我。

一身冷汗，唐突不安。起身走到花园里，微风吹拂树梢，月光透过叶间淡淡地撒在身上，仰望夜空，繁星闪烁。我想起了 1863 年林肯在葛底士堡的演说：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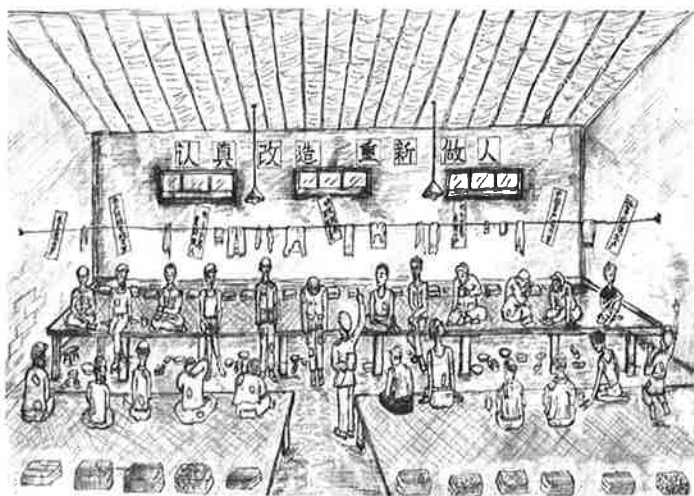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

这个国家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富足最强盛的国家。也许那些内战中的勇士真的保佑着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至少时至今日，经过了二百三十多年，并没有马克斯预言的衰退，反而更加兴旺发达。相比之下，那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灵光一现，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和斯大林的学说“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一样，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的学说，把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卷入红色恐怖的漩涡之中。但独裁统治并没有使社会主义永世长存。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历时 74 年，到 1991 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宣告终结，苏联解体。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称号的中国，也在奉行实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我在那一年进入中学学习，我是和共和国同成长的一代人，然而共和国随即陷入疯狂的年代，我和很多人一样，在疯狂的漩涡中耗尽了青春年华，今天虽然庆幸劫后余生，来到美国也有二十多年，但余悸终未散尽，多少个夜晚，重复上面的梦境。我是如何罹难的呢，说来难以置信，只为我想辞去一份很多人都要羡慕的工作。

第一章 羅 難



(图一) 劳教宿舍学习一瞥。

童 年

还得从我的童年说起。

自我记事起，只有祖父母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祖父母、二哥和我居住在无锡，祖父租了一家杨姓寡妇的厅房作为我们四人的居所，厅房一隔为三，中间作饭厅，我和二哥读书做功课也在这里，一边是祖父母的卧室，另一边放两张小床，是我和二哥睡觉的地方。门前的街上开着一些店铺，有布店、杂货店、五金店、糕团店、茶馆和饭店，人来人往倒也熙熙攘攘，不时传来挑担卖菜、卖鱼肉的拖长了声调的叫卖声。生活很苦，平时素菜米饭，偶尔祖母在肉贩处买了一些熟肉，回来把它切成薄片，这时我就倚在一个破沙发旁看着她切肉，她会说：

“乖孩子，你先尝一片吧，其余留着晚饭时大家一起吃。”

如此美味至今难忘。当有卖熟肉的小贩沿街叫卖时，我和几个邻居小朋友常常围着肉贩的案板等着，希望奇迹出现，祖母会来买肉，给我先尝一片。但多数时候祖母没来，直到肉贩子走了，我和几个小孩才失望地各自回家。

我的父母呢？

大约我出身不久，母亲就一直生病，又赶上日本鬼子打来了，所以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姐姐、三哥到上海去讨生活，祖父母、二哥和我留在无锡。父亲是律师，沦陷后不想为日本

人做事，就做一些房地产中介谋生。祖父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靠租赁祖传的几间房屋为生，做过短期的商店记账、管账之类，父亲在无锡时也买了几栋旧平房，出租给底层平民收些租金，因此家中生活比较拮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恢复律师职业，也接无锡的案件，因此有时来无锡，顺便看看我们，但很少住下。我一直没有见过母亲。

我十岁的一天，刚放学回家，一进门祖母就叫我过去，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她笑嘻嘻地从上到下看着我，祖母说：

“湛宝（我的小名），这就是你的姆妈，快叫姆妈！”

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我羞涩地叫了一声就拔腿跑到外面找小朋友玩了。我一直憧憬和母亲见面，但真见面却又感到陌生，很不自在。后来，外婆告诉我，母亲生下我后就一直重病缠身，最严重的时候，医生告知无药可救，因此把棺材都买好了。母亲从小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早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不断祷告，居然慢慢好转，但身体一直很虚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吃什么都要吐渣，特别是素菜，只嚼不咽，因为她肠胃太弱，只能吸收流质，这也是她一直呆在上海，很少外出走动的原因。她这次来无锡，也并非为了看望我们，而是听说父亲在无锡的事务所雇了一名年轻时髦的女秘书，很不放心，受我舅舅怂恿，特来无锡观察动静。由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与祖父母一起也不很习惯，住了一周就回去了，以后，就是我祖母去世，她也没有再来过无锡。

青少年时期的父亲，生活清苦，但读书勤奋。据说在学校年年名列榜首，得到南京法政大学全额奖学金，免费读完大学法律系。毕业那年，是政府公费派往日本考察的两名优秀学生之一，当年报纸有大幅照片和报道，祖父引以为荣，始终珍藏着这些资料，并以此教育我们弟兄一辈。但父亲从不谈起，只

有一次，说起算命时他有些激动，说在日本考察时，曾遇见一个著名的日本看相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拉住他一定要为他算命，说我父亲的命出奇地好，命中有财，寿过九十，并索要双倍算命钱。这位算命先生说：有的人命不佳，我一分钱也不要。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发过大财，”父亲感慨地对我们说，“但一直很顺当，许多事确是逢凶化吉，可能这位日本先生算的命是得很准的，最后要看我能否活到九十了。”

后来，我被劳教，又过几年，文革中遭到抄家，他在工厂被批斗，生活极为艰难，他虽也怀疑过命运的真伪，但仍受逢凶化吉的预言鼓动，父亲说这是他能挺过来没有自杀的原因。父亲是在九十三岁时过世的，倒也应验了算命者的预言。

父亲曾想让祖父母和我搬到上海住在一起，这样可以省下不少开销，但因祖母和母亲间的婆媳关系不太好而作罢。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母亲是诚心的基督徒，母亲认为佛教为魔鬼操纵，人生观点绝然不同，所以祖母发誓不到上海来。

从祖父开始，就一直谆谆告诫我们，要凭本事吃饭，千万不要涉足政治，政坛朝云暮雨，弄不好就招来杀身之祸。这可能是我家三代清白的一个根源。父亲当律师在那时也是个自由职业者，上海被日寇侵占后，他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放弃了律师事务，为全家生计，做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中介签约人。生活重担迫使他把全家的开销卡得很严，母亲常骂他小气，但父亲我行我素，就是后来家境状况较好了，仍然严格把关，这大概与他从小生活拮据有关。祖母常常讲起一件叫我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父亲刚开始工作时，祖父母还住在乡下，有一年年底父亲回家过年，晚上村里来了几个强盗，闯入祖父家中，把父亲绑

在树上架好柴火，威胁说，如不拿钱出来就点火烧死。父亲坚持说没有钱，拒不交出任何钱财。情况危急，这时有邻人爬到房顶上敲起大锣，高声喊道：“快来人，强盗在这里！”

敲了几下子竟把强盗吓跑了。村人给父亲松了绑。

“大先生，你多少给他们一些，免得受此惊吓。”他们开导说，“多危险，性命要紧啊！”那时乡下对读书人都尊称为大先生。

父亲没有吓坏，一再说：“我真的没钱给他们。”

这一次真是逢凶化吉。

祖父是我初一时中风过世的。他早有高血压，但极少花钱看医生。那时正是无锡解放前后，社会上谣言满天飞，祖父每天都紧张得很，一早就上茶馆去打听消息，中午回来匆匆吃过饭又去了。无锡家中只有祖父母、我和二哥，吃住都极为简陋。我们平时很少吃肉，过年时做的荤菜总要吃元宵节后。早上祖父留几元零钱给祖母买菜和日用品，晚上都要记账，一丝不苟，有时祖母忘了买什么，差了一点对不上账，祖父总要逼着祖母再想，甚至祖母被逼得哭了起来。记得只有我常哭，祖母来安慰我，从未见过祖母也哭，因此这样的情景印象深刻。几分钱的差异必追究到底，这是祖父的严谨，是位好账房先生。

祖父就是因为高血压加心情紧张，又为省钱不看医生，就突然中风，不到一周过世了。不久二哥去上海读大学，只剩我和祖母在一起。

我上初一时，二哥已是医学院二年级学生，他突然得了伤寒，十分严重，由于庸医误人，多吃了消炎药，整个肠胃功能几乎全部丧失，瘦得只剩一个骨架，整天躺在床上，连每天上门卖菜的都对祖母说：

“你们老二看上去不太好，还是看开些，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些吧！否则你将来要懊悔、遗憾一辈子的。”

祖母很急，不断求神拜佛，有人介绍一个寺观道士，能作法求神，专治疑难重病，他要祖母捐出很大一笔钱来做道场，说这样你的二孙子就没事了。那时，祖父已经过世，只有我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没有那么多钱，时值暑假，她就派我一人坐火车去上海要钱。此前我只跟一个哥哥去过一次上海，毫无印象，下了火车也不知道哪一辆电车到静安寺，刚好一辆电车开过来，我问开电车的，到不到静安寺，

“快上，快上！别噜苏！”司机看我一个乡下小孩，很不耐烦地说。我则想他没否定，大概没错就上车了。

电车一直开到了终点站，乘客全下去了，我一看不像印象中的静安寺站，但也只好跟着下了车。问了几个路人，直指往前走，走了约半个小时，才看到印象中的大钟，找到父母家门已是晚上八点多钟，筋疲力尽，还被母亲数落了半天。

“我已天天在祷告。”母亲说。“怎么可以把钱送到邪神那里去，上帝要是光火，反而好不了。”

母亲叫我先住几天，不要给祖母回音。父亲是把钱看得很重的，也不相信鬼神，所以回来一听而过。我还要他们给我回去的车票钱，所以只能等着了。一周之后母亲才给我车钱让我回无锡。

祖母早料到我没有及时回来准是要钱无望，可道士这边一催再催，说是迟了二哥的病就来不及了。祖母把她所有的首饰，一点金戒指和饰物全变卖了，交给道士做了道场。真是奇怪，自那以后二哥居然慢慢好转，逐渐康复，几个月后就回到学校上课了。祖母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果断救了孙子。父母却不知道祖母变卖了自己的私房钱，母亲一再赞美上帝的伟

大，认为是她天天祷告救了儿子。母亲还说，如果不是她坚持不送钱给道士，那么上帝一定发怒，花了钱还害了二哥性命。只有我知道这个秘密，但我小小年龄也不知道谁做对了。歪打正着倒使我有了一种迷茫的信念：世界上大概是有神的，不是上帝就是菩萨，也许两者兼在。此后，在接受无神论和唯物论的长期教育下，我也怀疑过神的存在，但在艰难困苦中，在迷茫无望的日子里，我会不由自主地默默祈祷上苍。日本算命先生对父亲的预言也在我心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既然每个人都有预定的命运，必然有一个主宰的神在。

三年后祖母也因中风过世。祖母从未看过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是高血压，那天做饭时突然倒在厨房地面上，幸好有一位亲戚在场，帮忙请来了医生，虽打针吃药，已是回天无力，不到十天也离我而去。

祖母中风后，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绝对不能到无锡来，因为抓人整人之风正值高潮，所以这事瞒着父亲，只有二哥因为是学医的，才被叫回来看看祖母的病情。那是1952年一个秋天的傍晚，下起了蒙蒙细雨，邻近的店铺早早上好了门板，街上行人寥寂，而我家中聚集了不少人，祖母的遗体正要入棺大殓，我和二哥，以及一些亲友拿着香围绕遗体转圈，就在封棺之前，一个带着大帽子的神秘人突然从后门闯入，一看见祖母遗体已躺在棺材旁，立即跪倒地上，手扶祖母手臂大哭不止。我定神细看原来是父亲。他说：

“今天上午上班后，情绪极乱，一直心神不定，总觉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心想一定要马上来无锡一次，所以立即去火车站买了火车票赶来了。看来正是心灵感应，差一步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待棺材封钉妥当，已是深夜，小城更加寂静，只有雨点敲

打屋面的滴答声，父亲又悄悄离去，乘半夜火车返回上海。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父亲不敢到无锡来有两个原因。

1952年我还是初三的学生，记得无锡街道居民组织已十分严密，邻近街道的店铺和居民住家编在同一个街道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下，每周都要开全体居民会，每家必须有一名代表参加会议，或听报告，或传达文件。我家只有年迈小脚的祖母和我，我虽是小孩，也只好作为一家代表叫去开会。街委的头头都是上面指定的，有的是店里斗争性强的青年店员（老板是资本家，当然不允许做街道工作），有的是出身贫苦人家又能说会道的妇女。这些人一脸严肃，很少有笑脸。我家前面一片小五金店姓张的学徒就做了这个街的委员，他原先似乎是很听话的学徒，老板也喜欢他，把他升为店员。当三反五反运动有如疾风暴雨一般倾泄而下时，这个学徒就成了店代表、街委员，每天把他的原老板骂得狗血喷头。祖母感叹地说：

“这张后生原先看起来很和善、听话，是个好后生子，现在面相全变了，一副凶恶相，怎么变得这么快。”

我家前面是一条不长但还热闹的街道，每家店堂中都挂满了诸如“打倒贼老板”，“×××你五毒俱全，再不彻底交待，死路一条！”，“不斗垮你，誓不罢休！”等标语和大横幅，店堂业务全由店员管理，店老板都关在里面账房间或小屋中写坦白交代书，写不出偷税漏税或坑害别人的事实，不许回家，不给饭吃。报纸上、大广播中、街上张贴的公告，铺天盖地都是公审和宣判死刑的贼老板。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初次涉足社会就陷入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惶恐不安，心情沉重。每次街道开会，我只是低头坐着，有时还非常紧张，因为我想起了父亲曾经是律师，现在又经营一家建筑材料厂，他的处境怎样？

一次街道开会，宣读本街道辖内的一个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罪状，诸如怎样偷税漏税、欺骗政府等等，并宣告已逮捕法办，内中提到该资本家解放前曾买通一黑律师，经常帮他打官司，此黑律师也是我们街道辖内的，暂不宣布他的名字。我心中一阵紧张。后来有一个亲戚是邻近街道的委员，偷偷跑来告诉祖母说，这宣读材料上所指的律师就是我父亲，要祖母转告父亲没事不要到无锡来，以免麻烦。我不明白律师为何不能为当事人辩护和打官司。

还有一件事更促使父亲不能来无锡看望我们。父亲主要在上海当执业律师，无锡的事务所只占很小一部分。需要开庭或有重大案件必须律师亲自出席才到无锡来，所以无锡办事处聘了一位叫杨惠平的中年人当助理，杨出身贫寒，由寡母带大，只有高中程度，但人极聪明，能说会道，帮助父亲办了不少事。解放前杨年轻时，因生活无着，曾参加过汪伪军，做过两年文职工作，因此 51 年镇反时把杨抓了起来，判 20 年，送青海劳改。由于解放前和解放后他曾给父亲做了几年事，父亲就脱不了干系，有知情不报和包庇留用反革命的嫌疑，写了不少检查和交代材料，很长一段时间提心吊胆。

父亲认为自己从不参与政治，从未加入任何政党团体，做律师也仅为商人工作，不涉及政治，解放后律师做不成了，改为经商，与人合股开一家小型油毡厂。他因为懂法律，做事一向规规矩矩，不做犯法的事，心想共产党执政也不至于受到整肃，所以一开始他每月都要来无锡一、二次，看望祖母和亲友。但三反五反过后，无锡的政治气氛比上海还严，父亲是律师，律师也属反动阶级，受关、管、压的人数很多，而上海因鱼龙混杂，要打击的人太多，反到比无锡松多了。自从发生了上面的两件事，大家劝他无事不要到无锡来，他才一直克制自

己，直到祖母大殓突然闯入，见了祖母最后一面。

这位杨惠平在青海劳改了 20 年，再留场继续改造，直到 79 年得到所谓的“改正”。有关部门查他当年只是混饭吃，做了两年伪军中无衔无职的文书工作，才认为判得过重，安排他回老家江阴县自谋生路。他回来后，专门到上海看望父母，感谢父亲当年没有落井下石，一再说明他没有做过坏事，也谈到了在青海劳改时的凄惨景况，死人无数，他也几次从死亡边缘爬了过来，靠着他能说会道的天分，照他的原话是“对领导、队长马屁拍足，好话说尽”，才被安排做了几年轻松一点的劳动，以致不曾饿死、累死。他说：

“现在‘改正’了，虽然白受 20 多年苦，但还知足，总算没有老死在戈壁滩上。”

他刚回来，生活够苦，父母送了一些钱物给他。后来听说他在江阴老家从小本生意做起，靠着脑子灵活，吃得起苦，不久自立门户，经营批发一些农用工业品，父母过世后再没有联系。

我年轻的心灵百思不解，父亲一生正直，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从未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竟然母亲过世都不敢回来！上海无锡相距不过百多里地，为何差别如此巨大，这是怎样的世道？我小小年龄已经看到一连串的运动：斗地主富农的土改运动，抓反革命的镇反运动，斗资本家和小店主的三反五反运动。我弄不懂这个新中国为何如此热衷于斗争，为何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安全、平静的环境中。当时我家住在无锡平民集中的地区，远亲近邻有不少叔叔、伯伯被抓被判，好几家有自杀的人，我的心中滋生着恐怖和压抑，希望早早离开无锡这个童年生活的地方。

中学 大学

1952 年秋，祖母过世后，无锡的家只剩我一人。那时我读高一，待学期结束，我就到了上海父母处，转入附近的市立中学。同学中出身有钱家庭的很多，他们把无锡看似乡下，我讲的是一口无锡话，穿的是哥哥们穿剩下来的过时旧衣服，常受几个调皮同学的嘲弄，称我“无锡阿大”，因戇大有些难听，故抬举我为“阿大”。上语文课时常起哄，推荐我来念课文，我一口无锡方言，引得哄堂大笑。一个学期后，我深感必须赶快适应环境，才能融合在上海的同学中，于是拼命学上海话，认真做功课。胶州路北京西路口有一个图书馆，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在这里度过。大概一年以后，我也有了一口上海腔，也有了年青人的时行俚语，学习成绩也很好，此后，“无锡阿大”的绰号似乎慢慢消失，仅在谈笑中找乐了。

上海解放后，律师行业被取缔。父亲找了两个朋友开设了一家做建筑材料油毛毡的工厂。当时我的两个舅舅也没有工作，就进了油毛毡厂，他俩常借工厂名义去饭店请客吃饭。父亲严格掌管财务，坚决不给他们报销，母亲劝说也不行，刹住了乱吃乱报的风气，工厂逐步走入正道，业务也发展很快。但好景不长，马上就是三反五反，接着公私合营。父亲六十多岁了，下放到最脏的麻袋车间去整理打扫破麻袋，每天满身泥灰，蓬头垢脸，很晚回家。

“人人都一样，我也过得下去。”他说。

但我们全家都感到心酸，还怕他倒下，他是家中唯一的支

柱，他要倒下，全家就完了，总算他看得开，也并不害怕。

1955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一天父亲下班，兴冲冲回到家里对我说：

“你考取了大学，我给你一件好东西作纪念。”说罢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只手表。他还说：“我跑了好几家钟表摊才找到这一块！”

我接过一看是两针半的早已过时的式样，情绪虽然高不起来，但在父亲面前还是装得满脸笑容，像是很高兴的样子收了起来。到了北京，见到许多同学戴的都是长三针的手表。

“现在哪里还有短三针的表，”有的同学笑我说，“你是哪个旧货摊上淘来的吧！”

那时年轻，虚荣心强，我只好把它放在箱子里。但我了解父亲的为人，还有他的期待。这块表一直陪我到大学毕业，工作后我才自己买了一块冒牌进口全钢防水表，虽然每天要快三分钟，还是戴在手上充样子。

航空学院是培养国防工业人才的，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报考，必须由学校选送。不知为什么，我有幸被抬举选中，可能因为我家祖宗三代比较清白，找不出地富反坏和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学习成绩也较好。许多同学为被选中而兴高采烈，一些成绩比我好的同学还为未被选上而懊恼万分，然而我却十分郁闷，仿佛有一个声音正在呼唤我：“前途险恶啊，你要谨慎。”我知道自己从小在无锡这样的“野地”生活，祖父母也不管我，一向自由散漫惯了，喜欢自作主张，后来到上海和父母在一起尚且感到不自在，有压抑感，我绝不是进军工大学当军人的料子，我不适应严格的纪律和管束，因此我不想进军工大学，我要求学校把这个名额让给别同学，校长找我谈话：

“你这个傻小子，这么好的机会，别人求之不得，你怎么

会不想去？反过来说，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是经严格挑选的，你不想去是不行的，除非你不想上大学。”

事情明摆着，不去航院就读不成大学，党的分配是不能违背的。这样，我带了行李和父亲给我的手表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还没报到，院部已经贴出了新生分配名单，我分在自动化机械专业。虽然这个专业很合我口味，但心中产生反感，为什么不预先征求学生的志愿和选择？为什么把学生像棋子一样乱摆？学校说这是按照每个人的特点和情况所作的最好分配，奇怪，分配者依据什么确定我适合学自动化而不适合比如机关枪呢？当然我只能到指定的系里、指定的班级去报到。航空学院的学生都是保送或选送来的，也有一些调干生。我进班后才知道，虽然多数学生才十八、九岁，但几乎半数已是党员，高干子弟不少，全班只有我和另一个上海来的学生不是团员。政治活动很多，下课后党团员经常要留下开会，这时，我和那一位非团员总是灰溜溜地赶快冲出教室，场面十分尴尬。后来那一位也入团了，只有我是上海来的又有些散漫，需要考验，成了唯一的非党团员群众，从此，冲出教室的场面因唯一性而更加尴尬。

众所周知，那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整风、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

56年苏联出动大批坦克、军队镇压匈牙利动乱，赤裸裸地干涉他国，引起广大学生争议和辩论。航院受到北大、清华等校的影响，争论也十分火热，校方宣布停课数天进行讨论，想引导学生支持苏联的行动，当时中国和苏联还是共产主义的亲密盟友。校园中首次出现了简易木板柱子搭成的讲台，经常有人上台表达自己的观点。许多学生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侵略，有

人在教育大楼外墙悬挂“反对苏联出兵干涉匈牙利内政”、“苏联出兵匈牙利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等大条幅。我班的班长王立伦，是团员兼支委，他喜欢说说道道，有一个既拥护中共中央又有自己看法的观点，认为苏联出兵“合情合理不合法”，之所以合情合理，是因为匈牙利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能坐视兄弟国家被“暴徒”推翻社会主义政权；不合法是因为出兵外国进行镇压，不符国际法。很多党团员有这种倾向，只有少数党团骨干秉承上面的意图，表示合情合理也合法。

第二年，整风反右时，凡对苏联出兵持反对态度的都打成了右派，王立伦也凭着他的“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观点成了右派。航院对右派的处理，重则劳改、劳教，轻则强制转往其他大学，航院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国防保密单位，不容右派混杂其间。王立伦被转到了钢铁学院，与其他右派一样受尽了批斗、监督劳动之苦。

还有一个东北学生叫马云凤，是男生，只是名字像女的，十分能讲。每天上台发表观点，毛泽东也点过他的名。后来航院把他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判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刑事罪犯，发送劳改。期满后马在东北的劳改场所强制留用，内心极度抵触和不满。文革期间他设法溜进北京，某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企图拦劫一辆公交车闯入人群，以造成政治事件，未果。没几天他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从仅仅的对政治事件的看法被迫发展到如此下场，是谁之过？谁之罪？

我在班上极少发言，一是不喜欢这些政治术语和政治运动，二是受祖父从小教导不要涉足政治的影响。班上党团骨干，开口发言动辄半小时的比比皆是，个个都是理论家。他们把我看作自由散漫的上海学生，政治上没有上进心，只要看看

我进校时全班 30 人我是仅有的两名非党非团人士之一，而半年后仅剩我一个特殊游民就可想而知了。在大鸣大放中，我是各个论坛的听众，自认为没有那么多理论可以上台讲几句。幸好这样，这使我在反右中没有受到整肃。

面对众多的政治活动，我只能采取能躲则躲的方针，经常泡在图书馆。由此，我用在正课的时间较多，加之中学的基础扎实，所以头两年的大部分课程，我的成绩都是 A（那时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入学两年后，校方发觉招收的学生太多了，将来无法分配到相关单位去，另外因调干生、农村生多，也想把成绩太差学生转走，所以允许少量有特殊情况的学生转出去。当时有一名辛同学，他的父亲是造船界的权威，交通大学教授，一直要他儿子转到交通大学去，将来继承父业，他的转学申请已经提出。突然一个声音又在呼唤我：“违避险恶，正是时机！”我立即行动起来，也马上提出了申请。我知道如果一步步一级级从班上开始申请，要经大班支部，再报系总支，然后报院部，每级都要找你谈话，只要一级不批，前功尽弃，所以我装作不懂，直接把申请书交给了院部学生科负责人，同时托交大的人在交大联系。还好，院部并未与大班支部联系，直接把公函发到了交大，和政治运动相比，转学不过是行政小事。那时约有十名学生申请转交大，结果交通大学只批准了我和辛同学。我因躲避政治运动泡图书馆，有个好成绩而被接收，真是歪打正着。直到交大来了调动函，系里和班里的支部才知道，要阻拦已来不及。好在我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右派言论，他们也就默认了。临走前，班支部书记李丕丑特地找我谈话，问我到底什么原因要离开航院，我也直告：

“我觉得在航院政治压力太大，我唯一一个非团员，你们一开会，我就得孤零零地离开教室，很尴尬。”

他倒作了自我检讨，说没有在政治上更好地关心我，临走前还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事过四十多年后，2000年我回国时，毕业后留京的一些同学请我会餐，他们的谈论简直吓我一跳，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洗礼，在他们那里再听不到政治术语，而针砭时弊，议论种种，倒是直率和真诚了，比起我的思想更不知右了多少倍，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我对朋友说：

“我倒简直成了他们中的左派，他们统统都是右派，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似乎时空倒转了。”

还有使我吃惊的是他们很多人的子女早就来美读书、工作、入籍了。这些当年响当当的共产主义信徒怎么都把子女送到了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国家来了？！我感触良深。

转学回到上海，我庆幸摆脱了高度机密的军工系统，而且又进入上海名校。要知道当时实现转学是难以想象的事，而我居然成功，亲戚朋友似乎也高看我一眼，觉得这个无锡出来的乡下小子还有一套。其实无非是巧合和机缘。

1957年9月，我正式转入交大造船系三年级，因宿舍已满我被允许暂住家中走读，这倒使我不大和同学接触，在不久进行的第二次反右中避免了不少麻烦。我所在的年级是上海市高校中揪出右派比例最高的，全年级共有170多学生，揪出右派21名，坏分子3名，这三名是因为右派言论太少，故降级戴坏分子帽子，24人占年级总人数的14%，远远超过中央所定的指标。大班党支部书记朱某某是大连船厂出来的调干生，大家才20岁，而他已是30多岁了，正可谓斗争经验丰富，他从来不笑，严肃阴沉，有的同学背后称他为“阎王”，每个小班都有几名党团骨干或争取入党者是他的帮手，整天搜集同学的言论材料，他揪得越多，就是党性越强，立场越坚定，成绩越大。

他的帮手们把班里学生一个个排队，一个个揪，再让那些挨整的学生互相揭发，于是一揪就是一串。我班有一复员军人学生李某某，每天穿一身褪色军装，整天策划如何揪人，平时与他有意见的、他看不上的都是他揪右派的对象。一楼 125 号寝室住着六个学生，相互关系较好，作风有些散漫，买饭都从窗户爬进爬出。他们一个一个挨整，除一人算交代好一点，“右派”言论也少一些，才从轻发落，打成坏分子。其余全部打成右派，其中一个叫周义钧的，是共青团员，李某某说团员与右派同流合污，必须加重处理，最后发配新疆监督劳动。没有人知道周到底有哪些右派言论，没有人知道李某某如何罗织罪状向上报告，只知道周是共青团员，不必经过法院，不必经过派出所，不需任何审查机构就可以定罪。这样，就凭一个以整人为乐、用整人爬升的李某某罗织的罪状，就轻而易举地把一个人发配新疆。1979 年右派改正后，别人都有了消息，唯独周没有任何音信，不少人推测他已死在新疆。直到最近此书稿快完成时，突从网上见到被原交大送往新疆劳动改造的右派师生中、尚活着的 37 人联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对右派冤案彻底改正、赔偿被克扣的工资和精神损失时，才发现签名者中有周义钧。老同学之间互相告知，深深为他能活过如此艰难辛酸的一段人生而庆幸。

该宿舍还有一个叫朱礼逊的，听到有人经常停课、屡屡对打扫卫生发牢骚，朱就说：

“叫你去干你就笑着去干，不高兴不也一样要去嘛。发牢骚难免留下祸根，倒不如装着笑脸，还让人觉得你很进步，政治觉悟高，何乐而不为！”

朱平时喜听苏州评弹说书，56 年时有一次工资调升，为感谢共产党，各单位都开感谢与庆祝会。朱在寝室中学着评弹腔

调唱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喊了几百趟，工钱只涨了 5 元！”其实他只是调侃而已，但到反右时就成了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右派言论。

因找不到朱的其他右派言论，就凭这两句话朱被打成典型的两面派右派分子。这算轻罪，被处理为留校察看，每天扫厕所、擦地板，边受监督劳动边学习，每隔几天都要受监管他们的党团专人训话和叱责。他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一小机械厂，专业全不对口，但他专心学习，技术过硬，后来成了一个大厂的总工程师。文革中，因是脱帽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后下放监督劳动。他夫人是同厂的，惊吓过度，精神状态长期不正常，成了废人。朱因精神压抑，猛抽香烟，60 岁不到就得肺癌离世了。

据统计，当年揪出的 24 人中，有 6 人劳动改造（带右派帽子后升级为反革命），5 人监督劳动，或者下乡，或者送新疆，其余 13 人留校察看。其中至少有两名右派毕业后分配到边远厂矿，但当地厂矿党委告诉他们，档案中找不到任何右派言论，不知为何划成右派，党委书记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按既定的右派来办。更有甚者，几年前遇到的两位在大学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中学同学，在校被监督劳动多年，工作后很多年一直拿着右派生活费工资，长期未曾摘帽。直到 1978 年右派大批摘帽时其单位党委才告知他们档案中未有戴右派的审批材料，所以当年未曾戴上帽子，既无戴上如何可摘？只好不了了之。实是天方夜谭似的笑话。这两人是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方单位，近廿年受到非人待遇，是可恨？抑是可悲？

58 年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全校各系一律停课，24 小时炼钢，名义上分两班倒，但下班后还要备料、清理、打扫，每天至多只能睡 2~3 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到处是大幅标语：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位学结构的罗教授，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分到我们班上（他的太太是著名舞蹈家胡蓉蓉）。炼钢的活又脏又累，考虑到他刚从美国回来吃不起苦，班上照顾他让他拔地上的草，搞环境卫生，但作息时间必须随班上的安排。他跪在地上一把一把地拔草，经常深更半夜才被允许回家，晚上已经没有公交车，要骑 45 分钟自行车才能到家，睡 3 个小时又要赶来上早班，他常常叹气，但不敢说一句牢骚话，同学间私下议论：

“这留美博士居然能跟上形势，也没有一句右派言论！”

一次连续干了两周，党支部发善心，给大家休息一天，我大喜过望，夜班上完就赶到大光明电影院去看早场，看的是一部苏联得奖影片。我进影院不到 5 分钟就在座位上呼呼睡着了，直到电影散场因挡着别人离场，才硬被叫醒，电影什么都没有看到，连片名也记不起来，浪费了一张票钱。

居民住家的铁门、铁栅栏、门环、炒锅、……，只要是铁的东西，全都拆下来，扔进小高炉。高超的谋略！一夜之间实现钢产量翻翻，15 年，甚至 3 年赶超英国，成为工业强国！其实我们只是为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夸下的海口打肿脸冲胖子，炼出来的钢材就像一堆狗屎，还不如投进去的铁块、铁条、铁制品，那倒是货真价实的铁，但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没有人敢怀疑这不是钢，面对一炉炉废物，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高呼“我们炼出好钢来了！”“大跃进万岁！”

59 年初的一天，学校召开全系大会，宣称在一厕所内发现一条反动标语，写的什么不予公开，只有总支书记以上的人才知内情。全校其它各系也分别召开大会，要用群众运动来揪出这个反革命分子，7~8 千学生一律停课，执行这个紧急任务。

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停课也是家常便饭，学生以班为单位，背靠背交代发现标语的那两天的活动和证明人，并要每个人在纸上写下规定的几个字，估计这几个字是从标语上摘选出来的，以查对笔迹。有的人找不到某段时间的证明人，就被隔离帮助。搞了两周，各系都有一些找不到证人或笔迹可疑的人，于是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交代和帮助。各个教室、走廊、大厅都张贴着大条幅：“你不主动交代，只有死路一条！”“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校如临大敌，气氛阴森，就是平时最爱逗人开玩笑的同学也收起了幽默，人人严肃而恐慌。过了一阵，也没听说查到了写标语的人，总之这事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了，但给整个交大留下了阶级斗争的恐怖气氛。

我属于随大流的中间阶层，是常被帮助的对象。整风、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经常停课，根本无法安心学习。右派学生是我们的镜子，谁也不敢出一句怨言，都得“积极地”跟着运动跑。也许因为我的记忆力好，背书能力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等课程我都考得很好。当时早已在宣扬一切要政治挂帅，宣称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选是指导一切工作的准绳等等。班上一个党员调干生和我住一个寝室，对我印象不错，认为我是无锡乡下出身的，为人实在，许多上海学生他是看不惯的。为了一切都与政治挂钩，他就说我之所以功课好，就是因为政治上要求进步，是努力学习毛著的结果，几次要我在年级大会上讲活学活用毛著的体会，我只能挖空心思，借来毛选硬作联系，讲述我通过学习毛著，提高了我的学习动力，改造了我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坏作风等八股式体会。回想起来，宗教拜神的狂热，当年已经兴起，至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以

致落笔开口必先毛主席语录，无时无刻都要手捧红书念念有词。就这样，我平安通过了运动，直到毕业。

四年级下学期和五年级逐渐恢复上课，我读书学习的热情特别高，求知欲如饥似渴，五年级毕业设计，我被列入申连线高速客轮的设计组，任设计组长。其时的设计项目许多都是大跃进的产物，与船舶毫无关系，而我们的项目却是本身的专业，所以我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时间，英语翻译的能力也在这一段得到快速提升。学校请了外单位的权威人士组成答辩委员会，对我们的设计进行评审和答辩，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出色地完成了答辩，得到高分 A。那时对前景充满希望，信心十足。

光阴荏苒，一晃到了 1960 年，毕业在即，毕业后选择什么工作又是人生的一大关键。校方发下一张志愿表，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必须填上“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任何个人志愿和意向都不许填写。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每每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也明白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的最后写下的高昂词句：“九千万人用一致的投票证实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命中注定，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又被分配去部队。那个声音又一次呼唤我：“前途险恶啊，前途险恶！”我自知生性不宜过枯燥严肃的军营生活，听不进那么多华丽空洞的政治词藻，我绝不能当好一个军人，我要求学校改变去部队的分配方案。我和中学毕业时一样犯傻了，以为那神秘的提示，会保佑幸运的降临，如同转学交大一般。正好一个姓李的同学，很想进部队，他觉得部队待遇好，一身免费军装，又很神气。我就鼓动他一起到系里要求互调。我得到这样的回答：

“这是党的安排，是按你们个人情况的最佳分配，怎么可

以对调！是你们听党的还是党要听你们的？”根本没有商量余地。

有一个和我不错的党员同学对我说：

“谁叫你祖宗三代都很清白，这样的出身连党团员中也不多。当初你中学毕业派去军工院校不是偶然的，现在大学毕业分配去部队也是必然的。你逃不脱进保密单位的命运，安心去吧！”

交大毕业时年级中的党团书记、支部委员大多数都“分配”留校当教师或作研究生。其中不少人学习成绩很差，是靠那两年运动多、不考试而混上来的。那时提倡所谓又红又专，又说什么红了就会专。大学要培养红色专家就先要有红色的教师，这些党团骨干本身就抱着极大私心好留在上海大学中工作。在如此荒唐的政策下，其他大学也一样。很多年以后，当年的这些学生党团书记、委员都已冠上了某某教授或副教授的职称了，年头混到了，教授的桂冠自然就戴上了。反观数十年来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平、学术、科研水平为何如此之低？很少创新、极少有突出贡献的学术家、科学家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其根源是什么！

前述这个专门整人的大连船厂调干生朱 XX，平时大多时间在搞运动、整人，很少上课学习，但毕业时也留校当教师，并当上了党委委员，权倾一时，受他整肃的人不计其数。谁知世事无常、物极必反，在文革派系斗争炽热时，另一方派系查出这位朱 xx 曾在苏联驻东北的一个情报机构干过几年，名正言顺把朱 xx 揪出来定为暗藏的苏修特务，由上海军管会处理，在提篮桥监狱坐了八年牢。同学们知道了都说他作孽太多、如今是报应临头！是活该！无人同情！八年后才查实他是在国民党时代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才给他平反改正。出狱时一身病

痛，头发全白，从此气焰不再。头两次他来参加每年一度的同学会，已无人再对他感兴趣，他也终于感到了大家的冷漠，以后再也不来参加同学间的叙旧活动了。有些当年跟随他整人的“积极分子”经过文革挨斗挨整的反思，内心也有所愧疚，每次老同学聚会不再喳喳发言，照相时主动站在人后。这也算一段后话。



作者（右）在大学宿舍前和同学拉小提琴。那年18岁。

初 恋

我在大学时爱好手风琴，1959年的秋天，我读到大四的时候，我的演奏技巧已经相当熟练了，在上海高校学生文艺汇报演出中，担任了交大女声两重唱的伴奏。汇报演出在华山路小剧场举行，我顺便回了家，从我家到小剧场很近，吃过晚饭，我就散着步向剧场走去，夏日难忍的酷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秋风带着凉意吹来，倍感爽快，道旁的梧桐树也精神抖擞地伸展着繁茂的枝叶，路灯撒下朦胧的光华。华山路上一排西式住宅虽不豪华却十分优雅，听说蔡元培先生曾居住该弄内，再过去就到了小剧场。当时中苏关系还很热火，我们的二重唱都选苏联抒情歌曲，共三首：红莓花开，山楂树和小路。我们组演出完后，上海第一医学院合唱队里走过来一位女同学，白色的连衣裙衬托出她苗条的身材，我正在欣赏这油画一样的画面时，不料她竟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们的伴奏等到现在还没来，队长要我问你，能不能帮我们伴奏一下。”她期待着，绯红映上了她的脸庞。

不用说，我欣然同意，问过曲目，稍稍看了看谱，我们就登台了。还好，一切正常，下场后她们的队长向我表示感谢，我却没找到刚才的女同学，只留下一丝甜蜜的印象。

一个周末我沿着南京西路信步逛去，有轨电车绕了一个弯驶进静安寺终点站，那里并列有数根轨道，乘客有序地排着队循序而上。相比之下，在北京时，我从市区回学校，途经西直门，等候公共汽车队伍足足百余米长，人们蜂拥而上，车厢

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不禁感叹上海真有大城市的风貌，当然不是后来的上海，那时已人满为患，挤车的劲头与当时的北京也不相上下。又有一辆电车叮当作响地启动了，我决定不乘电车，沿街步行。很快到了中苏友好大厦（现名上海展览馆），塔顶金色的五星闪闪发光。记得最初开馆的日子，我们中学组织了集体参观，豪华的宫殿令我们欣喜不已，仿佛进入了一个神话世界，我又想起展出的那张题名为“优生”的油画，女生穿着白色连衣裙，娴静端庄，朴实自信，当时仿佛一道明亮的光彩照入我的心田，使我伫立良久才依依离去。这个形象又变成了演出会上邀我伴奏的女同学，一样的连衣裙，一样的娴静。到了南京西路江宁路口，我寻找那个室内旱冰场，中学时在那里组织过滑冰。啊，对面一家旧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常能找到一些便宜的好书。我步入店堂，眼前闪过一个似曾熟悉的身影，白色连衣裙，那不就是油画里的“优生”吗！那不就是演出会上邀我伴奏的女同学吗！普希金的诗句油然浮现：

“我记得那每秒的一瞬间，

那时候我遇见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啊！正巧，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激动地说，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也常来这里？”她很快看了我一眼。

“我住在静安寺，离这里近，没事就来看看。”

“我也住在静安区。”

于是我们通报了姓名，她叫郑瑛，和我同一届。

之后，我们经常约会了。有时一起散步，我们喜欢到衡山路、长乐路或汾阳路去，浓密的梧桐树下散发着静谧温馨的气

氛，小楼里亮出朦胧的灯光，有时还传来隐约的琴声，街心的普希金铜像荡漾着梦幻的诗意。

人生无非事业和爱情两件大事，我天生不是轰轰烈烈、创建丰功伟业的人，但我也不是庸碌好闲、贪得懒做的人，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我热爱我的专业，毕业时领衔设计高速客轮的成功鼓舞着我，我向往着从事船舶设计的事业。我珍惜我的爱情，我和郑瑛的感情日益增长，我们双方都憧憬着建立幸福的家庭，营造温馨和谐的生活。到大五毕业前，我们的婚事基本定下了，双方的家长也十分赞同我们的婚姻。她的祖父曾是上海名医，父亲早年留美，是政协委员，母亲在上海、香港两头住。他们在海外、香港的亲友不少，有一个姨母终身未嫁，在香港一家普通医院做医师，郑瑛自小过继给姨母。然而我的心头却放不下一件事，毕业分配全由党支部决定，要是谁有女友或已经结婚的，就故意分配到两地，这是对于学生谈恋爱的一种警戒，所以我俩不能把这个关系公开。最后还好，我由总后勤部转分到了 253 部队，当时部队驻地还在上海，她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住院医师。

到达部队，我满心以为将从事与军舰有关的设计或科研工作，不料我被分配到连队，教操作机帆船的士兵看零件图和机件维护，毕业设计时的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顿时沉落。我所在系的系主任是张青武少校（后提升为中校），是解放战争中参军当兵的，入党早，一路提升得很快，他对下属干部一律像对小兵一样管得很严，周一到周六每天清晨把全体人员集中到操场跑步、练操，八小时下班后都要去垦地种菜，家属不在营区的，平时都不准回家，只有周六种完菜后才可请假回去，但周日傍晚种菜前必须赶回营地。我不习惯这种生活，一到周六就

想赶快回家去，他几次正告我说：

“来到部队是干革命工作，不要总往家里跑！这很不好。”

进入新单位都要填写表格，这种表格，大到政府机关，小到里弄居民，每人都要填写，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表格，这张表格确定了一个人的成份等级：地富反坏右、资产家、小业主、中农、贫农、工人、党员、团员，等等，谎报就有可能遭来大祸。我如实填报了女友的状况，不久政治部主任对我说：

“你的女友有港澳关系，她的姨母常住香港，不能批准，赶快散伙。组织上可以为你物色一个出身贫苦的党员姑娘。你的家庭虽然没有政治问题，但你父亲是私方经理，正需要一个出身贫苦的党员配偶来教育你。”

“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了，不是来部队后找的。”我申辩说，“我们的关系对双方家长和亲友都公开了，不能随便散伙。”

系主任张青武吓唬我说：“你要是找了这个有海外关系的郑瑛，海外特务就会天天盯着你，我们保卫科也要天天跟着你，这怎么行！”

不想刚来部队，阴霾已经聚集，我沉入迷茫之中。当时大学生进部队都要填一份参军申请书，以示“自愿”，我就坚持先不参军，不填这张申请书，所以我一直没有正式参军。每天早操，还有下班后种菜，都是一色黄军装，唯独我一个蓝布中山装混杂其间，十分触目和别扭。我曾幼稚地想，这种情景部队也会感到尴尬，长此以往就会放我离开。

我进部队时才 22 岁，是教研室最年轻的一个。但以系主任为首，都称呼我“老唐”，而很多 30 多岁、甚至 40 岁的其他干部却称“小张”、“小饶”。似乎本末倒置。时间长了我才

发现内中含意，凡不是党员者，大多“尊称”你为“老x”，实为异类也，对我则更是视作不同于他们的怪异了。

部队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很多入不了党，长期的磨练下，个个都是唯唯诺诺，孤独落漠，连面部的表情都僵化似机器人。长期的部队生活已给他们刻骨教训，只能规规矩矩，叫啥干啥，绝不能有自己的个人想法和观点。他们对我常注入同情和鼓励的眼神，但从不敢过多说一句真正内心话。我深感如自己长期在这种部队待下去，则完全会变成同他们一样的机械人，心中更是害怕不已，更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尽早离开的决心。

干部部何部长问我：“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要补助工资没问题，只要你参军，你提多少，我就批多少。”又说：“女朋友的事我们还可以慢慢了解，也许以后会批。”

我不会就此上当，参了军更会用军纪军法来对待我，听说以前就有数名军官坚持要和政治部没有批准的女友保持关系，有的私下结了婚，结果不是被发配到北大荒，就是开除军籍送监督劳动。不久政治部一助理来提一位上校副校长的女儿，对我说：

“你是少有的知识分子，如果和这位高级军官的女儿谈成，将来很快会提升为校级甚至将级军官。”

我坚持说我和郑英已经定下，对双方家长亲友已经公开，不能随便散伙。但我们无法结婚，我的户口早就进入部队作为军人编制，部队根本不开证明。部队还派了两名干部去做郑瑛的工作，要她主动和我断绝关系，好让我死心。郑瑛给了他俩一个硬钉子：

“你们共产党员和解放军一再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的自由？”

说得两人张口结舌，无法解释。

历史已经翻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还在演出封建的包办婚姻！从我受教育起，从不怀疑人生最起码的权利就是婚姻自由，就是当年的婚姻法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不得破坏婚姻自由”，我的婚姻怎么就要由党来包办？如果说军队这个部门的要求必须特别严格，我宁愿放弃这样的荣誉和地位。从一开始我就未想过高攀显赫的军事要职，我愿意退出军队，从事民航工作。殊不知那个年代个人提出调动工作是千难万难的，我们毕业时不是人人都要“自愿”填写一份服从组织分配的表格吗，一旦作了分配，就是你终身的工作和居住地，除非组织需要调动。一切由组织、领导决定。我虽年轻，但也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深知和领导稍不一致，就有被整肃的可能。当年在学校中，不是年仅十八、九岁的学生只因一句很随便的话，就被带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教，或送到新疆去改造吗！但我在部队已经是拒绝参军、穿着蓝布中山装的异类，我和领导已经有了隔阂，我只有保持沉默，不再提及女友或婚嫁，更把专业对口问题束之高阁，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避免让人找到茬子。同部队中一个学起重机设计的裘姓同学，被派到仓库做管理，该同学认为这简直是胡来，起重机设计和仓库管理员风马牛不相及，不愿干。政委找他说：

“仓库有不少起重机，咋说你专业不对口？军人要以服从为第一，工作已分配，不能随便调动。”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条例下，这个同学也就不敢再说什么，只好默默地在那里呆着了。他的例子使我清楚现在绝不是要求专业对口的时机。

但我私下尽力托老师、同学帮我寻找能够接受我的单位，或寻找对调者。曾有好几个大学和科研单位主动来函调我，大

连海运学院还提出由一政治历史清白的党员来对调，但一律被部队拒绝，他们说，调出去没门儿，调进来可以考虑，部队需要人，绝不能调出去。那时的政策是加强部队的知识化、现代化，吸收优秀知识青年入伍，每年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不少学生。我多次向上级部队反映，信件均以转回本部队告终。在领导眼里，反倒平添一条罪名：“不安心部队工作，思想不纯”。走到这一步，别提什么理想和造船事业了，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辞职，这是最后、最险的一条路了，因为辞职回家只能做临时工。60年代初，由荒谬的大跃进引起大饥荒，造成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主粮、副食、布匹全都统购统销，实行凭证供应，自由贸易几乎为零。倒是这种经济崩溃，促使共产党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准军事化统治，每个人都刚够养活自己，没有任何多余的财力和物力，数亿人口现在都已沦为帝国的奴隶。盗贼和匪徒倒是很少了，因为除了户口住地之外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我调动不成，显然也不能不辞而别，那样即使没送劳教，回到家中也无法维生，亲友可以接济你一些钱，但没有粮票、布票、副食卷，怎样吃饭穿衣？

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部队系统的许多二线机关和学校大批内迁，我所在的253部队属总后勤直辖，被安排搬到河南新乡。后发觉河南没有河海，而部队是船队，很不方便。于是于63年夏又迁往天津郊区。其时肝炎流行，我肝功能检查连续异常，部队搬迁时我正在209医院住院治疗，我就借此提出先留上海家中治病，因为肝炎传染性大，不适宜部队的集体生活，所以出院后我就直接回家了。以后我就一直采取拖的办法，去地段医院获得病假或休息的证明，不断寄给部队，同时不断写申请，要求因病退職或辞职。但部队根本不理我，开始还给我寄粮票和工资来，两、三个月之后就不寄了。我家中只

有老父母两个户口，每人不到 30 斤粮票，一共 50 多斤，要加上我一个年青人根本不够吃。我母亲首先熬不住了，于是我请求部队把户口关系退回给我，别的什么也不要，但部队来函只是要我早日归队。这段时间，由于郑瑛家中有海外汇款，有邮寄物品，还有侨汇补助粮票，经常接济给我，才算勉强对付过去。

一天晚上，在郑瑛家的客厅里，坐着郑瑛的父亲、郑瑛和我，昏黄的灯光映现出郑瑛苍白忧郁的神色，郑瑛的父亲闷闷不语。一阵沉默过后，郑瑛的父亲慢慢地说：

“大陆这样的情况，再呆下去不饿死也废了。”他挥了一下手，似乎作出了决定，“我来想法送你和郑瑛去香港，这样什么问题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我先是振奋，终于有了一条出路。但理智告诉我这是办不到的。偷渡我不敢，我已在部队工作，抓住了准按投敌叛国论处；合法申请，通过郑瑛父亲的关系，也许会有大一点的人物帮助疏通，但我的户口档案都在部队，没有户口，公安局的护照关就通不过。又想起郑瑛有一个也是做医生的哥哥，申请去香港已有两年，连护照都没有批下来呢。

调动不行，辞职不行，因病退职不行，去香港不行，还有什么路可走！记得系主任张青武就明确告诉我：

“你休想离开部队，我们都是搞革命工作的，辞职和退职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们现在还是革命同志，你不革命我们也必须拉着你去革命，何况你还是一个技术干部，部队需要你，革命需要你。除非你犯了大错或犯了罪，那就不是退职的问题了，你会被处理去劳动改造或去北大荒监督劳动。”

当时普遍宣传的理论是：“不是无产阶级占领阵地，就是

资产阶级占领阵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现在革命的字眼已经用得很少了，但那时革命的字眼总让我心惊肉跳。

我已使尽了浑身解数，紧闭的每一扇门都无法打开，正面效应丝毫不见，反面作用却以指数规律直线上升，那个声音紧急呼唤着我：“危险就在眼前，危险就在眼前！”我唯唯诺诺，我沉默寡言，我谨小慎微，我认真工作，但那个声音依然呼唤着：“危险就在眼前，危险就在眼前！”

大难降临

大学同学宋光汉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业大学当教师。62年我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曾几次来上海，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聚聚聊聊天，乔兄也是其中之一，他是该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的，恰逢节粮度荒、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除了去新疆一学校外，无处可以分配工作，他就要求回家自谋生路，结果成了“无业”青年，而我正处于走投无路的景况，老同学相逢，不免发些牢骚。南京西路铜仁路的拐角，有一家咖啡馆，周围环境幽静，陈设也还雅致，离我们几人的家都不远，我们时常到那里坐坐。那天我们在咖啡馆坐定，宋光汉望着窗外叮当驰过的电车有点走神。

“宋兄，你好像心神不定。”我说。

“大跃进，”宋光汉自言自语地说，“又是大炼钢铁，又是深翻地。钢产量翻翻，亩产超万斤！这条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到头来落得肚子也吃不饱。”

“江南总归还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比起外省市好多了。”乔兄深有感触地说，“听说甘肃饿死了很多人，我是不愿到新疆去的。”

“可你现在成了‘无业’青年，社会的危险群体！”宋光汉打断了乔兄的自我安慰，“公安局、居委会时刻都会盯着你。”

“你倒还有一个自由选择，可以‘自谋生路’。”我真有点羡慕他，“我巴不得成为‘无业’，我连‘自谋’的权利也

没有，只有人家规定的一条死路！”

“听说香港边境曾经开放三天，大批广东人涌了过去。”宋光汉又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我到广州去看过，平时很严，偷渡很困难。”

“哪有福气遇到这样的好机会，”我觉得他想得太天真。“广州人也未必赶得上，更何况我们外地人，等我们听到信息，边境一定把得更严了。”

“你也别说得也太死了，”宋光汉似乎并不气馁，“说不定哪天小弟和诸位只能隔线相望了。”

“恐怕到时不是隔线相望，而是隔窗相望了，不是边境线而是铁窗！”我们调侃他说，只觉得偷渡是不可能的。

有人转过了话题，“外国的总统、总理经常在群众集会或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竞选时都到选民中去拉票，为什么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解放后从来没有在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也没有到群众中来，偶尔现身也在重重警察和保镖的包围之下？”

“怕坏人暗算，不敢在群众中出现。”一人回答。

天色已晚，街上亮起了路灯，原本就幽静的路，现在路人更加寥寥无几了，空气中凝聚着压抑的气氛。但毕竟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但一番倾吐之后，苦闷已经发泄，前程虽然艰难，倒也不知惧怕，反为投合的谈话心满意足地散去了。

由于我在上海家中拖着不去部队，62年秋，部队派来两名同系的军官专程来上海找我，他们说：

“你有病，退职、辞职的问题可以商量，领导已经研究多次，但必须先回部队。坚持在上海呆着就是和组织对抗，怎么能解决问题。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先回去等等。”一再劝我

先回部队。

我也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因为没有粮票，没有工资，吃的、用的都是父母的，母亲时常唠叨说粮票不够用，叫我向部队催要粮票。犹豫了一阵，我决定回部队，去办退职，拿户口回来。

“你不要走。”郑瑛忧郁地说，她是怕我在部队的压力下屈服了。

“最好还是再住一阵，把身体彻底养好了再说。”郑瑛的父亲婉转地说，支持年轻人对抗组织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成了幕后策划者。现在想来，说不定他已看出回去的出路渺茫，不是散伙就是挨整。

“我至多呆一个月，如果他们不让我退职，我就自己回来。”我保证说。

我只带了一只装替换衣服的箱子，于1963年夏去了河南新乡。回去后，系主任等表面上对我问寒问暖，要我好好休息，给我安排住房，叫我先安下心来，并说什么我的情况已报上去，很快会有回音，组织上一定会考虑我的问题的。我是太天真，还很高兴，心想应该来早些，问题马上可以解决了。

到达新乡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又短暂地往返上海一次。那天，突然接到家中电报：“父病危速归”。我大吃一惊，心想情况不妙。经过“三反五反”和“公私合营”，中国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公私合营并不是“公”和“私”两方合起来经营，而是把私人业主赶下管理职位，罚做最下层的繁重劳动，叫做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父亲长期在又脏又累，又无通风设备的麻袋车间劳动，他年岁已大，还患有高血压，所以我收到电报估计病情一定很严重，家里人总要把事情说得轻一点，以免我不能承

受。我当即向领导请假，系主任说：

“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再决定。”

他们不相信这封电报，认为我和家里人串通作假，想借父亲病危的理由返回上海，因为我到部队一个多月，他们对我的调动要求没有给出任何回答。三天后，他们从上海派出所确认我父亲病重住院了，才准我十天假，要我速去速回。

我迅即乘火车回上海，到家才知道，父亲由于车间里气温很高，又闷又热，所以中暑中风同时发生，晕倒在车间地上，送医院后，因为没有熟悉的关系，被耽误了半天，幸好我姐姐是另一家医院的医生，听闻后连忙赶到医院，那时父亲心跳已经停止，瞳孔放大，情况十分危急，碰巧当天急诊室值班的主任医师是我姐姐的同学，两人一起抢救，死马当作活马医，两小时后，一口气竟又回来了。由于延误救治，大脑神经遭到很大损害，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知觉，可以勉强坐起，回家后，又休养了两个多月，才能慢慢起床，在室内活动活动手脚，于是亲友们都来庆贺他从鬼门关前回来了。由于这场重病，父亲才被批准退休，以后，在文革中虽然挨整、挨斗，但他已久经政治风雨，看透一切，他说：

“我这后半条命是拣来的，还有什么惧！”

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后，总算又活了廿余年。87年初，我自费来美留学时，还谆谆嘱咐我说：

“读个博士出来，为唐家争光。”

看到父亲已经抢救成功，为了不给部队留任何把柄，十天假满，我便回到部队，等待调动的消息。然而一个月后无音讯，两个月后还是无音讯。系主任说：

“上级的事情这么多，你的问题他们总还要调查研究一下，不要急。”实际上他们只是敷衍我。

10 月份，部队要搞海上岛际间的运输船队，在新乡内陆不合适，决定搬到天津郊区，于是我又随部队来到天津，心中还很高兴，觉得这样调离部队时至少会安排在天津，总比河南内陆好多了，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不能和领导硬顶，只能软磨硬泡，不违规，顺着领导的意图走。系主任要我先帮忙做些辅助工作，听听别人的课，提提意见，后来要我接一个生病教员的课，我想调离的事情大概有所进展，急也没用，就等吧。冬天快到，我只好要家中把我的衣服、书籍等用品托运给我。我打算用空余时间充实专业知识，提高英语水平，以便一旦离开部队，能有更好的基础去面对新的挑战。我知道郑瑛一定非常着急，因为一个月的诺言未曾兑现，但我也只能简单地通报一下情况，还是通过我的父母转交的，我们的信件要经部队抽查，对于我，料想查得更严。

事情一直拖到了 64 年。64 年春，我回家过春节，见了郑瑛，她不满地说：

“不是一个多月就回来吗？”

我只能告诉她部队拖着，但有希望，然而她并不相信。我无法告诉她，如果贸然回来，没有钱，没有粮，连无业游民的资格都没有，给父母平添烦恼，自己压力也很大，她给我接济是她的情意，但压力总在我们家，我怎能开口向她要！我怎能靠她养活！

一天深夜，下着大雨，巷子里早没了走动的人影，只有雨点随着呼呼的风声紧急地拍打着窗户，突然传来敲门声，乔兄竟半夜来访，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

“宋光汉出事了，”他急急地说，“他与女友等几个人一起跑到广州，想溜到香港去。今天早上，上海市公安局把我叫去了，要我交待和宋光汉的关系，问我是否知道他企图偷越国

境。询问了我两个小时，我说实在不知道。他们凶得很，叫我回家再考虑，写坦白材料，并且一再警告我，这事绝对不许给其他人报信，否则要严惩！所以我乘天黑赶快来告诉你，你想有什么事，什么话与宋的这件事有关，好有个思想准备。”

想不到我们调侃的预言这么快就兑现了。

“放心吧，我们都没事。”我想了一下说。“我们都不知道他要去偷渡，他的女友，还有和他一起去的同事，我们都不认识，况且你和宋根本不熟，就是见过几次面，更不会有事。”

“我是无业游民，是公安局最想捞进去的对象，他们会给你编造一些理由，强加在你头上。”乔兄仍然十分担忧。

我开导了一会儿，十分钟后，他便匆匆离去，透过窗户我望着他在风雨中消失，然后仔细地回忆了一遍与宋的几次交往，确信对于宋的越境事件，不知情，也未表示支持或赞同，心中很坦然。

我回家探亲过春节是和一位姓裘的军官同行的，他回浙江老家探亲，也是学生出身分配来部队的，我们讲好一起回部队，顺便在山东曲阜下车看看孔庙。假期很快就结束了，裘军官到我家来集合，然后我们到静安寺乘 15 路电车去上海北站，郑瑛来送我们。我们登上车厢放好行李，然后我来到月台和郑瑛道别。

“你不够坚强，太懦弱。”郑瑛显然在谴责我，满脸愁云。

汽笛响起了，火车开始启动，我赶快跳上车，随着车轮“咯噔，咯噔”愈来愈快的节奏，我望着蒸汽迷雾中的她，看见寒风吹散了她的头发，看见她掏出手帕擦眼，一股心酸涌上我的心头，我强忍着满腔泪水，灵魂随着加速的列车飘向未知

的空谷，不想这一幕竟是我们的永别！

我一回到部队，形势大变，立即被隔离反省，要我交待投敌叛国、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事后，我得知宋光汉和他的两名同事，都是大学教师，因不满国内的高压、无自由和大饥荒的惨状，跑到广州想看看有否可能偷渡去香港，被当地公安在旅店查房时发现行迹可疑而被拘留，之后被押送回北京居住地的看守所。那时自由旅行是不存在的，外出都是公差，必须持有所在单位的证明，无论那里，旅店每天都要查房，广州这样的边境更不用说了。在宋光汉的交代中有我们一些老同学在一起时，所谓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言论和牢骚话。

回想起来，在公安局找乔兄询问时，我的部队也已通过上海公安局监视我了。离开上海前一天的上午，我家所属派出所的户籍警曾来家“随便看看”，我不在家，他问起我是否回家探亲了，我哥说，是的，后天就要回去。当时无人注意这个细节。临走那天的中午，该警察又来我家，看到我的行李箱已摆在走廊中，随便问了一句：“今天走？”他又看到穿着军装的裘军官也在，估计他误认为这位裘军官是部队派来监视我的，所以再也没问什么，放心地走了。现在想起来，自己真是个白痴，我抱着“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处世哲学，实在没有“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性。

当时保卫科少校科长程肖松让我离开办公室，到一间特别为我安排的单独小屋反省写材料，身后一名带枪的士兵跟随着，我真傻，不知这就是“关禁闭”。小屋是一间孤单的房子，在营房后面的菜地旁，专门用来关禁闭，厕所在 20 米以外，是有顶有矮墙的干茅坑，也为种菜所用。到了小屋，要我把随身物品，口袋中的钱物全都交给该士兵。我口袋中有一小本通讯录，记录了我所有亲友、同学的姓名、地址和电话，我

迅即犹豫了一下，如果不拿出来，也许当兵的会搜我口袋，倒落得个不老实的罪名；如果拿出来，会给别人造成麻烦。但转念一想，我并没有做违法的事，亲友、同学更沾不上边，他们又不认识宋光汉，所以我就把口袋翻出来，连这个小本也给了他。

程少校大喜过望，连声说：“这样很好，我们为你保管这些东西。”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天就彻底搜查了我的宿舍，床铺、箱子全都翻了遍。之后又从我的通讯录中逐个联系对方的单位，寻找任何可疑情况，给这些朋友制造了很多麻烦，使他们背上了包袱。

程肖松亲自抓我这个要案。程是一个自称有 30 年党龄的保卫干部，脸上从无笑容，经常标榜自己党性坚强。一开始就白天黑夜连续提审，要我交待一切反党言行、组织名单和行动纲领。威胁、吓诈、哄骗，无所不用其极。

“宋光汉想越境去香港就是投敌叛国，你们几个人反对党的政策，聚集讨论就是反革命集团，你是宋光汉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你们有完整的投敌叛国计划，宋光汉不过是先行部队。”他穷凶极恶地说。

“我不知道宋光汉企图越境，不认识他同行的两位教师。”我辩解说，我知道这样的“滔天罪行”是罪可致死的，在他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我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事实上我没有参与宋光汉的越境计划，我不能也不敢给自己乱扣罪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

“你没有行动很好嘛。”程又诱导我说：“但你总有想法，想什么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必须把你的想法交代出来。想法不是行动，想想而已，不算犯罪，不会给你处分。宋光汉要

偷跑去香港，说明你们对现在的社会不满，对党不满，不满就想反抗，就会有计划，希望共产党垮台，希望毛主席死掉，就会去串联其他的不满分子，搞枪、搞弹药，你们虽然没有做到这一步，但思想中肯定是这样的，这是必然的，不交代出来是决不能过关的。”

一连几周，程肖松白天黑夜逼我交代如下的问题：计划派谁，在哪里暗杀毛主席、周总理。

“你们为何谈起毛主席、周总理不到群众中来？”程大声喊叫着，似乎不喊就不能显示他的威风。“你们就是想要暗杀伟大领袖。你们对现实不满，对党不满，必然想要推翻它，你们想暗杀中央领导，造成大乱，以此达到目的，必须交代出你们的全盘计划。”

“也许你们还没有书面计划，”大概他自己也觉得离题太远，“你们脑子里肯定有一个计划，你就先交代脑子里的计划。”

饿死了那么多人，整了那么多人，一句牢骚话也不能发，还要一味高唱赞歌！连一闪念也从未有过的“谋杀”却按高超的逻辑推论出来了！我当然不能瞎编没有的事实，把死罪扣在自己头上。

“你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看来你是不敢说的。”他又换了一个方式。“你就说说你们准备好的枪支弹药在哪里，只要没有什么行动，也不算什么问题，坦白交代就好。”

“你父母哥哥姐姐全都关起来交代问题了，”一会儿，他拍桌大骂，“你要是不赶快彻底坦白，他们都将进监狱。”

头两个月，程少校天天来逼我交代新问题，我知道如果按程的“启发”来写，无异自掘坟墓，但不写又过不了关，又深怕牵连父母哥姐受罪，我处于极端的痛苦和迷惑之中，压力重

重，焦虑不堪，白天在严厉的审讯逼供下，精神已经崩溃，晚上恶梦连连，时时惊吓而醒。看押我的士兵三班倒，拿着枪在门口站岗，吃饭时由他们从士兵食堂带给我一碗饭菜和一碗水，我根本吃不下，请他原封不动地带回去。这位程少校怕我绝食，变了一个腔调，和颜悦色地劝我说：

“你的问题并不大，你又没有跑，无非一些思想问题，我们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把这些思想问题搞清楚了马上放你出去，你怕什么，饭总是要吃的。”

我倒不是绝食，只是吃不下，但我决定结束生命，一了百了，我两次在房梁上挂起了绳索，但被看守的士兵发现，之后倒是对我放松了几天。

有一个农村士兵看押我时步步紧跟，连上厕所也站在厕所里面，我非常烦他，对他说：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怕我跑？一点知识也没有！”

这句话惹恼了他，他恶狠狠地说：“你是反革命分子，就要牢牢看着你，你还不老实！”

我意识到他们已定我为反革命分子，不过经过前一段的绝望之后，我的心情反倒逐渐平静了，我已不想自杀，我倒要看到底我这一生会怎样度过，中国会在阶级斗争的恐怖中一直走下去吗，我隐隐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合人道、不合正义，迟早会有变化。从高中到大学，多少优秀、单纯、清白的同学无辜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正在劳改、劳教，即使留在原岗位的，也每天遭到党团骨干的训斥，被监督劳动，我已经躲过了许多运动，现在该轮到我了，正如后来一个同学所说：

“唐某某，你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要轮到你的头上，九九归一也！”

为了使身体不致垮下来，在看守卫兵不注意，或离我的禁闭室稍远时，我就在屋里踏步跑、做操，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我不愿意让卫兵看见，是因为他们一切都要向上报告，我不能让程肖松知道我已经卸下了负担，只等处理了。

我的禁闭室紧挨着干部菜地，菜地里已长满了西红柿和黄瓜。好几次有军官摘了西红柿和黄瓜送给我。

“写得够辛苦吧，给你几个提提神吧。”他们其实是说给卫兵听的。

卫兵都是当兵不久的新兵，对军官绝对服从，所以也不说什么。送东西的军官都是我不熟悉的，熟悉的不敢来，怕被牵连。这几个军官的举动使我深为感动，知道这是于无声处送温情。天气炎热、干燥，我已好几个月不知瓜果味，吃起来如同甘露一样，至今记忆犹新。

第三个月，我已认清了他的诱供手法，总是沉默以对，最后，我说：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外国领袖经常到群众中去的事情，与中央领导风马牛不相及。你想置我死地，就随便罗织我的罪名吧，不用关我这么久、硬要我自己瞎写。”

他看看也逼不出什么来，几天没有露面。之后，他一周只来一次，来了还是要我承认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和想法。

“你的问题说大就大，”他又启发我说，“因为你们想要共产党垮台，想谋害伟大领袖。说小也小，你不就是想想、说说嘛，还没有行动嘛，仍然是个思想问题，只要写出来，承认下来，就算主动交代，主动坦白，不会给你处分的。”

“不要有顾虑，”他又继续说，“你仅仅是思想问题，你没有任何行动，所以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批评，认识提高了就是好同志。”

“但你要深挖思想，”又回到他想得到的关键材料，“把那些错误的想法全部挖出来，只有讲出来，才能认识它，改正它，必须提高到政治高度才能脱胎换骨。”

我还是上了当，我知道什么也不写肯定是过不了关的，况且每天逼我交出材料来，总得在白纸上写上一些字，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这叠纸，我只能挖空心思往上写。我倒后悔平时不关心政治，写不出长篇大论。走投无路之中，我就把所有想到、听到的右派言论统统扣在我头上，不是我说的，也说有共鸣，想一条写一条，倒也凑成了一些交代材料。我想，你不是说过这些仅仅是思想问题吗，也许从此让我离开这个压力沉重的部队。

第四个月，程少校一直没有露面，估计等待上级批准处理了。1964年8月7日早晨，他又来到小屋，脸上似有笑容，并和颜悦色地对我说：

“你的问题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也该有个了结了。今天要开一个会，对你的思想作一个批判，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你一定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态度要诚恳，要承认错误，别人说得重了，千万不要有反感，要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如何处分完全决定于你今天的态度和认识。”

他说得很轻松，我也有些高兴，总归对我的整肃快到头了。事后，我才意识到他之所以轻描淡写，只是要我乖乖地听取别人的批判，不要有任何反驳和解释，否则大多数军人都知道我只是要求离开部队而受整，如果我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委曲，都会使会场十分尴尬，缺少说服力。

9点左右，两名士兵带着枪把我叫出小屋，从前台侧门带进大礼堂，我一看好大场面，全校的人都来了，坐满了七、八百人，一色黄军装，台上大条横幅写着“批判反动分子唐某某大

会”。我倒也平静，心想今天是整我的最后一步了，我也快将离开这个令我万念俱灰的部队了。我估计先开批判大会，然后有一个间隔，再给我什么处分，赶出部队，而这正是我的心愿。

批判大会有五个人发言，我站在台上一角“洗耳恭听”，心想熬过这几个钟头我就解放了。每个发言人都声色俱厉，上纲上线，说我妄想要共产党下台，要暗害中央首长，我也没有听进去多少。发言结束后休息 15 分钟，问我要不要去厕所，我想跑下台去和这些军人听众一起去厕所也很尴尬，就忍着了，他们给我一张椅子让我坐着。文革之后，回想当时的情景不觉暗中庆幸，亏得我的批判在前，还不兴武斗、坐飞机之类，时间不过相隔两、三年，要是挨到两、三年之后再受批判，恐怕命赴黄泉了，也算躲过一劫。

休息中间，程少校又关照我一定要表示诚恳接受批判，认识错误，争取从轻处理或不处分。休息之后，继续开会，宣布由反动分子唐某某表态。在程的多次启发下，我抱着宽大处理的幻想，不再解释一切强加于我的指责，只简单而隐晦地说：

“因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与部队格格不入，所以一直想离开部队，我知道资产阶级思想不改，迟早会受到整肃。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感谢大家的批判帮助，不论如何处理，今后都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

其实所有军官干部都清楚，我不过是不愿意在此部队工作，不愿参军，独特地穿一身蓝布中山装，影响很坏，这次无非是借机整肃，杀鸡给猴看。

接着洪校长作教育讲话，我只记得他讲的大意，他说从我的事件可以证明毛主席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如何英明，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如何尖锐，三年多前一个清白上进的青年学

生，由于不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来到部队仅几年，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可见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说我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

最后，由政委宣布处分，他说我的问题虽然是敌我矛盾，但仍从轻发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送劳动教养两年。

我没有想到会给我这样严重的处分，这时才意识到这位程少校之所以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就是让我没有思想准备，好让部队开一个成功的阶级斗争教育大会。但再一想，两年也很快，在部队一晃已经浪费了四年，相比之下，两年短多了，马上离开这深恶痛绝的部队！让我精神得到一点解放！回到小屋我倒是很平静，他们把我原来宿舍里的衣物、箱子都抬到小屋来了，通知我下午就送我去劳教场所。

等我进入小屋，程少校也跟了过来，随手关上了门，并要我和他一起进入里屋，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

“我们原来不想这么处理的，我们认识也不足，报上去以后，上级要这么处理，我们只能照此执行了。我们已尽力让你少了一年，只劳教两年，去了以后，先要学习三个月，所以很快就会过去的，到时我来接你，有什么困难，给我来电话或来信，我一定尽量帮助你。”他说着更紧地握住我的手。

这使我想起前一、两天，他也有意无意地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说他们原来认识不足，那时我不理解他的意思，现在理解了，原来他是要向我解释，他一直说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现在成了敌我矛盾。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认识不足，难道不是他把我的问题夸大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吗？难道不是因为这样严重的罪名遭致劳教的惩处吗？他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已经充分地向他的上司、他的组织显示出他的立场坚定，他的斗争性强，他已经获得了提升的足够资本，他为什么

要对我这个判了劳教的人做出解释，说明这样的处分不是他的本意？他为什么一变大会上严肃和愤怒的神情而握住一个反动分子的手？抑或在他的心灵中略过一丝惧怕？显然他知道谋害领袖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没有根据的，是他罗织起来套在我身上的，莫非他为自己种下的罪孽而心虚？还是害怕我这只落水狗还有浮上来的一天？人哪，在冠冕堂皇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一颗心？

宣判已定，没有判决书、没有处分决定书给我本人。吃过午饭就把我押上了吉普车，要把我送到劳教收容所。车子开出不远，有两名军官拦停了车，虽是同一部队的，但我与他们不太熟悉，他们不顾车上押送我的两名保卫干事，对我安慰说：

“我们都了解你，不要顾虑太多，就当是下乡锻炼，注意好好照顾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泪润湿了我的眼睛，我明白部队大多数人知道对我的整肃是不公正的，他们分得清黑白善恶，我深深敬佩他俩的勇气，竟在两名保卫干部面前流露出对反动分子的同情和安慰。

在我被送入劳教收容所的几周后，才被允许写信通知父母，我自 64 年 4 月回部队，关押了 4 个月，又在劳教收容所度过了最初几周，因此家中收到我的信已是我离家近半年之后，父母接信后的第二周就让我哥哥从上海到天津来探望我，取走多余的书籍和生活用品，那时我才得知，由于长期没有我的消息，给我写信也没有回音，给部队领导写信查询也没有结果，大家都很担心，不知我出了什么事，没想到最后竟是劳动教养的结局。父亲哀痛不已，整整一周没有说一句话，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小至大一直循规蹈矩的我，待人总是谦让为上，怎会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分子，送进劳教死穴！消息传到我的老同学

和老师耳中，无不愕然。后来我又得知，郑瑛得不到我的音讯，以为我已屈服于部队的压力，故意疏远她，无奈又绝望，情绪非常低落，整天昏昏沉沉，以致抑郁成病。她父亲为了让她摆脱恋爱的阴影，决定设法送她去香港，托了很多人说情，她家有一亲戚是政协的一个头目，直接找了当时上海的公安局长，而郑瑛又是一个女医师，总算网开一面。去港前，她专门来我家辞行，并打听我的情况，心情非常沉重，泪流满面。当时我家知道我已劳教，但没有说出实情，怕她更加伤心，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只是劝她想开些，到了香港早日成家，好有人照顾。我家也没有把郑瑛去港和来家辞别的情节及时告诉我，害怕身陷囹圄的我，雪上加霜，遭受双重打击，出现什么意外。郑瑛到了香港后还给我父母来过几次信，托人带来过香港礼品，直到文化大革命断绝联系。

思 考

吉普车载着我向劳教所驶去，车上两名押送我的干部沉默不语，半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结果已经出来了，劳教两年，不管判得是轻是重，不管劳教两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总归没有悬念了，程少校不会再来穷凶极恶地逼迫：交代，交代，交代。我的心平静了，开始回忆我怎样走到了今天的境遇。

宣判大会上校长说我一个清白上进的青年经过三年多时间就堕落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确，我自己也要追踪走过的脚印看看怎么会走到今天的路上。记得命运之神早就向我发出了预警，他似乎在告诫我不要进入军队，要是进入军队必有灾难降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送我报考航空学院，他提示我前途危险，于是我向学校要求报考其它大学，但是没有成功；在航院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出现了转校的一线希望，他催促我抓紧时机，经过我的努力居然成功；但最后还是在劫难逃，不读航院竟也被分配到军队工作。一进部队，大难立即降临。既然我早就接受了命运的启示，知道军队和我相克，也在尽量避免接触军队，是否我躲避军队的努力还不够，心机还不够，谋划还不够？想来想去，我已经足够机灵了，居然能从航院转到交大，别的还有哪步棋可走？要么毕业时成绩考得差一点，部队不要我，然而这个差不能只差“一点”，共产党历来的观点是政治第一，在大学时就展开过关于红专的大讨论，最高标准是又红又专，但是成绩优秀的同学由于对待专

业格外认真，必然减少对于政治运动的投入，所以往往划入白专道路之列，遭到批判，以致读书还得偷偷地读。不专倒不要紧，不管是白的还是红的，没人注意你，这倒也对，从保卫统治权的角度来看，聪明人造反比愚昧人造反可怕得多，因此统治者宁要愚民不要智者（文革时有一个更形象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军队招人，尤其特出政治条件，我家三代清白，无地富反坏右，无国民党员，无判刑坐牢的人，具有这种条件的同学是不多的，因此我的成绩即使从优秀降为良好，甚至及格，还是会被分配到部队，除非考得不及格，不能毕业，啊，这样的大彻大悟不是我这凡人所能做到的。也许还有一步棋可走，在毕业前，我和郑瑛突击结婚，这样我的社会关系中就有了海外关系，部队就不会要我了，但婚姻需要成熟的过程，并非我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看来在我的命运中军队是躲不开的。

我继续探索下去，即使进了军队，一定会遭来这样大的灾祸吗？看来遇到程肖松这样的人是造成我的大灾难的直接原因。程肖松竭尽逼供信的能事，众所周知，对某人不满意，决不等于要谋杀某人，在生活中，某种不满随时可能发生，比如不满张三骄傲自大，李四不讲卫生，按照程肖松的逻辑，必有谋杀张三或李四的企图，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人都有谋杀意图。西方国家的在野党经常在批评执政党，难道这些在野党都是谋杀团体？我们几个老同学，确实对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有所不满，我们不满连连整人的高压政策，我们不满劳民伤财的大跃进，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到头来却是大饥荒，今天共产党自己承认 99.9% 的右派都是错划，自己承认当年的大跃进是冒进，普通百姓对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议论几句再平常不过了，重压之下我们也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每一个实事求是

的人都不会把这种牢骚和有计划的谋反划上等号。但按照程肖松的公式，我们对党的政策不满，对党不满，必有推翻共产党的企图，必有谋杀党的领导人的企图。我们的确议论过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到群众中来，说他们是怕遭暗算，不敢到群众中来，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却时常到群众中搞竞选，拉选票。好了，现在有了暗算的字眼，程肖松的头脑里立即出现了电影中的场面，你们在策划暗杀，你们必有计划，必有武器。左倾的狂热完全压倒了合理的逻辑，我们还有武器！这种议论充其量也不过是认为领袖脱离群众，居然等同于谋划暗杀！就是程肖松自己恐怕也怀疑这个逻辑，不然他怎么会在小屋中关起门来向我这个凶恶的阶级敌人热情握手！

有一件事情可以旁证程肖松的左倾狂热。一个叫金旭升的同学，也被列入宋光汉反革命集团，他于航院毕业后在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院工作，他和宋光汉的接触最多，平时言论也激烈，常会蹦出耸人话语。例如议论到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他说：“毛泽东有点像希特勒，喜欢打仗。”他还和宋光汉在上一年一起去过广州，观察动静，寻找偷渡香港的可能性，后发觉广州看管很严，警察天天光临各旅馆、招待所，因此第二年没有随宋光汉再去广州。宋光汉出事后，金旭升的单位也勒令他反省交代，但他们单位认为金旭升虽去过广州，还是自己回来的，许多不满言论尚属思想问题，故于 64 年 6 月给予“留职察看一年”的处分。我们都是同案犯，涉及的单位之间为多整材料，相互间联系频繁，我的处分决定后，程肖松就赶到金旭升所在的设计院，质问说：

“金的问题比唐严重得多，为何只给留职察看一年的处分！”严肃要求金旭升的单位重新处理。

到 64 年 9 月，金旭升的单位又把金的问题升级，定为劳教

三年，送到北京市下属的河北茶淀农场执行。

因此，如果我不是遇到程肖松，而是碰到一个稍为实事求是的人，也许不至于落得劳教的处分，我今后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景象。但我又进一步想到，像程肖松这样的人正是时势造就的，他的逼供信，他的无限上纲，正符合当局想要构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激烈的幻境，一批人被斗了，被判刑了，其他的人都要吸取教训，深挖资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形成杀鸡给猴看的效应，从此，谁还会对共产党不满？谁还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大家都得承认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都得承认一切归功于党，一切都来自党的教育培养，十亿人会喊出同一个口号：“共产党万岁！”阶级斗争真是一抓就灵。可见程肖松这样的人是必定要的，而程肖松这样的人也自然会浮现出来，用不着理想，用不着头脑和思考，只要左得发狂，只要“忠”得痴心，就能受到表彰，就能得到提升，为得到表彰，得到提升尽“忠”的左倾狂人就会出现。所以我遇到程肖松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实对我宣判后不久，程就步步高升，后来调往西安军医大学任保卫处处长，提升为中校，显然挖出我们这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的反革命集团是他的一大功劳。

那么即使程肖松竭尽夸大的能事，无限上纲，最终决定权还在上级机关。难道他们都看不出事实与结论不符吗？问题在于上级早想拿我开刀了，我给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不愿意和郑瑛断绝关系，不接受组织介绍的对象，拒不参军，闹调动。看看组织上已经退到何等地步！只要我参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可我还是不参军！一个蓝布衫混在一色黄绿中，让领导多难堪，我想我的上级准挨上级的上级批评了。现在好了，程肖松送来的报告正合心意，定当从严处置。也许程肖松真的没

料到上级会做出劳动教养的处分，他是逼供信的当事人，想必他也清楚他的报告中有多少水分，然而上级正需要一份夹着很多水分的报告。想到这里，我觉得命运给我的启示太准了，得到从轻发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被从严处理的概率要大得多。然而是什么促使我来到军队就和领导的关系闹僵？我这个人的天性就是直率、认真，不喜欢政治，我讨厌成天学习党的政策、党的理论，我过不惯刻板的生活，我喜欢适度的宽松，我渴望学业能够得到发挥，能够为船舶设计贡献力量，而这些和当前的现实都不相融，分配我到连队去教士兵识图，浇灭了我毕业设计时的满腔热情。这种种都是我不愿在军队工作的原因，但如果和“无业游民”比起来，我也不会放弃军队的工作而甘愿做这个“无业游民”，最关键的问题是婚姻也要由部队作主，在那里没有婚姻自由，我必须中断和郑瑛多年的恋爱关系，必须放弃即将成婚的打算。然而正像歌中所唱：

“爱情是一只倔强的小鸟。”

由此我一
心要脱离军
队，由此我不
愿参军，由此
我成了身穿蓝
布衫的异类，
这不是命运造
就的吗！

吉普车继
续向着劳教所
进发，我的思
想飞向宿命，



前排左起：周建国、薛德镛、唐彼得
后排左起右：吴国镛、金旭升、刘文墉、宋光汉
(1961年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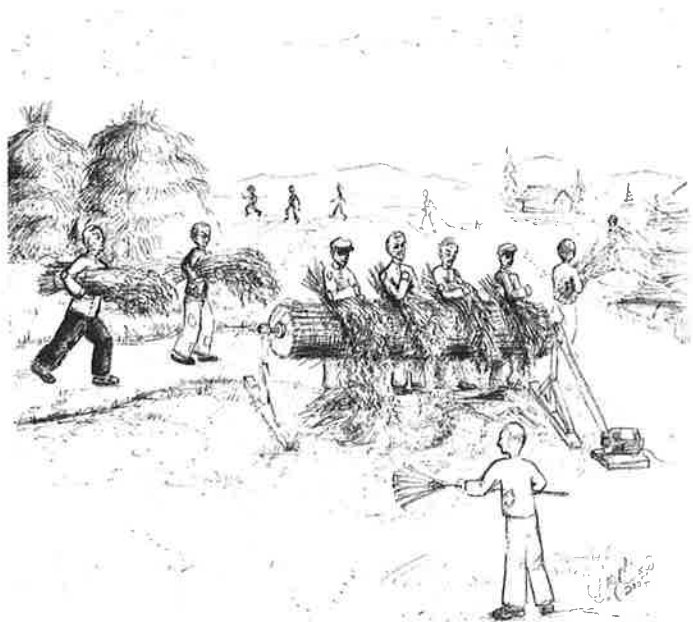
心灵却感到轻松，前面就是地狱之门也好，我反正摆脱了我的克星——部队，咬紧牙关，度过两年劳教生活，出来后部队不会要我了，我不会回到那令我无比厌恶的地方了，两年不算什么，很快就会过去。好天真的想法，和即将来到的现实相距十万八千里！

事情过去好多年之后，我在破旧老宅的阁楼整理旧物，因为不久这所老宅就要拆迁了，突然翻出一张当年的老照片，那是 61 年过年时，我们几个曾在北航学习的上海同学在上海偶然遇见时照的，照片上是宋光汉、刘文墉、金旭升、薛德镛、周健国、吴国镛和我，这张照片竟是当年程肖松把我们七人划入宋光汉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物证，不过没有侦探小说里的悬念，他要把一个孤立的案件扩大为一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这样才能显出他的才能与功勋。所以无须调查和侦察，凡是和宋光汉有接触的人都是疑犯，我们在一起照相，正是最好的物证。有了这张照片，把我们划进反革命小集团不费吹灰之力。这七人，宋光汉，判十年；刘文墉，从设计院下放车间劳动；金旭升，原来他所在的设计院判他留职察看一年，后改判劳教三年，发送到北京市下属的河北茶淀农场；吴国镛，派出所监禁三个月；周健国，革职，离开部队；薛德镛，在部队的导弹设计院革职，送河南煤矿下放劳动；我劳教两年。其实，宋光汉与吴国镛、周健国，刘文墉在航院是不同系的同学，来往并不多，但程肖松说一般的同学、朋友何必要一起照相？只有同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才会同去照相，你们照相的目的就是要把照片存挡或送你们的上级备案。至于北京和宋光汉有接触的同学、朋友、亲属则全部划入这个集团，宋光汉的姐姐原是北京同仁医院的医师，定为集团成员，下放监督劳动多年，宋光汉的姐夫原是北京医学院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反革命集

团成员的家属，下放到北京门头沟煤矿，涉及挨整的总人数有几十人之多，很多人我不认识，从未见过，下落也就不清楚了。

以后再读中共党史，发现早在井冈山整肃 AB 团和延安整风肃反时这一套残酷迫供，无中生有的整人手法早就演绎得淋漓尽致、滚瓜烂熟了。如果再追溯到苏联老大哥，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布哈林由于主张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推迟农业集体化运动，反对在农村采取非常措施，与斯大林的意见不一致，竟会被套上叛徒、暗杀分子、恐怖分子、外国间谍的罪名，还有凭空捏造一个布哈林组织，最后被斯大林处死。正像布哈林遗嘱所说，“‘人民内务委员会’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这些‘万能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暗杀分子、恐怖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始终努力学习苏联老大哥，斗争的艺术早就学得炉火纯青，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二章 囚徒生涯



(图二) 捋稻

劳教收容所

吉普车行驶了数小时来到天津郊区的劳教收容所，这里有近十排平房，劳教人员要在这里学习三个月，它实际上是一个中转站，一个集散地。送来劳教的人按到来的先后顺序编班，约三十多人组成一个班，住一间屋，一个大统铺从东墙连到西墙，前面是一米宽的走道，最初建造时可能安排 12 人住，但此时进来的人太多，已经增加到 30 人住。

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学习政策法规，使劳教者认罪服教，不闹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认罪服教，认识自己罪恶深重，感谢政府宽大处理。很奇怪，劳改场所不准提党，大概是哪位高明人士作出的规定，以示我们这些罪犯是政府按法律处理的，与党无关，但我们早已听惯了党政一体，党领导一切的话，党八股已经运用得非常熟练，所以往往说漏了嘴，带出“感谢党和政府”之类的话，为此总要受到苛责。有谁不认罪的，就要互相帮助，让他知罪，至少不再喊冤。所谓帮助，就是在小组会或大会上批斗，尤其在小组会上，警察队长总会指令一些胳膊根粗的流氓打手负责“帮助”，十排房子里，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受不了这种“帮助”而痛苦喊叫，声音惨烈。第二阶段为坦白余罪，每人必须坦白交代没有讲过的其它罪行。对于我们这类反动分子，稍加变通，交代说过哪些反动言论，还有哪些反动思想，大家都以深挖思想根源的长篇大论来应付。其实警察队长也不会细看，不过是上级给他们规定的任务而已。第三阶段为检举揭发，你自己的

问题讲得差不多了，就要你检举别人的罪行，别人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思想。在各个阶段中，每个人都必须写出具体的事、人，你要说没有，马上请你到小组会上接受“帮助”。为免皮肉之痛，大家都写上几纸捉摸不定、无法查证，或不轻不重可以过关的材料。我已紧闭审查了半年，写过无数交代材料，积累了不少经验，虽也费尽心机，胆战心惊，但总算过关。学习期限名义上是三个月，但是每天都有很多人送进收容所来，所以一个多月就匆匆结束，好把房子腾出来容纳新来的人。

其时正值 8 月大热天，我们 30 多人，整天都挤在太阳暴晒下的平房内，一个统铺，吃饭、睡觉、学习、开会都在这个统铺上，人人一身臭汗。每人只能摊到宽一尺半左右的铺位，晚上睡觉必须侧身，一人头朝南，一人头朝北才能摆得开，你我头脚相连，酸臭味冲天，但那时在恐惧紧张的心情之下，大家都已麻木，没有香臭之分。晚餐喝粥，夜间小便频多，厕所在几十米开外，小便回来就很难找到原来睡觉的位置，必须左推右推，半天才能推出你的一尺铺位来。

我在部队有不少行李，除衣物外还有收音机、学习外语用的唱机和乐器吉它等，进收容所时，接收警察就警告我，东西太多，必须想法拿走。后来允许给家里写信时，我就告知父母受到劳教处分，并要哥哥来一次，把大部分东西带回上海家中。家中接信后万分不安，不到一周就叫我哥哥坐了 20 小时火车从上海来到天津，收容所的警察队长允许我到大门口的传达室去会见我哥哥，限时 20 分钟，他说：

“这是对你的特别照顾，收容所通常是不允许家属来接见的。”

我忍着眼泪，把生活必需的衣物集中放在一个木箱中，其

余的东西一件件搬到大门口，向哥哥简单叙述了一下我是怎么被劳教的，哥哥说家里给你和部队去过很多信，一直杳无音信，估计你出了什么问题，万没想到你会劳教。20 分钟一晃就到，门口警察已在催促，这时哥哥禁不住失声痛哭，又不敢出一句怨言，生怕加重我的罪名。东西太多，哥哥只好跑到外面叫了一辆人力车，将东西运往火车站。我眼望着人力车慢慢远去，无限惆怅袭上心头。

整个收容所就是流氓、小偷、反革命的大杂烩，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由于政治问题，即思想反动送来的，其余三分之二大多为流氓、小偷和历史问题，也有与户籍警吵架，本人又无正式工作单位，就作盲流处理的。由于班组是按到来的时间顺序编排的，所以我所在的班里各种罪名都有，五花八门，有思想反动的，有对党不满的，有修行信佛的，有国民党时当过警察的。大学毕业生有五名，他们中的两名定为思想反动，其一是因偷听美国之音，另外两名称做无理取闹，据他们说是因为不满单位对某些事处理不公，找领导讲理，讲不通，领导烦了，给他们安了个无理取闹的罪名。我从学校到部队，接触的社会层面很窄，这形形色色的人群让我大开眼界。班里有一个近 30 岁姓朱的，有人告诉我他是因为在公共汽车上划洋火而被收容劳教的，我很吃惊，怎么划一下火柴就要劳教，一个小青年向我和其他两人解释说：

“你这个大学生怎么不明白，公共汽车上划洋火多危险，汽油车要烧起来的，当然要劳教嘛！”他还朝别人眨眼笑着说：“这位同学连这个也不明白。”

我们相互间只能称呼为同学，因为是阶级敌人，不能称呼为同志。几周后，有人告诉我，所谓划洋火，是乘公共汽车上人多拥挤时，掏出自己的阴茎往女人屁股上乱捅，犹如划火柴

一样，有的会射出很多精液，粘在女人裤子后面，这就叫“着了”。

当年人人都有定粮，在收容所里是进行“学习”，不是重体力劳动，所以每人每月定粮 27 斤，早餐一碗米汤似的稀饭作一两，半个窝头作一两，那是用陈年玉米粉做的，外加几片咸菜。中午两个窝头四两，晚餐一个半窝头三两。中午和晚上都是煮白菜或萝卜作菜，只有周三和周日的中午改为面粉制的馒头或米饭，有一点肉放在菜中，算作改善。我刚进收容所时，心中愤慨不平，又面临如此环境，头一周确实什么也不想吃，剩下的都给同班饥不择食的同学领受了，慢慢平静下来后，每天感到饥饿难忍。大部分人都盼望赶快离开收容所，结束“学习”阶段，到农场去改造，到了农场，定粮可以增加至 38 斤，可以吃饱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想。

我在大学时喜好乐器吉它和手风琴，进收容所时，一个电吉它也在行李中。收容所里有一个小乐队，由劳教犯组成，有时周末开会，给劳教犯们演出一些文娱节目，也算劳教场所生活“丰富”。小乐队的领头姓杨，原是天津乐团中拉大提琴的，他见我有吉它带来，就通过警察队长来找我，要我参加他们的乐队，我哪来闲情逸致拨弄乐器，不想去，他随后找我单独谈话说：

“你别犯傻了，这是一个好机会，乐队活动时你就不必参加班里开会和劳动，晚上还有宵夜，互相说说也减轻你的精神压力。”

于是我参加了乐队，每周两个晚上，再加周末的下午和晚上，我们在一起练琴。所谓的夜宵，就是在晚上练琴时可以得到伙房中白天剩下的一、两个窝头或馒头，有时有一些粥或汤，这些食物我把它奉为佳肴，想想亏得进了乐队。

我上高中时常去游泳，有时感冒了也不在意，时间长了竟得了慢性肥大性鼻炎，一到晚上，鼻甲肿大鼻子全塞了，无法睡眠，做过很多治疗，包括电灸、封闭之类，还在当时上海最出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医师处诊疗过近一年，然而全无效果。为了可以睡觉，我每天要滴鼻眼净，半夜还要滴一次，否则无法睡着，这种状况持续已有十余年。进收容所后，除非急诊急病，否则不许看病，当然也无药可买。起先两周，晚上睡觉，我的鼻子全部堵塞住，只能用嘴呼吸，非常难受，根本睡不着，谁知奇迹出现，慢慢稍为能够通气，三、四周之后竟通气无阻。这让我在此后获得较好的睡眠质量，可以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度过摧残身心的岁月，如此奇迹也许就是一种“另类疗法”吧！记得曾有医学科学家谈过，人在特殊的临界环境下，机体会自动出现反制因素，不知是否这个道理，但我还是非常奇怪，无论读书期间还是毕业后工作期间，我多次试图停止用药，每次长达一月以上，想看看我的鼻甲能否收缩回去，结果每次都无法坚持下去，以失败告终。更奇怪的是自劳教后，我的鼻子畅通至今，三十余年它一直正常，从来不需要滴任何药物，除非重感冒，才偶然有些鼻塞现象。

还有我的足癣（南方叫做脚气），在部队工作时一直困扰着我，尤其到了夏天，脚趾间和脚心上常有很多水泡和脓泡，百治不愈。进收容所时正值 8 月夏季，足癣让我奇痒难忍，又无药物。当时因劳教犯太集中，警察队长怕传染病或瘟疫流行，所以每次开饭敞开供应大蒜，报刊上有大蒜治百病的文章。我在奇痒难忍时，只有大蒜头可得，便拿它当药，用大蒜瓣猛擦脚癣和水泡，不可想象，几周后竟全部结痂脱皮，不痒不痛，脚底板光滑如旧。对这两件事，我一直百思不解。在我后来平反去了渤海石油公司和到了美国工作以后，我又多次犯

了脚癣病，尽管症状一样，但怎么擦大蒜也未见任何效果。看来除了那位科学家说的反制现象外，就是上帝的眷顾了。

“学习”生活是安排得非常紧张的，早上 6 点半起床，出操跑步，吃早餐--稀饭，马上就“学习”，中午一小时吃饭，马上又“学习”，或外出劳动，下午 6 点回屋，连洗带吃饭，到 7 点又“学习”，“学习”至 9 点半，10 点必须睡觉不许做其它事情。第三周起，下午半天大多安排劳动，抬砖、挖土、搬木材、填臭水沟等，收容所地处天津近郊，正在扩建房屋，以解决劳教人员迅猛增长带来的住房困难，正需要这些取之不尽、好使唤的义务劳动力。我们都愿意出来劳动干活，一来呼吸些新鲜空气，二来相互自由地谈谈，找一些乐子，比起关在房子里学习交代问题轻松不少。我所在的班，警察队长指定一个叫做蒋国庆的人当班长，负责“学习”、劳动和生活。他原是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因贪污送来劳教，他和收容所的警察所长以前就认识，还很熟悉，所以指定他为班长。他有很多特权，可以随便出入大门，可以回家，甚至可以在家里过周末。我们出操、劳动，而这位蒋班长可以呆在房子里睡觉或看书。他还能到警察食堂去吃饭，不吃我们劳教人员的猪狗食，他是这样称呼我们的饭食的。

十月中旬一天的早晨，警察队长突然大声吹哨，所内广播连连催促：

“所有劳教人员立刻到操场集合，按班排好。”

十分钟后，大家集合完毕，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收容所所长登上了台，宣布学习结束，现在立即分配到各劳教场所去劳动改造，给半小时让大家收拾行李，准备上车。这时我们才发现有五、六辆大汽车已停在靠近大门口地方。后来才知道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是劳改场所的惯例，任何事情从不提前

宣布，要你处于精神紧张、压力重重的状态之下。我和大多数人分配去天津板桥农场，少数人去市郊被服厂，极少数人留在收容所的车间。收容所有被服车间、木工车间和锻工车间，在这里劳动的都是与公安局、收容所的警察或领导有特殊关系的人，或者私下有着权钱交易的人。我班班长蒋国庆就留在收容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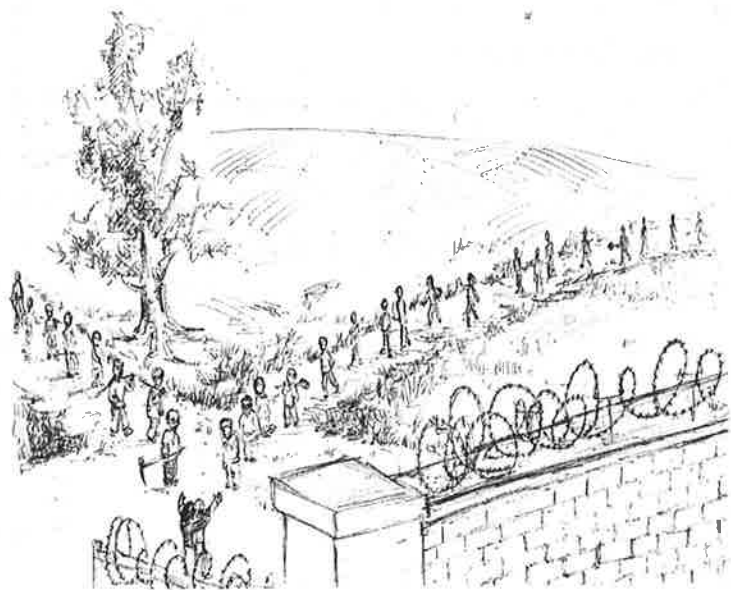
我在本地无家，虽然许多不需要的东西已经由哥哥带回上海，但还有一些日用品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有几件较好的衣服，有相机，有临来劳教所时从银行取出的几百元存款。我赶快收拾物品，打开箱子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几乎满满的箱子只剩半箱了，所有现金、相机、好一些的衣服和绒线衣全部不见了。我要找警察队长报告这一重大失窃，班长蒋国庆马上声色俱厉地对我吼叫：

“你不要借故闹事，现在马上要上车去农场了，队长没功夫来调查你的事。”他气急败坏，“再说几十个人住在一起，怎么就你的东西会丢？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即便真的有东西丢了，你可以到了农场再报告，一个系统马上可以调查出来，去，去，去！你赶快上车去农场吧！”

我当时把这些身外之物也看得很轻，心里清楚，这些东西和现金只有这位蒋班长有机会偷走，只能自认倒霉。



(图三) 田间扛大个情景



(图四) 劳教收工进场

板桥农场 饥饿+苦役

啊，板桥，板桥，渤海湾边一片无法忘怀的田野！秋收季节，烈日下的农作物一望无垠，海风吹来，稻谷低垂穗头沙沙呻吟，冬季来临，留着稻茬的土地空旷寂寞，任凭风雪驰骋肆虐。在你的炼狱中我煎熬了两年又六个月。

我是 64 年 10 月中旬来到板桥农场的，分配在一分场。板桥农场位于天津南郊，是著名的小站米出产地。小站就在它的北面，这里原是一片盐碱荒滩，解放后，判刑劳改的人太多，就在这里开辟了劳改农场，以后劳教人员也越来越多，于是把原来的劳改犯发送到东北和西北去开荒，板桥专门接纳劳教人员。我去时，板桥有四个分场，总场场部在中间，设有板桥医院、百货店、食品店等，全部劳教人员、留场留用人员，再加管理干部及其家属共有一万多人。一分场多数是劳教犯，二、三、四分场以劳教期满留用就业的人员居多。

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泥胚茅草顶的土平房，是过去劳教人员自己陆续建造的，全部统一的样式，门在中间，一圈统铺由木板架起，下面空档可放脸盆和衣物。每屋组成一个班，一般有 30 多人，睡觉也是一个紧挨一个，但每人可占两尺宽，比收容所好一点，勉强可以翻身。白天去田里干活，带着饭碗和喝水杯，中午由服务班的人拉着手推车从伙房领了窝头和菜推到工地分给大家。另外上下午各送一次水，劳动强度很大，不论冬夏一身大汗，饮水量特多。晚上要有两小时学习时间，夏季田里活多，收工很晚，所以有时只学一个半小时，而冬季天黑得

早，至少要学两小时。学习的时候，有时警察队长过来坐一会，内容无非是谈谈对政府宽大处理的感激，或朗读一篇报刊上的歌颂文章，或批斗班里不老实的人(见图一，劳教宿舍学习一瞥)。

犯人每两周休息一天。休息天，先要打扫房间卫生，队长检查通过后才能做个人的清洗工作。每月有一个休息日允许家属前来接见，可以带一到两斤主食，当然只有居住在本地的家属才有条件经常来接见。饭食的质量和收容所差不多，主食以陈年玉米粉或黑的大麦粉做的窝头为主，只有周三和周日有两次面粉做的馒头作为改善，副食极少，早晨只有 1~2 块咸萝卜干或别的咸菜，中午和晚上一般都是煮白菜、煮萝卜，夏天有西红柿、茄子，周三、周日两顿有一些肉食混在菜中。

在收容所饿了两个月，大家都饥饿难忍，盼望到农场吃饱肚子，但踏进农场，饥饿的威胁丝毫没有减弱，吃饱肚子的幻想完全破灭。定粮由农场队长分配，多数人为 36 斤一月，少数年轻力壮的可得 40 斤，老弱病残的为 32 斤。粗一看，这样的定粮和一般市民也差不多，然而有亲身经历的人知道情况何等可怕，劳动强度极大，副食几乎没有，身体长期处于入不敷出、日渐消耗的状态，个个饥饿难忍，面黄肌瘦，大多数人出现浮肿。因每人的定粮不同，规定中午和晚上大家吃数量相等的主食，通常是两个窝头（二两一个），而早晨的数量，除了每人一碗稀玉米糊之外，按不同的定粮分配，有的得一个窝头，有的得半个窝头。又因每月天数不同，而且即使该月为 30 天，也不能保证每早正好可以分得一个或半个窝头，窝头也难以分成四分之一个或三分之一个，所以到月末的五天，就要计算各人余下的早餐数量，来决定有一个或半个窝头，或者没有窝头只喝稀粥。这些窝头是生命的维系，大家经常为窝头的分

配吵嘴、打架。我所在的是反革命班，大家还有点假装斯文，不好意思为此吵架，但每人都精心计算自己应得的份额，为了不致出现差错，月末要做好一张下月的早餐分配表，30多人，每人早餐数量都要清楚列出，特别是一月的最后一周，余额的计算十分复杂，并由各人自己核对认同。每班发两个铁皮圆桶，挑水、送水、早晨的稀粥、中午晚上的菜都是用这两个桶去伙房装的，还有一个大柳条筐用来装窝头，两个铁桶和一个柳条筐就是全班的生活道具。伙房离宿舍有一段距离，远的有200多米，常有领菜的人因偷吃而导致打架争吵的事发生，所以各班都选两个诚实可靠的人前去领菜并回来分发，他们经大家开会认可并每周调换，两人同去，可互相监督，减少偷吃的机会，不过也屡屡发生两人合伙作弊的事情。饥饿“造就”不少人抛却尊严、只求活命。有的人分粥时，从桶底捞厚的分给自己，分菜时，把勺子满的、干的、好的往自己碗里盛，所以每次分菜、分粥都有几十双眼睛盯在分配者的勺子上，如果发觉不公，大家就喊着重分，把已经分进每人碗中的东西倒回铁桶中，搅和了重来，分了一圈还有剩，再以小勺转一圈，一桶分完，正好每人都轮到，才是高招，这是劳教队中特有的分饭奇观。每班的两个圆铁桶是劳教们的生活之宝，早晨的洗脸水和粥、劳动中的饮水、吃饭时的菜、汤和米饭全都靠它，这两个铁桶不愁洗刷，盛粥时总有人最后把它刮得锃光，盛饭时颗粒不剩，菜汤之中毫无油腥，井水一冲就净。

到农场后的第一周，我就受到抬举，被选为早餐分窝头的角色，我觉得大家看得起我，就要尽量公正办事。早上把筐绳往脖子上一挂，就到伙房去点数领取全班的窝头，伙房已有各班交上去的应领数量，领到窝头后回宿舍让各人自报份额进行分发，谁知这第一天就出了问题，全部发完后，筐里什么也不

剩了，我自己应得的一个窝头不知那里去了，领回的总数是不会错的，在伙房要经过数人精心核对，肯定我们之中有人多领了，虽然班上有一张总表列出每人的数量，但早餐只有半小时，吃完马上就要到屋外整队，整个中队必须排列整齐后集体出工，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对着表逐个发放，我分发时各人自报多少就发给多少，要回过来再核对，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我也记不清每个人到底领了多少，他说是按表上的计划领的，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一笔糊涂账。少了窝头当然没人给你补偿，只有自认倒霉。那天上午是捋稻子，就是把稻捆送到捋稻机上，把谷粒打下分离出来。捋稻机不过是一个 3 米长装有钉刺的滚筒，由马达带动快速旋转，把稻捆压在滚筒上就可以将谷粒打下来。大家拿着稻捆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压着稻秆从滚筒的右边一个小跑到滚筒左边，边跑边压边翻转稻捆，丝毫不能停歇，捋完一捆再取一捆（见插图二）。虽然天气还热，但我们都穿着棉袄，以防护手臂被钉刺刮伤。我只喝了一碗稀粥，不到十点已饿得头晕眼花，浑身发软，接着两眼时时发黑，好容易熬到中午。第二天我再发窝头时特别小心，没出差错，不过后来还是有 2~3 次出了错，只能空着肚子出工去。负责送水、送饭的服务队的人，自由度较大，活也轻松一点，他们得知我少了窝头自己没吃的时候，曾主动要送我一个窝头，我想每人的定粮都这么少，我不能吃了他们的让他们挨饿，所以谢绝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大门，在送水、送饭的过程中，就可以托留用人员弄些馒头、大饼之类的食物，而且他们从伙房单独打菜、打饭，得到的数量也大大多于我们干活班的人，但他们不能对我直说他们另有来路，而我十分“傻帽”，饿了好几次。后来我骂他们：

“你们满嘴仁义道德，却不说实话，害我饿得快晕倒。”

“你这个大‘傻帽’，”他们乐乎乎地说，“给你窝头你不要，强充好汉，饿了活该。”

家在天津的人每天都盼望接见日，让家属带两斤主食来填饱一下肚子。农场规定携带食品不得超过两斤，肉菜之类不准带，所以一般都指定家属带天津的油饼或炸糕，油炸的食品油水多些，比较耐饥，尤其是炸糕，糯米粉做的皮，红豆做的馅，价廉而耐饥。家属带进来的食物、用品先要经过警察队长的检查，然后交给劳教人员，接见时间是中午 12 点到 2 点，地点是在开会用的大厅里，但每人限定一小时。由于劳教人员长期处于饥饿不堪的状态，所以接见时第一时间是吃家属带来的食物，狼吞虎咽，一片咀嚼之声，反倒听不见很多谈话声。家属来接见也很不容易，要从市区花一到两个小时坐长途汽车到小站，从小站到农场所在地有 10 多里路，没有汽车，只能坐“二蹬”，所谓二蹬就是当地农民用自行车带人，约 40 多分钟才能骑到。

我进农场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坐在田边，两腿酸痛，用手指一按一个瘪坑，我知道浮肿已经出现。但我在天津举目无亲，无法得到接济，还有什么办法？只有硬挺了。所幸有一个在塘沽工作的大学同学秦×，他听说我在板桥农场劳教，出于同情心，与我父母联系，要来看我，问我带些什么东西，饥肠辘辘的我请父母转告他，只要带两斤大饼，他还百思不解，为何不缺衣物，只要大饼。他还以为我客气，心想带大饼太寒酸了，就买了两斤天津的白皮点心。

在农场进门处必须填写表格，姓名、住址、工作单位、与劳教人员的关系等，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探视。

“你和唐×什么关系？”警察队长问秦×。

“我们是老同学。”秦×答道。

“你是什么时候劳教的？哪一年放出来的？”警察队长马上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吗，只许直系亲属来探望。”

劳教分子相互间不准称同志，都互称同学，警察队长误以为秦是过去的劳教犯。秦听出警察队长的误解，马上解释说：

“我们是上海交大读书时的同学，我现在天津工作，唐在上海的父母委托我来探望一下。”

“你还是大学生？”警察队长惊奇地看了看秦×，“按理说，你不是直系亲属是不允许探视的，今天就算照顾你吧。”

也许大学生的牌子让警察队长有了些宽容的心理。

来了以后，还没开口，我已忍不住了，打开包皮，拿起点心吃起来，还自我嘲解说：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吧。”

这时他注意到周围坐在地上的劳教们都是对着他们的家属狼吞虎咽，他才深深地叹道：

“我实在想不到你们会这样饿！以后我每月来看你一次，尽量多带些吃的来，一定不要饿坏了身体。”

我万分感动，他来一次不容易，天不亮就要从座落在郊区的单位出发，乘车到市区，再转车到小站，最后雇“二蹬”到板桥农场，我和他过去只是一般同学关系，来探望一个反革命劳教犯要冒多大风险！自他来后，每到接见日，由于饥饿难忍，我总盼望他奇迹般地出现，可是他再也没有来过，我心想这样侠义的同学，不至于对我产生厌恶而反悔吧，然而期盼总以失望告终。但我也不能忘怀他这仅有一次的接见，两斤点心无疑表达了他的同情和他的侠义，在孤独无助的困境中，他的义举深深触动着我的心灵。多年后我获得平反，第一件事就是到他那里去“谢恩”，这时我才知道农场接见后，他的工作单位马上收到农场劳教管理处的公函，要求了解秦某的政治面貌

和与我的关系，秦被单位保卫部门叫去严厉责问，并警告他以后绝对不能再来，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了不少大字报，说他与反革命劳教犯勾勾搭搭，一定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幸好他是业务骨干，厂内两派斗争又非常激烈，顾不上他，总算没有打成反革命。当时他怕我父母担心，所以对我父母什么也没说。

一分场内设有一个小卖部，平时只对干部和一些留场就业人员开放，但在接见日，为了表示劳教场所生活设施良好，也对家属开放，这时如果劳教犯身边有钱，可偷偷去买一点吃的食品，但全国都实行凭卷购买，点心要点心票，只有江米条和土红糖可以随便买，江米条是糯米粉和发酵粉混合后，油炸外滚糖粉做成的小条条，很轻，有油有糖，一斤一大包，深受劳教犯们宠爱。间隔一两个月，队长会偶而发慈悲允许大家登记购买已经变潮要处理的土红糖和少量江米条。起先几个月，我还不能适应环境，每天出工时，在破棉袄的口袋中放一些土红糖，实在忍不住，就吃一点，结果不断吐酸水，恶心难受，但过了一会儿，饥饿迫使我又抓一些糖往嘴里塞。

板桥农场位于小站南面，也以种植稻米为主，据说出产的稻米和著名的小站米有相同的品味，但是我没吃过自己农场种出来的大米，作为改善而供应劳教犯的都是糙米，是从外地调来的劣质米。种稻是水田，所需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比别的作物大，我进农场是十月份，接近收割和打谷的季节。起先几周是运稻捆，把田里割下并捆成一捆的稻子背到储存场上，近的约 100 米左右，操作方法是把一捆一捆的稻捆叉在 2 米长的树杆上，再用两根麻绳勒住稻捆连带树干，竖背起来，运到场上，垛成大垛。开始我们每人每次只能背 5~6 捆，后来技术高了，能背到 10 捆以上。傍晚时分，夕阳把天空染得火样通

红，远远向田间望去，只见有两人之高的高高稻捆在田间缓慢地自动移动，根本看不到人，倒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在梦幻般的田野上默默地作业(见插图三)。

干活由担任段长的两个留用人员带领，他们是从留用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标准是：干活技术好，劳动改造好，他们根据一个阶段农活的总量，估算出每天要完成的数量，以此掌握收工时间，所以有时要干到天黑才饿着肚子、跌跌闯闯走回宿舍。

刚打完谷，入了仓，冬季就到来了，北方的冬天来得早，按理冬天农场活少，一年的劳作现在已变成粮仓里的谷粒，土地也冻了，为了让劳教们有活干，在这天冻地裂的冬季就有了“去高垫洼”的打冻方冬活，这是把高地削低，低地抬高，挖毛沟，填荒地的重活。在零下十几度的环境举起大铁锤把铁钎打进地里，刨成为四方形的土块，直到冻层以下，冻层通常都深达1~2尺以上，所谓冰冻三尺，我这时才真正领教，最后用镐和锹把它挖出来。北方冰冻的土块与石头的硬度不相上下，消耗体力极大，打得大家都要脱掉棉袄，光着身子，赤膊上阵，打下的冻方有一百多斤重，两人用一根扁担、绳索把冻方抬到低洼地里，或需要平整的新地里。抬得右肩痛得受不了啦！换左肩；左肩受不啦再换右肩，最后双肩都痛得受不了啦，只好用双手托着抬。一天下来双肩受压处血肉模糊，第二天都找了破布烂棉絮垫在肩上作些缓冲。每天收工时双腿已走不动了，一步一蹭，勉强到宿舍想赶快躺下，可是腿脚都不听使唤，连坑都上不去。时间长了很多人的左右肩上都拱出两个肉包，右边受压多，常比左肩高出半寸多，成了畸形的肩膀。大家称这是“扁担炖肉”，极苦涩的幽默。

不论干什么活都有定额，必须完成。完成工作量的多少用

工分计算，名义上劳教也有工资，工资按工分计算，如果每天都得满分，一个月大约可得 24~28 元，扣去一月饭钱 12 元左右，剩下的可记在各人的账上，休息天无工分，下雨天不出工计一半分。如果你每天挣的工分很少，说明你消极混泡，先在班上开“帮助”会，再长进不大，升级批斗，常常有瘦弱的人，或有病的人无法完成定额，遭到“帮助”或批斗，也会被处罚不准家属接见，用假日，休息日去补干等。如果连续赤字，每月挣得的工分不够饭钱，就有麻烦了。除了身强力壮、刚劳教不久的小青年，无人顶得住这样的折磨。在寒风凛冽的清晨，在朦胧昏暗的傍晚，常能看见一群脸色枯黄、眼神滞钝、衣衫褴褛、肩扛各种工具、腰挂饭盆茶缸的鬼魅，排队行进在板桥农场的田间小路上，犹如游荡的地狱幽灵。

食物极少，劳动强度极高，身体储备的能量逐渐消耗得所剩无几，浮肿是病变开始的信号。每个人都在为“反饥饿”想尽办法，每时每刻都在物色能吃下肚里充饥的东西。干活路过，偶然发现一些烂白菜梆子，大家如获至宝，马上有人捷足先登，拣起来用破袖子一擦吃了下去。我班有一个原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师鹿士举，他的老家在徐州，天津这里无亲无眷，有好几次他在稻田中干活时捉到了癞蛤蟆，他马上活生生的剥去皮一口生吞下肚，其他同学见了都面面相觑，但也没人报告监工的警察队长，如果报告了，鹿同学准挨一顿打骂。四十年过去了，这活生生的一幕依然清晰在目，犹如昨天。鹿同学还有更奇特的本领，那时个个面黄肌瘦，多数人出现浮肿，然而，大家发现唯独鹿同学依然身板硬朗，脸色红润，起先以为他得了浮肿，但又不像，而且他是“流浪汉”，这是劳教犯们专为无人来接见的外乡人起的绰号，鹿同学在天津无亲无友，无人接见，每天啃窝头，喝白菜萝卜汤，为何他的身体没有衰落下

来？他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还是周围的人发现了他的奥秘，观察到 he 很少去茅房，三天才解一次大便，每次的量特别少，像猫的大便一样，只有几小颗，他说他一直就是如此，原来在大学当讲师时，也吃得很少，身体一样胖乎乎地，劳教后，虽然吃的只有窝头，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习惯，至此大家才明白，他所以能够保持胖乎乎的身材是由于他先天的特异功能，他有一副特别优良的肠胃，具有超强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多人都羡慕他，有了这样一副肠胃，就可以顺利通过劳改场所的饥饿关。

还有一些人的“高招”，至今想起来我还要含着泪珠苦笑一番。每次接见时警察队长大多只对食物仔细查看，不许超量，不许夹带鱼肉之类精致食品，但对一般衣物、用品查得比较马虎。班上一位黄姓同学，曾是国民党营级军官，后起义当了解放军，可是全国解放不久就被清洗出来，由于这个历史问题劳教三年。他的老婆和三个女儿都在天津，依靠当工人的老婆维持一家苦生活。一次接见后，他给我看一件棉背心，是他老婆带来的，我看了看，是件普通灰布做的棉背心，中间都缝了针脚，做工倒还精细，不过没有什么特别。

“你再仔细看看。”他兴奋地盯着我。

我这才发觉很软，软得有些异样。

“这是炒米粉做的，”他非常得意地说，“我叫老婆专门做成双层面子，里面有四斤多炒米粉，缝了中间针脚就不会挤成一团。为这四斤炒米粉，我老婆缝制了三天，而我可以坚持吃半个月，吃光了把面子带回去，下次又是一件‘棉背心’！”

当时我很佩服他的智慧，确实高人一等。

班上还有一个叫大吕的，身高一米九，体格魁梧，饭量

大，每顿吃的东西不够他塞牙缝，整天喊饿，也确实晕倒几次。大伙为了照顾他，叫他每天给全班去领早上的玉米粉稀粥，回来分剩下的桶底归他“享用”，他用一块木条把粘在桶身上的粥糊刮到碗里，每次也可有一碗多。有时中午或晚上分剩下来的菜汤也“恩赐”给他，当然，菜汤不过是一些白菜叶子加些酱油、盐，兑些开水罢了。窝头限量，油水不见，汤水稀糊倒灌下几大碗，没过几个月，大吕就变成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上身只见起伏的胸肋骨，骨节棱棱，胳膊细长而肚子比孕妇还突出，好像是个扁平的长方体插入肚子这个曲面中，大伙常拿他的肚子和他的其它部分对比，不乏黑色幽默。不久，大吕两腿浮肿，多次晕倒，被照顾去老弱病残班了。我离开板桥农场不久，听说他因乱吃东西，上吐下泻，一命呜呼。长期饥饿的人抵抗力已极为微弱，稍有病痛，多半归天。劳教或留用人员死了，没有家属来收拾后事的，一律用芦苇席卷好，送到专埋这些“分子”的坟场去。农场边际有的是荒岗野地来埋葬这些“分子”的尸体。

板桥二、三、四分场大都是留场就业的劳教犯，也有一些就业者安排在我们一分场单独干活的地方，例如水泵房、闸门处、看瓜棚等，还有一些就业者安排作我们工地上的段长，协助警察看管劳教犯，他们一般和劳教犯一起干活兼负监督的责任，因为农场都是露天作业，冬天寒冷，夏天日晒，所以名义上虽由警察带队监督出工，实际上他们都躲到附近房屋中聊天或睡觉，发生问题要段长负责。这种留用员工有一点小自由，可以到附近小卖店或大饼店去买食品，他们是过来人，同病相怜，深知劳教犯的苦楚，时间长了，相互有了信任感，只要我们有钱，他们就偷偷地替我们买好食物，当工地上的警察不在时交给我们。有接见的人，可以偷偷地问家属要些钱放在身

边。我无亲无眷，没人接见，于是我要父母在信封里夹带些钱寄来，但信件都要检查的，第二次就被警察发现，叫去训了半天，后来学乖了，让父母把钱寄到另一个劳教犯的家中，请他家来接见时交给我。我和大家处得不错，帮我买食物的人逐渐多起来，后来床下的小木箱中每天都有不少食物，足以吃饱，当然我也不断接济那些天津无家的“流浪汉”。劳教犯出门干活都要集合整队，早上几个班在一起排成队出大门，傍晚收工回来也是一起排成队进门，大门口有几个警察值班检查，所以如何把托买的食物带进大门是一个难题。因为早出晚归，有半年时间都要披着棉袄出工，劳教犯不发衣服，大家都是补丁叠补丁的破棉袄，五颜六色，既挡寒冷也挡风雨。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棉袄左边的里子上缝一块大布，下三边与棉袄缝死，上边开口，形成一个大口袋，把食物放在里面丝毫看不出来，于是破棉袄除了挡风、御寒、防雨，又多了一个功能，可以夹带食物。一般我们都托买大饼，这是直径一尺多薄薄的白面饼，放在棉袄夹袋中有如多了一层厚布，方便且不易发觉，后来很多人学样，都在棉袄里层装备了大口袋，成为劳教棉袄的新款式，一个另类创意。

我很清楚，身体不能垮下来，一定要尽量吃饱，别的都可舍弃，所以陆续把身边仅有的几件毛衣、毛裤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留用人员，换成大饼或馒头。记得我有一件还很新的丝绵棉袄卖给了山西人李文铎。李是天津大学化工专业毕业的，劳教前是一化工厂的技术员，因牢骚怪话太多，被打成反革命劳教两年。他家在山西农村，凡家在农村的，解教后也可处理回农村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李就处理为戴帽回乡，他想家乡的人事关系尚好，回乡总比留在劳改单位就业自由得多。这时他刚刚期满解教，准备回乡。他回乡前，陆续带给我

五斤馒头就算扯平了。我想丝绵棉袄虽好，但对我已无使用价值，五斤馒头可以让我的身体抵挡一阵，也许正好度过饥饿浮肿的极限点，这样算起来，我的丝绵棉袄已经发挥了它的最高价值，所以十分心平气和，一点没有吃亏上当的感觉。

陈年玉米粉做的窝头当然不好吃，尤其是冷窝头，吃起来又硬又粗很难下咽，但吃了容易有胀饱的感觉，比白面馒头更有充实感。一些无人接见的流浪汉，常用一周仅两次的白面馒头和有家属送来食物的同学交换成窝头。

抽烟的人很多，许多原来不抽烟的人也逐渐抽上了瘾，因为抽烟的人一再宣扬抽了烟可以少吃饭，饥饿时，一抽烟马上会减少饥饿感，另外抽烟忘却烦恼，所谓“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吧。香烟是买不起的，而且买香烟要票证，所以抽的都是烟叶，由家属在接见时带来，接见时对烟叶的限制松一些。劳教犯每月可以登记购物一次，可适量购买烟叶，还有的托留用职工在集市上买。每天晚上学习时，人人都用旧报纸卷了烟叶末抽起来，烟雾腾腾，使人很难呼吸，咳嗽声此起彼伏。尤其冬天，为了保暖，窗户全用报纸封住了，烟雾凝聚在屋里，三、五尺以内都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么多烟枪倒是多少驱散了一点冬天屋内的寒气。我一直不抽烟，起先很不习惯，慢慢也麻木了，大概我的器官已经适应了环境。有的人烟瘾很大，不能一日无烟，于是烟叶换窝头的物物交易时兴起来，不抽烟的也开始买烟，以便有机会换两个窝头充饥。

警察干部常作政治报告，要我们认清形势，接受教育，改造从新，关于饥饿问题，有精辟论述，他说：

“你们过去犯罪的原因就是贪吃懒做，吃得好了就想做坏事，所以改造就要限制基本生活，从艰苦做起，还想吃饱吃好如何改造！你们定粮 38 斤，比我还多，怎么会吃不饱？”

警察干部还不断要大家互相监督，打小报告，发现谁有份外的东西吃，轻则开会“帮助”，重则批斗，而且必须交代这些食物是怎么来的，谁买的，钱从何来。所以如有人有了外路子，找来一些食物，只能非常隐蔽地、偷偷地吃。

三十余年了，又一幅哭笑不得的场景浮现眼前。班上有一个原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徐在荣，他因偷听美国之音而被劳教三年，他是一个很单纯的青年，长得也很帅，他的女友是天津芭蕾舞团一位极漂亮的舞蹈演员，原来准备毕业就结婚，结果由于他家和邻居不和，他被检举偷听敌台，从而蛋打鸡飞，他送板桥农场改造，女友受不了政治压力，大哭一场与他分手。徐受了这么大的刺激，还很幽默，但幽默中渗透着心灵的创伤和悲哀，他很愿意和我谈论自己的各种想法和思索。有一段时间他就睡在我旁边，一天深夜 11 点多，大家都因白天的繁重劳动而早早进入梦乡了，徐把我推醒，小声叫我跟他到外面的厕所去。我们住的都是土胚房，厕所离住房 20 米开外，几个班合用一个，当然是所谓干厕，就是在地上挖出一排约十余个小坑，每天由扫厕所的劳教犯把粪便扒到后面的大坑中。这里谈不上洗手池，谈不上冲水，所以厕所永远臭气熏天。我很奇怪，以为他有什么要事找我商量。到了厕所，他从破棉袄里拿出一大包江米条，给我一半装在报纸里说：

“我们蹲在坑上假装拉肚子，赶快把它吃了，如有人来就塞进棉袄里，万无一失，放心吃吧！”

我们两人蹲在粪坑上一边吃起来，一边警觉地竖起耳朵，听听有没有巡查的人或别的拉肚子的人进来。

我不知道后来徐在荣到哪里去了，当时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脸色蜡黄，消瘦枯萎，他曾自我嘲解说：

“我早就像猴了，要像真猴那样在山野自由活动倒好

了。”

一次，一位解教员工偷偷给我送来两斤白面馒头和一斤酱肉，我原本想留着吃上几天，但吃了一些还是饿，不到一小时，我把十个馒头（二两一个）和一斤酱肉全部吞下肚，然而也没有感觉很饱，这一次食量是我一生中的最高记录，当时我瞎猜，是否打破了国内记录？

板桥农场 劳动、难友和解教

板桥农场编班不像收容所那样按进来的先后顺序排列，我们思想犯编在一起，为一中队，共六个班，还有三个中队，二中队到四中队都是其它各种问题进来的。一中队也称反革命队，队中同学也是形形色色，有像我那样所谓思想反动有反革命言论的，有偷听敌台（即外国电台）的，有企图越境的，有国民党余孽、宗教分子等等。农场的管教人员，也就是警察们对反革命队管得最严，还不断向其他中队的劳教犯宣传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反革命队都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以造成劳教中的等级，使其他中队的劳教犯怀抱希望，因为有反革命队垫底，心理上有所安慰。在反革命队内部，警察队长也制造相互矛盾，用以构成监督揭发的气候，鼓励打小报告，鼓励记录他人的反动言论，班内开批斗会、揭发会是家常便饭。也许因为我的学历较高一些，年龄较轻一些，我被指定为班长之一。通常每个班都有两个班长，两个班长间会有矛盾，形成相互制约，便于警察干部掌握情况。一中队大专以上学历的占三分之一多，留学生也有好几位，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又是政治问题，所以场部派来比较能说会道的管理干部，书记是一个军队营级干部，因能力太差转业到劳改农场来管犯人。

我们班大家的理念比较接近，平时都很团结，对少数喜欢汇报、打小报告的人，大家都心照不宣，尽量孤立这些人，或反其道而行之，给他们打小报告，让警察队长不敢过分相信他

们。

班上有一名叫包文达的“二进宫”劳教犯，也就是第二次受劳教处分。天津解放前，包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就是地下党员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的天津市委书记介学恭，天津解放后，包参加了解放军，进军西藏时他已是营级干部。因他年轻，又是大学生，经申请派往苏联留学，和后来的李鹏总理曾是同期留苏同学，相互很熟悉。他于 1958 年在苏联毕业，告别了苏联同学未婚妻，单独先回国内，准备工作、住房有了着落后，再接未婚妻来华完婚。包是天津人，父母、兄弟都在天津，所以他要求回天津工作。谁知回国后政治运动不断，大跃进、大炼钢铁，接着大灾害，遍地饿殍，包越来越感到中央的政策不对头，与他所想象的和在苏联学习的理念格格不入，解放已经十年，而老百姓的生活竟不如解放前，他一连写了几封长信寄给党中央，后又写信寄给他过去地下党的领导，这些人现在都是中央委员，他还亲自去北京见他的老首长。所有的信件犹如石沉大海，老首长们有的叹息不语，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有的劝他干好本职工作，不要去干预党中央的工作。包说过去这些人都是硬汉子，路见不平就要站出来的，现在竟无一句人话，只要自己有吃、有喝、有地位，就心安理得，包极度失望。61 年党内反右倾，他过去的信件一下子都转回天津，批判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更不理解，认为他是通过正常渠道，向党组织表达自己忠党爱国、忠于马列主义的信念而提出的一些看法，何罪之有？我想包是个十足的马列主义书呆子，他竟又写信给党中央和过去的几位老领导，公开表示中央的路线政策严重错误，如果再不改正，他不准备呆在中国了，他那时已是局级党员干部，然而写出去的信犹如泼出去的水，任何回复也没有。他绝望了，又给他的直属支部书记和过去的老首长写

信，说明自己对国内的政策路线，大搞阶级斗争的情况深感失望和无奈，他要离开中国到苏联去了。不久，他就带了简单行李和边境地质图，想从黑龙江边界处偷越出境。包在部队多年，又学过地质考察，应该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但最终还是在黑龙江与苏联的一条界河边，被巡逻队发现抓住，把他押送到哈尔滨公安局。哈尔滨公安局长认为包毕竟是老党员，劝他写份悔过书，马上把他放回天津，但包拒不认错，并表示，党中央的政策一日不改，他就一日不放弃越境的计划。最后就把他送回天津老家交给劳动教养所了。他原在板桥二分场，那里是右派分场，凡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都在那里，虽然期限已过，算作就业，仍然是无限期地劳动改造。由于包为人正直，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哲学造诣，深得周围劳教分子的钦佩和尊敬，农场一般的管理干部无人敢找他谈话，一方面理论上的肤浅无法说服对方，而他倒是反客为主。另一方面，和包的一身正气相比，反倒显出他们的油滑奸诈，以致不敢正视对方。后来包的周围有几个人想跟包一起闯边境，去苏联，行动还没开始，就被宵小打了小报告，结果跟着走的几个人都判了刑，送别处劳改了。对包则宽大处理，送了他一个第二次劳教的处分，分到了我的班上。包来到我班后，管教队长把我们两个班长叫了去，吩咐说，包是一个危险人物，要我们注意包的言行，有什么疑点立即报告。没过几天，又把原南开大学哲学讲师鹿士举叫来，把鹿的铺位安排在包的旁边，并要鹿多与包接近，了解包的思想言行，要鹿每周写一份报告亲自交给这名队长。包喜好哲学，我见包与鹿谈话很多，有时还窃窃私语，我也注意到鹿确实每周都在写报告交给那个队长，我心里很着急，一直拿话点包，暗示他不要与别人多谈想法，尤其是并不熟悉的人，但见包似乎并无顾忌。几个月后，包对我有了

了解，我们之间相互有了信任，这时我对包直接说明了队长所作的布置，要他特别注意和鹿的谈话，包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

“我已经知道了，鹿士举没过几天就告诉我了。”包诡秘地笑着说，“不过鹿士举必须每周交出一份报告，那无非编造一些不痛不痒的言谈而已。”

我恍然大悟，从此对鹿的为人肃然起敬，但我和鹿都从未提起过这件事，以免出现纰漏。

包的人品、知识、学问都是一流的，他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天津市，但他坚持不要



1978年冬，部分改正安置后的留用老同学在天津一餐馆涮火锅。左起为孙燕昌、张瑟、包文达、张海泉。

他们来农场探望接见，常因过度饥饿而胃病发作，他都硬挺下来，甚至照样和人热情谈话。几个月后我已有一些渠道，每天都可以带回一点食物，我要分给他，起先他都婉言谢绝，还说：

“你也需要，我没问题。你年轻，保住身体要紧。”

后来，他看我是真心的，而且我一再解释，告诉他我已有很多渠道带进来，多了也要发霉，他才慢慢接受。我总是乘房间无人时，偷偷放在他铺下的脸盆或饭盒中，我是班长，单独活动的机会多一些。

后来，我去了蓟县采石场，包去了玛钢厂，都是劳改期满

留用人员继续改造的地方。文革后的 1979 年，大批平反冤假错案时，包受到过去原首长的关照，也算特例让他仍留在玛钢厂，调升作一个生产统计干部使用，也算有了一个干部身份。一年后经难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姓戚的女医生，戚仰慕包的人品德操，主动要求与包结婚，才算有了较平稳的生活。但包经过这多年长期改造生活，也已百病缠身，每日药罐不断。戚见到我时曾半开玩笑地说：“老包幸亏遇见了我，是个医生，知道怎样调理他的病体，等于雇了一个高级保姆，还是免费且倒贴他的！”

最近在整理过去的一些书信、文案中，找到一封包文达在 80 年写给我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很普通谈及他近况的信，现附录在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当年如此爱共产党、爱国家的热血青年，对现今社会和当权官僚的鞭挞、内心的伤痛和无奈。

你好，老唐：

很久没有给你寄信了，大概是去年年底，受到你返沪探亲之前给我寄来的一封信，我也没有复信，实在失礼！

刚才受到你 11 月 29 日寄来的信，我很高兴。

现在告诉你一些有关我个人的一些情况：

今年 9 月 12 日中纪委来信通知我：“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转新疆纪委处理，关于你的劳教等问题转天津市公安局处理，请你同他们直接联系。”紧接着，9 月 17 日就受到天津市公安局来信通知我：“关于你的劳教问题已转七处处理，他们答复你。”我给新疆纪委和市公安局七处都寄了信联系，时至今日，两个多月过去了，毫无音信，我打算近日内寄信去催，急也没有，一切听天由命吧！谁让我碰上了这个该死的伟大的时代呢！

由于我没有住房，又没有存款，工资收入又少，即不能在物质上保证女方过着中国水平的家庭生活，又不能使女方感到“夫贵妻荣”政治上的荣誉，因此，纵使有个好心人替我介绍个对象，一谈就吹，从来没有人迁就过我。告吹的原因很简单：一无权，二无钱！我们建设了卅多年，据说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人和人的关系竟然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金钱关系。人们现在却反而向往着五十年代建国初期的社会风气，就连《人民日报》也谈论“信仰危机”的问题。唉，可悲呀！

本月份，我们要加三个班，因此，我最近不回家，我建议：新年那一天，我在家中等你，好好叙谈叙谈。

如果那天你有兴趣到哪儿去转转，我一定奉陪，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为了表示拥护党的三中路线，去年我在生产上干出了个厂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今年九月，又提了一级（三级）。

来吧！我一定请你客！

文达

1980、12、5

有一次我偶然和秦进在一起干活，从而认识了他。他是二分场右派队的留用职工，58年就送来劳教了，那时劳教无期限，直到我进来前才改为有期，期限一到三年，于是，他就变成留场就业人员。秦进因被定为极右派而受到劳教处分，原是解放军中一文职小官，后派到朝鲜作志愿军，担任营部秘书一类文官，写写报道，所以侥幸活着，回国后被复员，安置在天津工作。他是竭诚信奉共产党，处处跟着党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那种人，总能根据报纸上的一些说

教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大灾害时也未气馁。他的妻子魏式昭也是赴朝志愿军，回国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法律，恰巧她和著名右派分子林希翎同班，住同一宿舍。林希翎的男友是胡耀邦的一位秘书，林从她的男友处得到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复印件，她同宿舍的 8 名同学都极感兴趣，急于了解斯大林专制的真相，秦从魏式昭处看到了这份报告，回天津后告知了一些熟悉的朋友。不久，林希翎被打成大右派，株连同宿舍的 8 人，全部打成右派，由于是女性，处理尚轻，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而这位秦进就得了个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罪名。划右派是有定额的，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超额完成，表明反右彻底，该单位的领导可以得到奖励或提升。右派中划为极右的也有额定的比例，秦进在单位中自持理论水平高，文笔好，对党委书记也不甚尊敬，单位中也找不出更合适当右派的人，于是就把极右的帽子给了他。对一般右派有两种处分，下乡监督劳动和留原单位监督劳动，而极右分子就要劳教或劳改，所以秦进来到了板桥农场。秦的妻子魏式昭和同宿舍的同学一样也划成了右派，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已宣布和秦划清界线，直至离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非捏造，高干中已经传阅，北大的民主墙上还用大字报张贴了出来，可是他们几个接触到这份报告的人都划成了右派。1979 年秦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样的处置方式也颇为滑稽，因为不是个别人被错划了，而是除了几个人之外全部右派都收到了错划的决定，官方的定调是反右没错，只是扩大化了，扩大到 99.9% 都是错的！

我也遇见不少同性恋者，大家称他们为龙阳分子，都是男儿身作女的使唤，他们的罪定为诱奸其他男人，伤风败俗。他们中有的十分有才气，有的确实长得细皮白肉，身材娇好，和

女人一般。农场中男女隔开，无法解决生理需求，这些龙阳分子成了高价待沽的风流“女人”。有几个龙阳把流氓队搅得乱七八糟，三天两头出事。他们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一个叫李小敏的，外号天津一支花，面容娟秀，皮肤如脂，一双眼睛非常勾人，简直就是一个穿了男装的美女，出事最多，常被人抓个正着。每天收工后大家只能在室外擦洗身体，一些流氓哥们总是围观欣赏龙阳们的娇好身材和凝玉般的皮肤，有时大喊大叫不止。这些哥们关在这里，性饥渴忍耐不住，早就把龙阳们视若美女，蠢蠢欲动。后来场部就几个长得姣好、出事较多的龙阳调到我们的反革命班来隔离，警察干部认为我们这些反革命不会对假女人感兴趣。自此，我们反革命班也多了些唧唧莺莺之声。我在劳教前不知道龙阳是什么，为什么明明是男生却要装作女生，而有些女的又要当男的？我们反革命队有时也私下议论探讨，有人说这是天生的生理因素造成的，不能怪他们，有人说这是从小生长在不良环境中造成的结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是出于人的基因，也就是 DNA 的结构不同形成的，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很多龙阳君，但在中国当时，这些人都按流氓罪处理判劳教或劳改，然后在劳改场所留用终生，煎熬至死为止。

我刚到板桥农场不久，遇到三中队的张英杰，他听我讲话有上海口音，就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是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原在天津一政府部门做翻译，这下也算他乡遇故知了。收工后和休息日他常来找我，他在天津有亲属，能得到一些食物，几次送我炸酱和大饼。我问他因什么事进来的，他说因为与领导吵架。我想他在政府机关工作，领导都是官，也许看他不上眼，送了他个劳教。后来我发觉他和我说话时总是贴得很近，脸还时常贴到我耳根处，因天热，我觉得很别扭。他说队

里无人可谈，老受人欺负，我想他是把我当亲人了。但时间一长，总觉得他和一般男青年不一样，皮肤细嫩，走路、动作有女人相，而且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还有龙阳一说，于是我就找他队里的熟人打听，才知道他是因同性恋劳教三年，我一听就有了恶心感，慢慢和他疏远了。再说劳动如此繁重，饥饿如此严重，根本没有性要求，我还怀疑自己已经饿伤，丧失了性功能。

由于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所有劳教犯无一例外都长满虱子。难得一天的休息日，先要清扫室内，擦洗门窗铺板，等待警察队长检查合格后才可搞个人卫生，这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捉虱子，翻起被褥床单，查看棉袄内衣，虱子繁殖力极强，一大片一大片藏在夹缝折叠处，滚圆透亮的肚子中露出吸进的人血，蠕蠕爬动，非常恶心。每天晚上虽因疲劳过度而深睡不醒，仍然在梦中感到浑身发痒，人人对虱子痛恨万分，有的人用手指掐，有的竟像猴子一样放入嘴里用牙咬死它，虱子很脆，劈叭一声就断开死了。虽然不断清洗，却无人能消除掉，总是“春风吹又生”。半年后，我有办法每天带进食物填饱肚子，身体壮实了一些，这时惊奇地发觉虱子已离我而去。过去总认为人太脏、不爱清洁才会长虱子，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营养极度不良，身体极度虚弱才是主要原因，这也符合中医所说的“气虚则百虫侵”的道理，这也算是我进劳教场所后，颠覆医学常识的一个“发现”！

板桥一分场有近 800 人，紧靠劳教伙房有一个很小的澡堂，澡池里直立站满也只能挤十余人，平时不开放，只有逢年过节前才烧一次水，轮流去洗，而平时收工回来，一身臭汗和泥水，只能分到半盆温水擦一擦身子。我到一分场的三个月后，快过年了，接到通知说澡堂开放一天，按班轮流去洗，限

制每批人在池中最多呆 5 分钟。我也弄不清我们班排在第几位，反正进入澡池就是一股酸臭味，简直叫人晕倒。因池底一直在烧火，半池水倒是很烫的，不过那是又黑、又滑、又臭的泥浆水。几百人洗澡，从不换水，太少了就再加进去一些。我几个月都没洗过澡，看在水热的份上，进去浸了浸，至多 2 分钟就赶快爬了上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到这个澡堂去洗过，我怕得皮肤病，但有人说这千人池不会得病，不知真假，有否科学根据。

农场常有分场或总场的奖惩大会，有时宣布几个表现好的人提前解教，更多的是对反改造分子加长劳教年限或送劳改法办，每次大会后都要分班讨论学习，人人表态。下雨天不出工，就在屋里安排这样的分班学习，学习的内容还有读报、开“帮助会”、批斗会。警察队长热衷于开大大小小的帮助批斗会，观看罪犯们相互争斗、揭发，一个警察曾经说过，这好比猴子唱戏，也很滑稽。不过大多数劳教犯们还是盼望下雨、下大雨，这时浑身酸痛、疲乏不堪的躯体可以暂得喘息，另外，学习时间警察队长也懒得一直坐在脏臭不堪的劳教宿舍内听大家胡言乱语一通，警察一走开，“畅所欲言”的时刻就到了，时时有些黑色幽默和小道消息，使脑子得到一点刺激，感到一点轻松。

改造农场的警察干部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少数是在警察干校进修两年分配来的，多数是犯过错误的公安干部被发配来的，也带有惩罚和改造的性质。每个警察的历史也是我们劳教犯打听和谈论的话题，以使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鼓动大家写小报告是警察干部管理劳教的手段之一，任何不良言行、偷吃食物等等都可以报告，以此掌握情况。为杜绝抱团，所指定的两名班长也选择互有矛盾，或背景不同的人。

我班另一个班长叫李金太，是河北人，原是一个小学的教师，因反动言行被劳教，我俩相处很好，所以全班也十分团结，互相关心。班中曾有一个叫柴永福的中年人，喜欢打小报告给警察队长，我们发觉后，也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组织了几个人，专门给柴永福打小报告，例如报告他给警察队长起外号萝卜头、晚上偷吃食物等，几次一来，警察也不相信他了，开了几次“帮助”会，大家把他痛批一番，自此，他也老实了。在板桥一分场的两年，我们班一直表现不错，受到过场部表扬，所以我这个班长始终没有撤掉，直到我解教离开我们班。

板桥农场中，确是鱼目混珠，上至留学博士、大学教授，下至流氓、混球什么人都有。一般反革命班都比较低调，属敌我矛盾，是最下等的劳教犯。而那些流氓往往自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仍然强凶霸道得多。我在那时也常受莫名其妙的欺凌、折磨。队中有一异数鲁冠洋，他是天津音乐学院学吹黑管的，回族人，身材单薄似无缚鸡之力的一个文弱者。他是另一反革命班的班长。很怪，不仅他的班中人对他服服贴贴，其他队的流氓、蛮横不讲理的年青哥们也是对他恭敬有之、服贴得很，还开口闭口是“鲁哥”。我俩都是学生出身，也很合得来。几次有那些不懂事的小流氓要对我耍狠、挑事，都是他出来摆平，称我是他的哥们，并让这些流氓向我道歉。一次我问他：“你如此单薄，怎么能征服这些膀大腰圆的流氓？”他的一套流氓经让我深感开窍和哲理所在。他说：“我平时从不欺侮别人，有人困难，缺钱缺粮或真有要办的事我都尽力帮忙，这是其一；但如果有人要欺侮我，那我决不示弱。你总听过流氓中的一句经典：不怕狠的，就怕不要命的！我就用这句话来处世为人。你膀大腰圆，我打不过你，好！你打我一次，我头破血

流，我擦干了再来，再打倒了再爬起来找你打斗，你睡觉了，我来砸门，你吃饭，我来掀你的饭桌。我被打得惨不忍睹，我抄了家伙再上。总之我与你没完没了，我与你玩命了！不管是谁，再大的流氓、霸头几次下来他就吃不消了。这就是我以牙还牙的流氓经。我刚来板桥时也常受人欺，有两次下来，现在所有的人都对我服了。”鲁冠洋的话确实是一哲理，不过我一直未练到他这样的火候！

每天出工，警察队长和段长指定的指标都是高不可攀的，完成指标定十个工分。开头，大家拼命干也只能得到 4~5 工分。遇到附近农民，告诉他们我们要完成的指标，他们都摇头唏嘘，深感劳教犯的艰辛，露出同情的目光。

板桥大多是条状水田，每块田的两边有田埂，使得放进来的水不致漏掉，开春插秧前，每条田埂都必须抹泥、堵洞、加高。队长规定的定额是每人每天抹田埂 100 米，田埂剖面呈梯形，三面都要抹上 1~2 寸厚的土，这是巨大的劳动量，第一天我拼命干，从早到黑从未停歇，只抹了 30 米左右，回到宿舍，人已瘫了，动弹不得。后来一位资深留场员工对我说：

“小唐，一天抹 100 米田埂，全板桥找不出一个人来，超人也不行。他们是嘴巴一抹，随便讲出一个数字，没有人能按他们的要求做，根本做不到，即使抹半寸厚的泥也完不成。你要聪明些，你今天干这一条，明天干另一条，过些天就无人知道谁干了哪一条。泥用不着抹那么厚，你只要连水带泥往田埂上连拍带抹，从远处一看都是光亮的新田埂，不用三小时就可以完成 100 米，甚至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要抹一次的原因。没有人来检查抹得好与坏，完成 100 米指标就走人。”

我恍然大悟，很快就能在半天多时间完成 100 米的指标，完成后还可以坐下休息。只是有些过分老实、有板有眼的年老

劳教犯，每天差很多，完不成任务，我们不能明白告知此中的窍门，只能从另一头开始帮他们完成指标，快接头时多用些泥巴抹上，让这些老实人不知道你是弄虚作假才完成得如此快的。段长们心照不宣，也不来戳穿你，过去他们也这样干，再说，完不成指标要追究他们管理不力的责任，何必自拆台脚。后来，时间长了，我掌握了大田作业每个环节的诀窍，每天都能圆满完成指标。

最苦的季节是插秧期。因新田开发过快，虽然每间房子都住满了劳教犯，而且天不亮就出工，人力还是十分紧张，要种满新田，只有加长劳动时间，提高指标定额。早上三点起床，喝了稀饭就直奔田间，一直干到晚上 9 点，天全黑了，才收工回去。双脚始终泡在水田中，整天弯着腰干活，这样的日子我无法想象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

劳教农场的一切信件都要经过队部检查，为了不让父母焦急不安，我给父母写信总写得乐观轻松，虽饥饿难忍，还要充好汉，说每天吃得很饱、很好，而父母来信也只有安心改造一类的话，但他们从周围邻居、朋友处也了解到劳教场所的景况，隔几个月就寄给我一个食品包，他们和有劳改儿子的邻居家交流经验，得知有一种叫做小凤饼的点心，由猪油、肉末、面粉焙烤而成，体积小，扎实，油水多，耐饥，最适合邮寄给我，中秋节还给我寄过月饼，也拣油多易饱的品种。开头几次常被队部没收，说我贪吃贪喝如何能改造好，还说我要求家中寄食品，表示劳教农场吃不饱，造成不良影响，以后相互了解了一些，就把邮包给我了。当然，我也尽量叫家中不要寄，况且后来我自己也有了办法，可以找留用员工帮忙。家中一直很不放心，65 年 10 月，让我在四川的二哥乘回上海探亲之便，绕道来天津探望。警察书记和他谈话，无非是说我改造能跟上大

流，但还要刻苦改造之类的官话，不过考虑到我二哥几千里路赶来，特批准我跟哥哥到小站镇上出游一日，要我哥哥签了一份担保书，保证按时送我回来。我俩坐“二蹬”到小站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了一晚，当年的小站还是一个小镇，只有 2~3 家用土坯建造的小旅店，几家饭店也是土坯房，摆几张方桌，十分简陋，但对我来说，却是盛大开荤日，我又买了几斤油饼，带回宿舍，分给其他流浪汉享用。二哥第一次见到劳改场所，看到我们这些劳教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排着队出工，又看到我在小站狼吞虎咽的饿相，深有感触（见插图四，劳教收工进场）。

“过去我只是在寺庙中看到地狱鬼魂的形象，”他说，“这次我是身临其境了。”

我还提醒他回去千万不要乱说，免得父母不安。

66 年 8 月 7 日，我两年劳教期满。我想两年期间表现不错，没犯规章，干活积极，还一直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况且部队给我处分时明确指出期满另行分配工作，我以为很快就会离开劳教场所，离开部队，不会再有这样大的压力，可以多一点自由的空间，我还年轻，还能发挥自己的能力。那天晚上，一位场部的管教干部把我叫到场部办公室，很客气地说：

“你劳教已期满，上级批示给你带反革命分子帽子，带帽留用，继续改造。你有什么想法？”

血液冲上头脑，心跳加速，我几乎晕倒，勉强支撑着问道：

“我是因反动言行被劳教的，两年改造中可说规规矩矩，多次受到场部表扬，怎么反而升级成了反革命分子了？”我强忍着满腔愤怒，继续说，“原部队处分时明确说明期满另行分配工作，为何要留场继续改造？”

这位干部文化水平较高，倒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你要知道现在社会上已进行文化大革命，你如果在社会上，早就被斗、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了。我们也把你的情况报了上去，戴帽和留用都由天津市劳改处批定。最近大部分劳教解教的都要戴帽，从某种意义上讲，留场就业就是分配你一个工作，有工资、有活干不就是工作嘛。”

他似乎也很茫然，他知道我的表现不错，在劳教人员中还有一些威信，文化程度也较高，我想他一定察觉到上级的决定和当前来势汹汹的文化大革命有关，所以他又补充说：

“目前你没有其它选择，看以后的政策吧。”

我知道多说也无用，他仅仅是一个执行干部，并没有决定权，只得昏昏沉沉地回到队里。两年来怀抱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当初以为脱离部队那整人的虎口，熬过两年劳教，出来不论干什么，总还有自由的日子，怎么也比留在部队挨整强，不料劳动教养美其名曰行政处分，实则无期徒刑，我的心不寒而栗，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漫漫的苦难中度过？

第二天不必出工，让我收拾衣物，搬到不远处的留场员工宿舍，到那里去报到。中午吃过饭，我坐在树阴下歇息，劳教们都出工了，四周静悄悄，在难得的清闲中，我望着蓝天上几朵静止不动的白云，思绪翻腾。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这好听的名词不过是坐牢、流放、苦役的代名词，毛泽东说“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对反动分子“要给予出路”。事实上无论刑期多少，期满后一概留在原来的劳改场所继续改造，一样的苦役，一样受监管。他们将一辈子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简单繁重的劳动，忍受极度饥饿的折磨，还要费尽心机谴责自己，歌颂共产党，以免挨斗。生存都穷于应付，留给思考的空间确实已经没有了，生动的思想变得一片空白，智慧的人变成低消

耗的机具，为了活命，蜕变为行尸走肉，最后能量榨尽，油干灯灭。原来劳动改造就是要把人改造成为没有思想的机器，吸干他们身上的每一滴血，最后自行消亡！57年为了处理右派分子而建立的劳动教养制度，虽则称为行政处分，实则和劳改没有什么不同，都由公安局劳改处监管，都是到农场、采石场、煤窑，都从事繁重和高危作业，居住条件和监管警察也相同，不少地方劳改和劳教还共居一处。劳教既然是行政处分，所以任何单位都有权给下属人员这个处分，不必通过法院或公安局的审理，无任何监督审查机构，涉嫌报复、假公济私，甚至领导看不上眼的都可以借机送入劳教场所，冤假错案比劳改的更多更广。因劳教者自由度稍大，期限短，当局尽量降低生活标准，住宿、伙食比劳改更差。立一个行政处分的名目，就可以把一大批人当作罪犯处置，判以事实上的无期徒刑，再加“思想改造”的精神折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历代皇朝稍逊风骚！

我戴帽留场继续改造的处理在劳教队里引起不小的风波，大家都无法理解，很多人消极怠工，有些人找管理干部谈话，有些人写报告，还有人直接问场长：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再怎么认真改造不也是同样的结局？板桥总场为此专门召开了全体劳教人员大会，强调党的政策从来不变，但没有人能够直面我的实例，为何像我这样，原来并未戴帽，经过两年改造，到头来反落得戴帽留用继续改造的归宿。最后，总场书记自我解脱般地对大家说：

“你们要知足，现在社会上到处批斗四类分子，什么样的斗争场面都有，你们在这里风平浪静，反而受到保护，有什么不好。党有党的政策，有的人要戴帽，有的人要继续改造，都有内部条条规定，戴帽者要继续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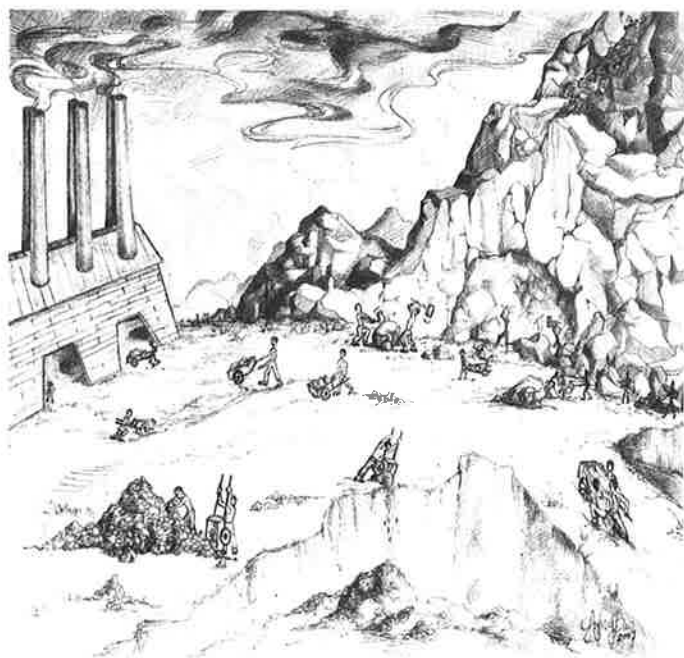
就是你们的出路。”

我被安排在板桥一分场的留用职工队干活，所干的活和劳教时一摸一样，而且也实行工分制，每天按完成的工作量记分，只是每工分比劳教人员多值 2~3 分钱，晚间一样要学习 2 小时，这是继续改造的内容之一，唯一比劳教好一点的是，如果自己手头有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些食物和零用品，休息日也可以到小镇上去买些东西，这就是劳教犯们特别羡慕的“自由身”了。

由于劳教期间，下定决心，咬紧牙关，不管如何艰苦也要闯过两年的期限，所以体力消耗极大，而食物长期欠缺，这时明显感觉自己的体质已大大衰落，我就想利用留场的有限自由，调养一下自己，于是把所有的余钱都花在每天的饮食上了，不料过不几周，就爆发了严重胃病，这是因为长期饥饿之后突然暴食造成的。胃部天天感到胀满难受，吃了东西更难受，只能自己熬一点粥喝，可是每天还要出工干活，吃不下就干不动。留用员工看病和劳教犯也是差不多的，只有大病才能去总场的板桥医院就医。虽说每个分场也有 1~2 名医务人员，他们是从过去当过医师的劳教或留用员工中选出的，但一无医疗设备，二无对症的药物，根本无法治疗，我只能托人从天津市里购买一些中药，如胃舒丸、保胃剂之类，不过未见任何效益。难受时，我总用手绕肚皮转圈按摩，希望增加胃部的活动，达到健胃的目的，时间稍长成了习惯性动作。后来有人老远看见我，就先用手掌做出在肚皮前转圈的按摩状，相互嘲笑一通逗乐。至今数十年来，我一直分外注意饮食，调养肠胃，但终因积重难返，肠胃特别衰弱，消化吸收能力很差，以致身板单薄，体重在常人之下。

在板桥已经呆了两年，大田作业的每个环节都周转了两

次，劳动关已经通过，不论什么农活我都可以应付，食物虽然低劣，但后期总还能设法吃饱，尤其解教之后，买食物的自由度比以前大了，前途虽然一片黑暗，但我记住了解教时那位干部对我说的一句话，“看以后的政策吧”，不料更大的磨难正等待着我。



(图五) 蓟县采石场

蓟县采石场 炼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从劳教收容所送来板桥农场的人也愈来愈多，为腾出空位以容纳新的劳教人员，67年初大批板桥农场的留用员工被调往蓟县采石场和其它新辟农场、盐场，包晓中、陈国忠和我分到了蓟县采石场继续改造。

蓟县采石场是一个劳改、劳教留用单



蓟县采石场，铁轨通往石灰、石料装卸场。背景为已开了一半的小渔山和石灰窑。

位，距天津约 100 公里，从城关到天津有火车，因站站要停，所以需三个半小时，一天只有一班，早晨从天津开过来，下午再从蓟县开回去。采石场的主要作业是开山取石和烧石灰，出产各种规格的建筑石料和石灰，劳动强度特大，危险性极高。有两座山归采石场，一座叫大渔山，一座叫小渔山，我去时小渔山已开了一半。另外还有六个大石灰窑。

采石场的起居饮食和农场同出一辙，全场按工种分成许多中队，中队分成班。有开采班，专门开山钻洞，放炸药点炮；

有大锤班，由年青力壮的组成，每人配备一把 24 磅重的大锤和一把 16 磅重的中锤，他们把巨石打成一尺见方的中石和一些零碎小石，中石是供窑上烧石灰的，小石供打石班再加工；有中石班，用手推车把中石运到窑上；有打石班，他们把小石打砸成各种尺寸的建筑石子，起先是人工打砸，后来有两台土制粉碎机；还有清土运石班，把小一些的石块，用手推车运到打石班的场地，同时清理山场，把废土、杂料清走，把坑填平；烧石灰由烧窑中队负责。有时因生产需要，几个班集中起来组成打石班。我编入以反革命为主的清土运石班。每天都有指标，根据完成指标的多少换算工分，后来有一段时间改为固定工资，分三级：32 元、36 元和 42 元。多半数定为 32 元，极少数拿 42 元，但每天仍有指标，必须完成。

不要妄想这里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下的避难港湾，劳动强度之高、作业危险性之高都是板桥农场望尘莫及的，几乎每月都有重大工伤或死亡事故，断手断脚是家常便饭，谁都不知哪天就会砸死在这乱石堆中，而文化大革命的斗人之风照样刮进采石场，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今天想起来，那些胆战心惊的场面还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背景是采石场当时唯一的土制碎石机，留用员工拉着小板车来装打碎的石子，飞快地推跑到储放场去



窑之间的栈桥



采石场石灰窑外貌



蓟县采石场远眺，铁轨通往石灰、石料装卸场，背景为已开了一半的小鱼山和石灰窑。



与难友在采石场大会厅前留影。



背景为采石场的食堂，也是大会厅。批斗会、奖惩会都在此开。



宿舍留影。



学习时间，每人坐在睡铺前读毛选，再讨论。



宿舍一瞥。



在宿舍看报纸。

山坡上炸落下一大堆石块，我们忙着装进手推车，装了石头的车子分量很重，因为有定额，必须尽量多装，从山上往坡下推，大家都飞快地跑，只有这样才能艰难地控制住车。时常有人绊上石头，车翻人倒，重的就砸断了手脚。蓟县医院说，你们送来的断手断脚的人不计其数。

.....

轰，轰，轰，一串爆炸，山石炸开一大片，小石块四下射出。因为要加快开采，白天在山坡上有人干活时也要放炮炸石。一阵哨声之后，干活的人纷纷躲避，但露天山场，没有多少可隐蔽的地方，山顶还到处有悬石，常被炮声震落。石块一阵洒落过后，不远处，一个外号叫“和尚”的李姓同学，一动不动，大家围上去一看，一块 5 寸大的石块正好击中头部，当场砸死。

.....

开采班大都是年轻一些的留用人员，他们正扛了几十斤重的钻机上下来回跑，一次放炮有数十个炸药孔。山顶离地面有数十米高，悬石险角到处都是。

“刘班长掉下去了！”山崖上有人大叫。

大家跑过去，扶起他来，头部重创，已不省人事。蓟县医院治不了，后经家属要求送天津医院手术治疗。约半年后这刘班长回到采石场来，已似半瘫之人，头部扁了一块，说话不清，动作迟钝，根本不能再工作，还需人服侍照料，留在场里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才由场部发给一些工伤补助，允许家属接回家去。

开采班事故最多。放炮完后，要逐个检查，有时导火线或炸药有问题，成了闷炮，刚去检查却炸响了。经常有人炸死，或掉下悬石，或砸伤。不论在工地还是在宿舍，只要传来消息

说：“某某班又出事了。”这就意味着至少是断腿断胳膊一类的大工伤（见插图五，采石场山场劳动鸟瞰）。

.....

烧窑班半夜收工时少了一个人，班长和领班的警察队长找了半天也不见人。

“是不是逃跑了？”警察队长警觉地问道。

逃跑的事经常发生，有的因为不堪忍受长期苦役，有的因为被开会批斗和“帮助”，有人逃跑，警察干部就要追查线索，把他抓回来，一旦抓住，手铐反锁，或用麻绳捆住押回采石场送禁闭室，每天两顿窝头。如果认为你不老实，则在禁闭室中也反拷手铐，或用麻绳浸水后捆绑，受过这种变相刑罚后，手脚就成了半残，至少也得半年才能慢慢消痛。警察炫耀说：

“我们不打你，不骂你，一样叫你尝尝滋味。”

现在少了一个人，是逃跑了么？

“这样跑出去不是太显眼的么，白天是睡觉时间，逃跑的机会有的是，为什么要在现在逃跑？”有人怀疑地发问。

烧石灰的工种既累又脏，每个人的脸上和身上都粘满了黑的煤粉烟灰，同时还有白的石灰粉，像个大花脸，不擦洗换衣服是很难上街的。

石灰窑有 20 多米高，要从顶上窑口加入石头和焦炭，烧好的石灰从下方的出口扒出，下方出了石灰，上方就要加料，不能停顿，所以是三班制。

“这不是他推石的小车么？”有人发现他的小车，倒扣在窑口旁几米远的地方。

“该不是跌入窑中了？”大家担心。

窑口有 3~4 米直径，炽热且充满呛人的一氧化碳有毒气

体，人常会被熏倒。这里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多次有人提出过简单易行的安全措施，但没有干部重视，因为危险和意外只会落到干活的留用员工身上。黑夜中搜寻了许久，不见踪影，只好等天亮再说。

第二天晚上，在下方出灰口扒出了该人已烧焦的躯干骨架子。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好几天人们见了面也沉默不语，心中想着不知那天灾难落到自己头上。

.....

一天、大家正在干活，来了两个警察，把我班的朱永信押送严管班交代问题，听候处理。

“朱永信公开向无产阶级反扑，这还了得！”场部军代表说。那时采石场已实行军队、公安、干部三结合，军代表掌权。

原来是为了他雕塑的一只牛。朱永信是一个青年画家，他自开画廊，属于个体户，这种个体户都是派出所的重点监管对象。画廊里聚集了一些朋友，聊天时涉及时政，有一个朋友的反动言论被别人检举，于是朱被打成反革命裴多菲集团成员，处劳教三年，期满戴上反革命帽子留用。休息日，他经常画画或做泥塑，他说渔山脚下的红泥很有韧性、粘性，是理想的雕塑材料，他的绘画和雕塑都很有功底。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出生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外甥女六岁生日时我想送她一件礼物，但我又没钱，就请朱永信按寄来的照片画了她和她弟弟两人的艺术人像画，我只能以此表示一下我当长辈的心意，画作非常成功，我外甥女至今还非常喜欢地保存着。朱永信用渔山脚的红泥塑了一头眼睛圆瞪、向前猛扑的公牛，他解释说，牛见了红色的东西，即使一块红布，就会发狂，猛扑过来。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牛的天性。不料有人因这件泥牛雕塑打了小报告：

“朱永信用这件泥塑表达他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的狼子野心，红色就是共产党，就是红色政权，牛就是朱永信的化身。他把自己的仇恨、愤怒化身在牛身上。”

朱永信关进了严管班。严管班即严加管理班，用来做示采石场的所有留用员工，不论是反革命言行、不服管教、逃跑抓回，还是其它违纪行为，都可能被送进去“学习”，少则几月，长则年余，直到你低头认罪，服服帖帖，才会放出来。严管班有四个班长，全是胳膊根很粗的流氓打手，另有2~3人帮助值班、统计、写报告。为防止不堪忍受而逃跑，窗户都有铁栏杆，大灯整夜开着，大门铁锁锁住，再加两名值班的巡视，真是插翅难飞。不论什么问题，进严管班后，先要“端正态度”，就是由打手门毒打一顿，班长给新打手传授经验说：

“不要打脸，不要见红（即出血），要往腰里踢，下档里整。”

无论在农场还是在采石场，警察们确实是不动手的，下面有的是打手，他们私下说这就是以毒攻毒，打坏了有家属告了，自有下面的打手负法律责任，他们没有动手打，也没有明的叫打手来打，没有任何责任。一般开某人的批斗会，警察队长只要说：

“这人不老实，你们帮助他端正态度，好好交代问题。”说完摔门就走。

打手们马上心领神会，开始打人。

有一个送进严管班的人被打得下身几乎瘫痪，家属告上法院，负责的王姓班长就成了替死鬼，被劳教三年，三年后他又被发回采石场留用改造，循环一圈，我们又“见面”了。

朱永信也算时运不济，进严管班后一连挨打挨整好几天，直到他承认自己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牛就是自己内心的化

身为止。

大约过了一个月，全场开大会。

“把朱永信押上来！”主持人下令。

刚进会场，一严管班的班长就猛踢一脚，把朱永信踢倒在会场前面的平台上，然后叫朱跪在地上，这时我们才看到朱被五花大绑。

场长宣布朱的反动罪行，最后宣布处理决定，逮捕法办，劳动改造十年。

大家面面相觑，默默叹息这蚂蚁不如的生命。他塑的牛就摆在宿舍里，干部也早已看到，是什么人要陷害他打小报告？我们几个人私下里想找出这个人，但因朱平时个性较孤傲，关系不好的人较多，终于无法肯定。

朱的案件在他服刑六年后得到平反，当时天津日报和电台以此作为一个错案典型来报道，但朱已全身浮肿，多种疾病缠身，也未得到任何补偿。后来我见到他时，30多岁的人脸色青灰，眼泡红肿，要站起来都是慢腾腾地，他说是一点也没有力气。他说这六年把身体全弄垮了，由于是错案，就算是照顾他，让他回街道自谋职业。他这时既无工作也无劳保，想休养一段时间再考虑开一个画像小店，以维持生活。

.....

我班杨月樵的“帮助”会，王队长主持，两名打手分立杨的两旁，以随时“端正”他的态度。为了什么事要整他记不清了，无非说了一些反改造言论，杨原是天津一评剧团的龙套，也能说说唱唱，用天津话讲平时他说话很“损”，即很尖刻。

“低头认罪！”王队长一声令下，两个打手就叫杨坐飞机，即两手向后上弯，低头弯腰。

“交代不老实，”王队长一再指出，“帮助他‘端正端

正’态度！”

打手听令马上用力掰他的手向上弯，几次下来，杨已是满头大汗。

“我受不了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再给他加加温，看他讲不讲！”王队长呵斥道。

只听得咔哒一声。

“我的胳膊断了！”杨大叫。

王队长还不信，对两个打手说：“给他揉揉。”

这一揉让杨痛得惨叫而晕倒在地，一看他的左臂已如悬物，只靠外皮连接，搭拉下来，这时王队长才有些着急，叫人送医务所看看。这位王队长据说原是干部食堂管理员，因劳改人员太多，分配做了管教干部，他知道自己不能动手，但忘了自己恰在现场主持。后杨的家属来场了解情况，造成场方很被动，结果王队长在干部内部做个检讨了事。后来这位王队长又因偷盗公用财物送回乡下原籍，流氓、盗贼本是一家，偷盗财物毫不奇怪。公安内部有原则，公安劳改干部犯罪犯错尽量不送当地劳改劳教，否则至高无上的管教干部也成了我们自家人，岂不是对管教工作的极大讽刺。杨月樵送到天津公安医院接了断骨，打了石膏，放回家中，约十天后，他带着上了石膏的伤臂笑嘻嘻地回到采石场，我们问他感觉如何，

“太好了，”他说，“如果我的手臂没有打断，也许被打死了。现在我休息了好几天，不会再开会整我了，岂不是好事。”

我们心里酸酸地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他说他的左臂一直抬不高，比右臂细了不少，半残了，但他释然地说：

“那些大盖帽不会再找我麻烦了，一个胳膊废了也值得。”

大盖帽是警察干部的别称，他们的制服帽子是又硬又大的盖儿帽。

.....

突然传出采石场破获一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为首的三个已用麻绳捆绑，关禁闭室，这种捆绑方式俗称裹粽子，把人捆得卷曲起来像粽子一样。禁闭室只有二尺宽，五尺长，一人高，铁栅门，水泥地，进去后无法躺下。禁闭室一连五间，可同时关人，外面有专人值班看守，每天送两个窝头加几块咸菜，由看守把饭盒送入，放在地面上，无筷无匙，再说双手被捆，也无法拿碗，所以关着的人只能像狗一样用嘴啃着吃。麻绳捆久了会终身残废，所以捆 5~6 个小时松开，第二天再捆，一连几天，不死也脱层皮，被关的人浑身伤痕，痛苦不堪。禁闭室故意造成五间连在一起，和外界没有大门围墙隔开，小门又是铁栅门，可以一眼望到里面，就如动物园中供展览动物的铁笼，许多人都不忍走过那个地方。

其时正值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揪反革命黑帮的时期，劳改场所更加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恐怖之下，人人胆战心惊。采石场的管教干部放出风声说，这个反革命集团很大，涉及外地劳改场所，要搞暴动。每天有人揪出，送严管班隔离交代问题，不到一个月，已有 14 名留用员工卷入这个案件，送严管班批斗交代。我们心里清楚都是屈打成招，同时也害怕自己是下一个被点中的人。该案件一直拖了 5 个月，为首的几个始终关在禁闭室中。后来大揪反革命的浪潮逐渐消退，上级公安机关发觉到处揪出的反革命集团都查无实据，于是采石场的这个案件，不了了之，只找些理由，把为首的一个叫王纪生的处劳教三年。采石场场长还在大会上辩称：

“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我们发现得早，没

成气候。”

这王纪生三年劳教期满，又回到采石场，提起这事还心有余悸。

“队长再三警告，任何时候不许对别人提这件事，”他说，“我们只能吃哑巴亏，哪有这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一件事一句话是真的，都是他们叫你这样交代的！”

我听了他的话，恐怖的感觉重新涌现，庆幸自己没有被他们点中，否则皮肉之痛不可避免，但下一次还能这样幸运？

李振华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在开采班做钻石眼、放炸药、点炮的工作。这天有大的炮眼要放炸药，他到炸药库取了足够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李振华走到半山无人处，突然点燃了雷管，一声轰鸣响彻云霄。半里外正在干活的石场上面，不少悬石震落下来。

今天的爆炸特别猛烈而且有点异样，大家纷纷议论。一小时后查出是李振华自杀了，找不到他的尸体，只有许多细小带血的肉块洒在近几百米的山石场上，几个开采班的人用扫帚把能找到的碎块扫在一起，第二天在不远处的山石野草丛中找到他小半个带发的头颅和一只脚掌，他们把这些残块聚在一起，放进木工班赶做出来的小棺材中，好给家属一个交代。

无论年青的还是年老的留用人员都默默哀痛，把泪水和悲愤压在心间。李振华是一个诚恳、坦率的青年，因一点小事，16岁就送进天津市少年管教所收容管教，满18岁后升级进入劳教所继续改造，解教后当然留用，还是继续改造。他起先还抱着希望，想好好干活，尽早回到社会上去，哪知劳动改造不过是无期徒刑的代名词，一进改造所，表现再好也别指望出去，时间长了，他就绝望了，廿多岁便结束了生命，有人说他是一

了百了，倒也没有痛苦了。

在运动批斗不断的年代，许多人承受不了长期折磨，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自残、自杀的事情屡屡发生。自残者假劳动干活，弄断手脚，冒充工伤，以躲避过苦力劳动，侥幸的可能因丧失劳动能力，再无榨取剩余劳力的价值，被遣送回家，由家属养活，也算脱离苦海。我好几次看到在山脚下干活时故意撬下大石头压断自己手脚的事。自杀者更是接二连三，各种自杀方式都有，名目繁多，令人无法想象。上吊、割喉部或手腕的大动脉、以头撞石、从山崖跳下、吃安眠药、服农药，这些方法是最多的。有一人用筷子从左右耳朵眼猛地戳进头中而死，至今让我毛骨悚然，不敢多想。

有一个军代表在大会上说：

“你们是什么？是社会渣滓，死一个算什么，不就像踩死一只蚂蚁！”讲话的口气杀气腾腾，“牛鬼蛇神少一个好一个。”

干部经常讲：“改造要触及灵魂，要脱胎换骨。”他们对脱胎换骨的理解倒是名副其实，“要脱胎换骨哪有不触及皮肉的，皮肉痛了才能深入灵魂中去，否则谈何触及灵魂！”

他们虽不亲自打人，但对手铐铐人和麻绳捆人的方法深有研究，知道怎么铐会让你痛彻心扉，怎么铐会让你手变半残而外部一点看不出痕迹。蓟县的警察好用麻绳来代替手铐，捆绑的方法有很多种，各有不同的致痛致残的功能。有过被捆绑经验的人往往事前就浑身发抖，哀求不要让他手残了。有时干部的怒气大，把麻绳先浸了水再来捆人，据说麻绳干了就收缩，整根绳子都嵌入肉中，时时钻心地痛苦。在蓟县的这前几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批斗高潮期，我在阴森的恐怖中一天挨过一天。

探 亲

69 年我获准请假回上海探亲。自 64 年劳教至今已五年多，家中父母经文革折腾不知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很想见到我，谈谈真实情况，过去书信都是官样文字，一片假话。我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回家探亲必须随带劳改机关的证明信，证明信的大致内容是：今有我场留用职工×××，戴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经批准回××城乡探亲。假期××天，离场日期×月×日，返场日期应为×月×日。到了家庭所在地要把证明信交给当地派出所，回场时要有当地派出所的回条，说明表现如何，何时到，何时离开。这无异于挂上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大牌子，许多人看到这种手续也不想走了。我提心吊胆地请了假，幸好一位张队长比较同情我们这些留用分子，给我开恩，他写的证明信没有注明我是戴反革命帽子。

假期为两周，带帽的路费自理，工资当然没有（摘了帽的，路费可以报销，请假的两周可领基本工资），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买了一些小枣、山楂果之类的土产充充门面。

从蓟县没有直达的列车到上海，需要在天津转车。我换了一身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小站连同蓟县低矮灰黄的平房逐渐隐去，到达天津已是傍晚，我站在月台上等待开往上海的列车。不时有机车喷出阵阵白雾，呜呜地鸣笛启动，一会儿又有列车轰隆隆地进站停靠，人群南来北往，熙熙攘攘。在车轮的滚动中，在车厢咯噔咯噔的摇晃中，人们怀着各自的梦想，飞向遥远的目的地，但人们那能知晓命

运安排的最终归宿？暮色渐渐降临，我心中生出无名的惆怅，仿佛一串动荡不安的音符飘过长长的月台。在这个繁忙的社会中，我是一个弃儿，一个过客，从蛮荒之地偶然来到文明世界，明天又将飘泊何方？在此后的很多年间，我每次来到月台，便会生出这种惆怅，挥之不去。

到达上海站，乘 15 路电车到静安寺。高楼大厦、洋房里弄、车辆灯光，一切既熟悉又陌生。几十个小时以前，还是一排排灰暗的小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衣衫褴褛的苦役犯，现在出现在面前的真是一个新世界。回到家里，怕节外生枝惹麻烦，还是主动到派出所去登记，大概派出所对我这种人也见得多了，报完临时户口，他就说：

“去吧，到时来销假就可以了。”

我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但是我没有告诉家里我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怕他们担心和受牵连，要是街坊邻居都知道我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就是反革命家属，全家再也不得安宁了。父母、兄姐见了我问长问短，每天好菜、好饭招待我，我尽量轻描淡写，酌情讲述一下我的景况。他们还请我去饭店吃饭，送我衣物和钱。但两、三天过后，他们讲述他们的工作、朋友和社会新闻，而我格格不入，无从插嘴。有时来了客人，我只好避开，一是别人的议题我无法参与，二是客人问起我的情况，我怎样回答？实说我是劳教释放的就业人员，难免给家人和客人带来尴尬。有两三个没有被捉进去的同案犯一直在上海，有的正好从外地回来，我们偷偷地碰碰头，谈谈彼此落魄的景况。我感觉十分无聊，我是一个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的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低人一等的人。兄姐都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的灵魂还在游荡，不知飘向何处。我经常独自到街上转转，看看商店

橱窗，东西我当然是不买的，我哪里有钱！我是一直骗着父母，说自己的工资足够有余，其实在那乡下地方、就业场所，倒也不需什么时髦衣服。不过我父母也知道一些真实情况，街坊中在外地劳改、劳教、留用就业的不少，所以他们时常寄一些衣物食品给我，我推说我在天津郊区，大城市边上，一切供应还可以，让他们放心。

一天，我又来到汾阳路的街口，原来的普希金铜像已不复存在，据说被红卫兵砸了，但和郑瑛一起在这里散步的时光却无法忘怀，那时我们无忧无虑，享受着青春的快乐，怀着共同的梦想，对前途充满信心。在这些年的动荡日子里，我几乎忘记了她，纯洁的爱情无法进入一颗屈辱的心。她们家原来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回忆驱使我来到我所熟悉的房子前。望着二楼的窗户，不见了往日绛红色的窗帘，在那窗帘后面，我们曾窃窃私语，度过幸福的时光。父母已经告诉我，郑瑛去香港后两、三年，政策有些松动，郑瑛的父母带着她的哥哥全都到香港去了，逃离了这个恐怖的社会。但我想也许还有什么亲戚住在这里，可以告诉我有关郑瑛的一点信息，我敲了敲紧闭的铁门，出来开门的是完全陌生的脸，询问这里曾经住过的郑姓人家，答说不清楚，不认识。由于我的身份，不敢继续追问，只得悻悻而回。听父母说，郑瑛去香港前来辞别时非常痛苦，而我父母也不忍心把我劳教的事告诉她，只是希望她放开些，找到她的幸福归宿。郑瑛自然以为我已屈服于部队的压力，背弃了她。是的，这样更好！就让她为我的“背弃”而痛苦吧，如果她知道我为了我们的婚事而落入深渊，如果她知道我在劳教所的非人生活，她会加倍痛苦，甚至不愿离弃我而远走香港，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如果我们结婚，她将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每天要受街道居委会的监督，别说去香港，离开街道都

不容易。我觉得对不起她，我更祝愿她重新振作，获得幸福，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此刻默默祈求上帝降福于她。现在我失去了她的任何信息，她也不知我的景况和祝福，只有这熟悉的房子还勾起伤心的回忆。

舅舅又埋怨又挖苦地说：

“你当初没有福气和郑瑛结婚，否则早已是坐汽车阶级了，现在可好，连蹬三轮的也不如！”

后一句结论说得很在理，一个劳教留用人员确实远远不如一个蹬三轮的，在劳改场所能拉平板车已是一件美差了，何况还是在警察的淫威下被管束的苦力生涯！

后来辗转听说郑瑛在香港生活很好，具体细节就不得而知了。在采石场的后期，我在空压机房工作，比较空闲清静，时常一人独处，寂寞时想起远在天边的郑瑛，我翻开抄写下来的陆游的钗头凤，一遍又一遍地颂读：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我在上海住了两周，虽然空虚寂寞，魂不守舍，但父母照顾周到，吃得很好，脸上倒也泛出红润。两周过后，我又回到蓟县。刚踏上蓟县的土地，仿佛从现代文明回到中世纪，进入眼帘的低矮土房、简陋的乡村店铺，把我从朦胧中惊醒，这才是我真实的生活场所！想到过去两周隐埋心头的自卑和揪心的空虚烦恼，我害怕回家了，在父母兄姐的关心下，更生出无限的失望和灰心，混在这里的同类项中，倒还可以什么也不想，另一方面，我的反革命帽子也怕连累家庭。此后，我有好几年

都没有再回去探亲。大约 69 年过后的两年或三年，在一次年终奖惩例会上宣布摘掉了我与其他几个人的反革命帽子，我才又请假回去过几次，探望一下年老的父母。

每次探亲都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采石场过了一段时间，就盼望着探亲，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山石砸中而死，或在劳累中病死，也不知道是否会在劳改场所一直呆下去，直到老死。每天浑身筋骨酸痛，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被起床钟惊醒，慢慢移动躯体，洗把冷水脸，稍稍提起精神，接着上山搬动石块，推车飞跑，在这机械人似的苦役下，心头充塞着空虚和苦闷，总想放几天假，好好睡一觉，清静一下。任何事都要向警察队长请示汇报，看他们冰冷的脸色，听他们从鼻子中发出的哼哼声，承受他们至高无上的架势，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就是命令，就是真理，我虽然反感也得装出一副笑脸迎奉他们的“御旨”，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的。我盼望探亲假，它能暂时摆脱采石场的惊惶、劳累、沉闷的生活，接触一点现代文明，但每次兴冲冲地去，总是失魂落魄地回，自卑和空虚把出发时的好心情磨灭得无影无踪，因此虽然按规定，每年可以有一次探亲假，但我一般都是隔年才探亲一次。

我极少和外面联系，只有探亲时偶然和几个铁杆朋友、老同学联络一下，不留书面证据，以免将来又一次挨整肃，也免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是带帽的死老虎，就这 100 来斤，别人还有自己的前程，与反革命勾勾搭搭就是一条严重的罪行，千万不能给别人落下祸根。

蓟县采石场 我涉及的事件

在采石场我也有一次不小的工伤。我们除了开山、炸石、砸出建筑石块、保证石灰窑连续生产之外，还要完成装火车的任务，几乎每天都有车皮来装石块和石灰，一天 24 小时铁路局随时都有可能调来车皮，车皮一来，必须马上装满拉走。采石场没有专业的装车队，来了车皮就要从各班抽人，时常刚一下班，或到了深更半夜，人已疲乏不堪，管生产的队长来叫了，不论刮风下雨，严寒下雪都必须赶去装车，没有装车机械，全用人工一锹一锹往高高的车厢里扔。通常一个 30 吨的车皮，只安排 2~3 人，限一个多小时装满，车皮不装满是不拉走的，所以人人赤膊上阵，竭尽全力。

一个秋后的深夜，下着瓢泼大雨，队长的叫声惊醒了全班，命令我们去装石灰。一般装车都派青年班去，他们身强力壮，还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次工作量大，要我们反字班一起去。每人借一套油布雨衣雨裤，这种油布是用粗布在桐油中浸泡做成的，不会透水，但非常硬。青年班都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叉，因为装车时石灰粉四处飞扬，十米以外就看不清人影，如果穿了衣服，石灰粉全钻进衣服里面，和汗水结合成为石灰浆敷在身上，摔也摔不掉，全身皮肤都要受腐蚀，光身时，皮肤滑溜，不致有太多的石灰粉积在身上，只有颈背部积的石灰多些，有可能受伤。但我们班没有经验，大家都怕冷，穿上了雨衣雨裤。

一到车站，已排列着好几个 50 吨的车皮，分配 3~4 人一个车皮，立即干起来。随着铁锹的舞动，雨水流进手腕，油布衣袖在手腕上不停地移动摩擦。生石灰在雨水中发热，松解成小块石灰和粉末，粘到有水的皮肤上，犹如贴了一层发热的化学腐蚀剂。不到半小时，两个手腕就被腐蚀而发痛，然而衣袖还在不停地摩擦它，手臂一摔铁锹，就钻心地痛，待咬牙装完车皮，已痛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走向宿舍的路上，虽然雨还下着，但大家脱掉了雨衣雨裤，以免粘上的石灰水继续侵蚀皮肤。我又痛又冷，浑身发抖，上下牙齿不停地颤动。晚秋深夜的雨水，浇得我无限伤感，看着一班人沿着铁轨跌跌撞撞地蹒跚而行，满脸满身的泥灰浆，好像一群鬼魂，我悲愤地想着永远不要忘记今天这样的痛苦日子。踏进院子我直奔医务室，一看两手手腕已有一圈链状的大小不同的红肿溃烂。石灰烧伤的事在采石场经常发生，但医务室只有紫药水之类的外伤药，少量对石灰烧伤有特效的獾油只供应管教干部，或有严重烧伤时才准用。这时我发现两个脚腕也有一圈红肿溃烂，因手部剧痛，使我忽略了脚上的伤口，而裤脚较长，与脚腕的摩擦也少一些。医生是留用职工，半夜叫醒也不大高兴，只用紫药水在伤口上涂了涂。一般人不知道紫药水的功能，实际上它只能使表面伤口结痂，伤口深了就没有效果。石灰有腐蚀性，有化学毒素，所以上面涂了紫药水，下面仍在继续腐蚀。全班有半数，大约十来个人手腕脚腕有不同程度的烧伤，有的比我还



30 多年后，手腕上的伤疤依然触目惊心。

重。第二天我的手腕、脚腕都肿起很高，疼痛难忍，根本无法行动。起先医生以为表面结痂就没问题了，后来我把痂剥开，让他看下面的伤口，才发觉下面仍在溃烂，这才给我打消炎针，敷獾油。我在铺上躺了一周才慢慢消肿，一个月之后，才真正脱痂，行动恢复自如。由于处理不及时，创口又深，结果手腕和脚腕都有一串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高低疤痕，几十年了，每当我注视到这些疤痕，就会浮现出那个风雨之夜的情景，一群留用罪犯光着身子，扛着铁锹，步履蹒跚地走在铁道上。人间？地狱？朦朦胧沌。

整人的酷刑也差点落到我的身上。高文奎原是西北一铝矿的干部，61 年因饥荒难忍，辞职回到天津，成为派出所警察监管的无业游民，为此与派出所常有纠葛，就因他有“谩骂”政府的记录，收容劳教三年，期满留用来到采石场。李俊山只有初中程度，但聪明好学，家在天津郊区，60 年饥荒年代，在市郊之间贩运些食物、烟草之类，有几个要好哥们，常一起议论时政，对国内的惨况十分不满，想跑到国外去，但并无行动和计划。后有一朋友与警察吵架，被揪了出来，殃及李俊山，被处劳教两年，同样在期满后来到了采石场。高文奎和李俊山的思想都有一定深度，看透了留用就业等于无期徒刑的实质，一生就此老死采石场，现在已是 30 多岁的中年人，再过几年，就是出去也是废人。他俩常找我聊聊，开始相互都存有戒心，只是旁敲侧击地谈到何时才能回到市里，回到正式单位去。后来相互有了了解，休息日我们到附近的山岗上交谈，对我们的社会，对劳改政策深感忧虑，如果自己不想办法是离不开劳改场所的，那些已年老等死的留场人员就是我们的前鉴。我们的结论是只有逃到国外去，最好是和共产党中国不是十分敌对的国家，如缅甸、外蒙等，这样，如果被抓回来还不至于枪毙。我

们谈话十分小心，绝不谈及共产党和政府，只谈如何离开劳改单位，这也是多年挨整的经验教训，不愿留用不等于反党、反革命。我们约好分头找找，看有什么熟人、朋友在边境有门路。不久，李俊山因别的知己朋友有反动言论而牵连进去，关进了严管班交代问题。一进严管班，上来就是一顿捆绑吊打，要你交代。一般三天下来，都能解决问题，就是你要什么材料就写什么材料。局外人一听进严管班，马上色变，浑身颤抖，可见它的威力。管严管班的大都是从流氓队中挑选出来的胳膊粗、穷凶极恶、没有人性、六亲不认的人，打起人来从不眨眼。打残了人，告也没用，警察可以不负责任，反正不在现场，与他们无关，与政策无关。

好在李俊山够硬，平时也够哥们义气，虽经捆绑拷打，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我们三人之间的谈话。但我和高文奎胆战心惊、坐立不安，如果咬出这些谈话，无疑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重则枪毙，轻则再劳改。三周以后，见李已开始严管班参加劳动，这表示严刑拷打阶段已过。严管班里有一个姓肖的管文书、材料的班长，是大学生，与我很好，一次乘他看管的时候，我走近李说：

“你还欠我饭票呢，现在在严管班如何还我？”

李心领神会，马上说：

“我是被××咬出来的，根本没事，你放心，等我出来就把饭票还你。”说时对我眨眨眼睛，并轻声说：“我没事，我没事，你放心好了。”

我也知道他性子很硬，不会随便咬人，这才让我和高文奎放下心中的石头。

严管班一般要呆三个月，李关了两个多月后放出来了，但从此我们三人不再聚在一起，最多两人聚一聚，因为两人谈话

没有旁证，一方“坦白”什么，另一方坚决不承认，就无法定案。另外社会上公安六条已经公布，蓟县城楼旁每天都有大布告，不是公审大会就是判刑、枪毙的判决书，被判刑的人一概冠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党的反革命罪，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还是少谈为妙。

周恩来逝世不久的一年，我又回上海了。

当时中央内部斗争激烈，小道消息很多，我们也深感政治气候的不正常，成年累月的斗争、运动，已把全国拖进惊恐不安的状态，人人盼望有所变化。我有一姨夫是民盟中央委员，原任中央一副部长，反右时虽没有右派言论，也被定为右派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上海当一个副局长，我上大学时常去他那里，他也很赏识我，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无话不谈，他有很多高官朋友，知道内部消息也多。我这次回去，从他那里知道不少关于中央内斗的新闻，回场以后，传给了一些人。不久，掀起了追谣运动，我被人打了小报告。军代表立即找我，要我交代问题，很多新闻他们也从未听到过，所以认为我是追谣运动中的一条大鱼，我被停职反省，交代来龙去脉。我只好承认这些小道新闻是我传出来的，我不能涉及我姨夫和其他亲友，一口咬定是在火车上听旅客讲的。军代表当然不信，每天一句话一句话地追问，是谁告诉我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有什么想法，又给哪些人讲过。然后他再找这些人核对，并追查这些人为什么不报告，还听到些什么。看来他们要用这种连环交代来整死我。其实，许多管教干部也很想知道这些小道消息，他们也弄不清中央内斗的实情，弄不懂如刘少奇、林彪那样的中央头面人物，怎么会从红得发紫到死无葬身之地。采石场有一位政治处主任，是场干部中理论修养较高的，当兵转业而来，资格比军代表还老，在长期的接触中，我们都

感到他为人比较正直，对留用职工有同情心，特别对政治犯、反革命犯有一定的保留看法，我平时和他谈得也较多，这次带回的小道消息也向他“汇报”过一次。在我停职三天，坚持由火车上听来而与军代表处于僵持状态时，这位主任出面，告知军代表：

“有些情况他回来后向我汇报过，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处理吧。”

又因我在留用职工中有较好的声誉，不便硬整我，军代表就顺水推舟，转交给这位主任。主任对我说：

“这件事就这样算了，你不要再提这些小道新闻就是了。”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后来在不少人的平反过程中，这位主任都尽力帮助，我原部队的“落实办”来调我档案，研究给我平反时，一姓唐的场长还故意刁难，推说档案在市公安局，不肯给档案，这位主任亲自领了部队的来人，到档案收藏处取出来，并再三告知我部队来的军官，说我在这里长期留用是不恰当的，请他们尽快处理我的案子。我刚到采石场时，知道场长与我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也许有个照应，岂不知他并不认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本家，让我十分遗憾。

苦涩轶事

家在天津的留用人员，每隔 1~2 个月，如果表现好，可以请几天假回去看看，过过夫妻生活，也算人道之举。蓟县是农村县城，比天津的供应差得多，例如蓟县就不供应挂面、点心之类的细粮。许多干警的家属就在蓟县，只能按蓟县的标准供应，有的甚至还是农村户口，连蓟县的供应品也没有。这些干警经常开口要留用人员回天津时带挂面、天津点心、或其它不易买到的紧缺物品。没有谁敢不带，也没有谁敢去算钱算粮票，有了进贡可以减少一点灾难，没有进贡，说你表现不好，连探亲的权利也会被剥夺。有的人还把这种进贡看作领导的信任，心想你要巴结可能还巴结不上呢。

文化大革命中期，全国各地派系斗争愈演愈烈，文斗演变成了武斗，动起刀枪，闹得不可开交，中央下令对一些单位实行军管，公安系统也是军管的对象，采石场来了一个军管组，领头的是一位副营级军官，大家都称他为杨代表，他带来的几个班、排长都到队里来行使队长的职责。杨代表的家就在河北省，距蓟县不远，他到来不足两个月，就集中了三个原是木工的留用人员，在木工屋中为他家打造了两大套家具，漆好以后，用采石场的大卡车分几次运回老家去了。我们问木工间的师傅：

“杨代表带木料来了吗？”

“还用问吗，全是库里最好的木材，”木工师傅不屑地答道，“有什么新鲜，他是首席代表，场长和警察干部拍马屁还来不及，谁敢管！”

劳力反正由采石场记工分，他一分钱也不用掏，还有专车包送到家。奇怪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张旗鼓的斗私批修，每天背诵老三篇，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却变本加厉，打家具之风风靡一时，想想也不奇怪，干部沾点光，并不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大问题，小节而已。

首席代表制作大件，公车装运，下级代表和原来的公安干警紧随不怠，制作小件，自己搬运。除了打家具，还有缝制衣服和加工其它日用品，留用人员中不乏各种匠人，材料、零件仓库里随便拿。有一个时期流行自制烟斗，我们中队的一个维修工天天为他们做义务工匠，还专门派了几个人去山里挖好的树根，他们不仅自己使用这种烟斗，还拿来赠送亲友，经过精心加工的烟斗的确也是上好的工艺品。在他们的心目中，留用职工就像家奴一样，使用他们不是小菜一碟？谁会责问干私活？仓库的物资要拿就拿，谁会责问假公济私？

后来这些军代表大多转业留在采石场当管教干部，他们出生农村，来到劳改单位好似连升三级，过去是一个当兵的，现在农村户口的老婆、家属可以来此定居，下面听他的话、为他干活的人成排成连，他说什么下面都得听，他要什么，下面马上办到，公物随便拿，食物有人“贡”，真是乐得其所。一个姓刘的军代表，在部队是副排级，老婆是农村的，当了军代表，分到了房子，老婆也调来了，很快有了两个孩子。他经常让回天津探亲的留用人员捎带挂面、点心、小孩衣物用品，东西带来后有时间一句：

“一共多少钱，回头再算给你。”从此不再问，当然也不会付钱。

大家心中有数，只能假装大方：“算什么事，你要什么尽管说，提钱就生远了。”

采石场有几个家在上海的，探亲时刘代表就要他们给小孩带新颖玩具。他也小心，只叫自己管辖的那个中队的留用人员来“进贡”，一个中队 100 余人，这些“进贡”量足够他一家有吃有喝。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实在没冤枉他们。

蓟县是天津市郊县城，周围都是山村，中小学教育质量很差，于是留用员工中的大学毕业生就成了给管教干部的孩子补课的义务家庭教师，因为白天要劳动，孩子也要上学，只有安排在晚上和休息日，这些义务家庭教师就得放弃休息来做这份外的工作，其他员工还挖苦他们说溜须拍马。

我的一位好友王树荣，原是北大的一位高才生，因初中时曾组织过所谓反动社团，开始反右就被北大定为极右分子，送劳教改造，后留用“就业”。他的数学根基甚好，成为场长和管教科长的主要义务家教，每到周日，时间全部排满，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全都包下。王树荣曾对我说：

“他们从未给我吃过什么东西，从未有过感谢的表示。我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是二等公民。”

这些管教干部把敌我矛盾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要和我们划清界线，让你来为他干私活，义务家教还是抬举你呢！如何会有一点感激之心？！

劳改场所绝大部分都是男性职工，蓟县采石场 600 余人，女的留用职工只有 10 余人，性欲成了大问题。留用职工的所谓“工资”仅是最低生活费，政治上属于黑五类，无钱无势，一般的姑娘不可能嫁给你，偶尔有个把年轻职工在郊区或农村找到一个，那是上上大吉了，所以采石场内大多是光棍，十余个

留用女工，不论长相年龄，都早已被捷足者先登，结婚登记后可分到一间房，有一排土砖房是双职工宿舍，多余几间供外地来探亲的家属临时居住。大批年轻的单身光棍无处发泄，一到周末，就买了肉食、烟酒去“串门”，边喝边聊，和这些已婚女职工打情骂俏，大家称这帮人为“倒爷”，就是把钞票、食品倒到这些娘们身上。男女苟合之事成了家常便饭，一旦发现，报告干警，“狗男”会送进严管班去管教一阵子，而女的因为太少，也无人力来关押禁闭，大多教训一番，或让女班长严加看管。来探亲的年轻女家属也常有不请自来的倒爷门光顾，正派的职工宁可自己忍耐，也不让家属来这种场所，有些人却不在乎，家属一来，就有倒爷来送礼送菜，白吃白喝何乐而不为，当然出事的也不少。

一些干警也不是吃素的，留用女职工中有几个稍有姿色，被干警看上，常叫去“单独谈话”。这些女职工的后面有不少年轻职工虎视眈眈，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但明知干警在“关门办事”，谁也不敢去招惹，只有背后捅破秘密。有一个叫马姐的天津人，长得还挺精神，能说会道，被一个家属在外地的孙干警看中，经常找去“个别谈话”，不久把马姐提升为女队班长，班长干活时没有定额，只安排全班工作，也算有权有势的位置，大家心照不宣。还有三个年龄小一些的留用女工，长得还可以，是三位干警的“二奶”，经常受光顾，他们的男人只能假装不知道，至多在其他职工面前骂骂咧咧，表示不满，以平息其他职工的嘲笑。

政府安置的留场就业就是一辈子做苦力，混个有饭可吃，这就是给出路的政策，这就是劳改、劳教的最终归宿，所以留场就业人员统称“小无期”。生活也是排得满满的，周一到周六白天劳动，晚上 2 小时政治学习，穿了警服或便装的队长来

队指导。没有时间做任何个人的事情，一切由警察队长统管。与劳改、劳教不同的只是稍有一点自由度，周日如果没有临时装车等加班可到蓟县城里转一圈，看看集市，在僻静处休息一下，另外每年可以请两周探亲假。

采石场的食堂由留用人员操办，但一切采购、付款、分配都由干部食堂的管理员负责，他当然首先保证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吃得好，吃得便宜，所以一切优惠的食品，好的鱼肉菜蔬只有干部食堂能够得到，送到就业人员食堂的都是质次价高、无法推销出去的处理品，因此就业人员食堂的饭菜很差，冬天几乎天天都是白菜、萝卜，最多在其中放些肉食，夏天是大批处理来的茄子、黄瓜，职工经常大骂食堂的作业班长和炊事员。食堂的马班长对职工私下诉说自己的苦楚：

“所有的东西都是干部食堂的孙科长买来的，他说要付多少钱，我就得付多少菜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只有这些菜，就是这个价，你让我怎么干？”

其实大家也明白。有两个没有受过劳改、劳教的工人受雇来干一些干部不愿干，而就业人员又不准干的活，如开铲车、开卡车等，他们在干部食堂吃饭，跟车干活的就业人员看到他们吃什么，价多少，同样的菜在职工食堂的价就要高出一倍。

我们的工资是一块多钱一天，好在发一套单工作服和一双球鞋，缝缝补补加上穿了十余年的破棉袄，穿衣问题就算对付过去了。为保住身体，工资中的绝大部分都花在吃饭上了。周日可以花 1~2 元钱在蓟县的小饭店吃一盘高档菜溜肝尖或普通的炒黄菜（即炒鸡蛋），溜肝尖小盘 5 角 2 分，加一碗米饭或馒头，一共 7~8 角，炒黄菜约一个半鸡蛋的量，热锅多油可以胀发出来一大盘，4 角一盘，有时快到月底，没钱了，来一份烩饼，只要 3 角，倒也心满意足，烩饼是北方人的主食，是直径

一尺多的圆薄饼，切成细条，加些油、酱油和菜炒一下就是烩饼，肚子里也算有了些油水。会喝酒的常几个人凑在一起，要些廉价的酒，边吃边喝边叹苦经，在昏暗的小饭店中度过大半天，再走回宿舍闷头睡觉，等待第二天一早的苦力劳动。

到山场一看便知这种苦力的强度，即使冬天，多数人也光着膀子抡大锤，或者推着装满石头的手推车飞快奔跑，要是装卸火车，人人挥汗如雨，装的是石料和石灰，卸的是石灰窑用的煤，不快不行，车皮大多只停留一小时。每天都要消耗这样大的体力，吃是第一重要的，很多年轻些的留用职工，常常寅吃卯粮，30多元的工资不到半月已经吃光，只好找别人借钱吃饭，每月都不够，几个月下来，发下的工资还不足还债。一个外号叫蔡萝卜头的矮个子，几次逃离采石场就是因为发下的工资不够还债。他姓蔡，人长得瘦小，所以大家叫他蔡萝卜头，真名谁也记不清。蔡每次逃跑后就以讨饭为生，他说讨饭比采石场干活舒服百倍，要到钱多了，还可以到饭馆去吃一顿。蔡萝卜头并非特例，每月中旬以后，开饭时在职工食堂的窗口总有几个职工等着借饭票，月底的几天，好多人只能顿顿以窝头咸菜充饥，有的还要挨饿几天，甚至要求在宿舍躺着不出工，因为借不到饭票，连一个窝头也买不起，不出工下月工资更少，这样的恶性循环也顾不得了。

留用场所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阅报处，学毛选时也要大家自备。有人回家休假偶尔带回一些古文、唐诗，大家奉为至宝，竞相抄阅，其它的书没人敢带来。文化大革命只准读毛主席的书，其它的书一概都是封资修，而古诗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毛主席也写古诗，所以不致被谴责。我当时也陆续抄写过一些，都是感叹生不逢时和暗喻悲惨遭遇的诗，在此复印一、二篇手稿以兹纪念。

一

莫进卅卫与县衙，劝君勤俭做生涯。
池塘积水须防旱，田地躬耕足养家。
教子教孙多教艺，栽桑栽树少栽花。
是非不入东风耳，渴饮清泉闷煮茶。

二

一生风月且遂缘，穷也悠然达也悠然。
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绿杨深处昼鸣蝉。
卷起湘帘，放出炉烟，荷花池塘晚凉天。
正好谈禅，又好谈云。

有一阶段场里需要供应天津市大批建筑用的大小规格不等的小石子，反革命班中年老体弱的居多，我们被安排砸石子，每人一把尖角锤和一把平锤，可以坐在大石头上砸，而后用铁筛子分出不同大小。我们围坐一个大圈，不影响互相说话。警察队长一走开，就天南地北瞎聊一通，也算苦中作乐。有一段时间我们谈吃经，什么菜好吃，怎么做法，瞎聊成了画饼充饥的堂会，我们称之“精神会餐”。大家来自各地，每人都有一些传统菜谱，我搜集并记录了一个笔记本，共 200 多道各地传统或家传小菜。至今每次朋友间聚会或家中请客我都会从中选出几个，作为我的“名菜”。以致得到美食家之雅号。这个本子是劳改年代的档案之一，现摘录一、二页供“欣赏”。

芥菜堆

是北京人春节下酒去火、去油腻的最好佳肴。

原料：大白菜几颗，芥末、白糖及罐子一个。

做法：大白菜去外面叶，拦腰切一片，不要上面叶子部分，把剩下的菜心下半截去根茎，再切成 3-9 截。用绳子捆好，以防散开。

把水煮开，把捆成一段段的白菜放入锅中煮 1-2 分钟，略见开就取出，放入陶器罐中，排满罐底，横截面朝上，上面洒上一薄层芥末，再洒上一层白糖，然后再放白菜堆一层，上面再撒一层芥末一层糖，一直到罐子放满。趁热即把罐子封好，放在温暖的地方，一周后取出食用，味道极佳。

糖醋鱼

小鱼洗净晾干，先在热油中过一下或煎一下至微黄，然后放入铁锅中。一层鱼上面放几片白菜叶子，把鱼盖上，再一层鱼，一层白菜。上面再浇酱、醋、葱、姜、蒜作料，醋要多加。在文火中煮开，总以嘟一嘟一嘟小泡开着煮，约半小时后加糖，糖要多放，较有糖味才行。再煮（一定要小火），共煮 1.5-2 小时，待糖醋变成稠汁即可。其时，鱼骨也酥了，又甜又酸，味道很好。

又有一段时间大家讲典故，要引经据典，不能道听途说，倒让我增加不少知识。班中有一位叫孙裕昌的，大家尊称他为典故专家，天津人，过去家中较富，从小熟读群书，后来钻研医书，中医一套理论滚瓜烂熟，不论干部、干部家属，还是我们劳改分子都找他看病、配中药方，所以我们又称他为孙大夫。他被劳教的缘由是他又研究起佛经，参加了佛教的一个什么派系，当地派出所本来就盯上他了，因为他没有正式工作，

家里还有些钱，这时就“名正言顺”地以参加邪教为名送他劳动教养，文革中家里被抄得精光，孙说：

“抄得比打扫卫生还光亮，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了，岂非光亮！”但孙把一切都看得很开，“很多人都被抄了家，这是灾难，我没法抵挡，只有逆来顺受，我没有气急败坏，也没有伤心失望。”

孙的典故特别多，他讲述的阴阳说和中医的辨证关系至今印象深刻。品种繁多的水果也分为阴、阳两类，如何区分？只要看水果的把，把在上方，水果长在把的下方，也就是水果悬挂在树枝上，属阴，如梨、杏、葡萄都是阴性水果，如果把在下方，果实在上方，属阳，如桃、山楂、香蕉都是阳性水果，阳性水果照见阳光的部位远多于阴性的。阳性水果吃了暖胃，生阳气，多吃一些没问题，阴性水果阴凉气重，多吃易伤胃，伤人中气。经他这一说眼目一清，哪些水果可以多吃，哪些水果不能多吃，这正是家里传统的告诫，只是不明其理，由此深感阴阳之说的玄妙，领略了中医治病内在原理。

相互揭发、批斗，总让你处于高度惊恐与压力下，这正是劳改场所干警们的管制策略和方式。他们把矛盾扩大化，今天整这个，明天斗那个，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更是司空见惯。采石场留用人员张芝伦的事例至今让我思叹不已。张芝伦是旗人，解放前很早就在北洋大学毕业，古文根底很深，毕业后在一个大专教中国文学，他自幼练习武功，据他说练武功必须远离女性，否则泄气破了功夫，所以结了婚的也要控制自己，性生活越少越好，结果他老婆不堪忍受和他离婚了，他们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跟了母亲。张所在的大专后来解散了，并入另一所大学，张因厌烦频繁的政治学习，看不惯校内党团干部

盛气凌人，心想反正一个人，到哪里也不会没有饭吃，就辞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天高地厚。辞职后混迹于天津地方，以教拳为生，成了公安局的打击目标，以非法结社打拳、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不满言论，将他收容劳教两年，期满后带反革命帽留场继续改造。张的古文底子厚，典故很多，还会推拿正骨，一般干警和职工有什么伤痛常请他推拿治疗，所以人际关系还算可以。张为人谨小慎微，说话行动十分小心，心中只惦念他的儿子，一有钱就寄给儿子。另有一姓马的老头，原在中学教中文，因历史上曾参加过三青团的外围组织，被开除公职送劳教，也是带反革命帽的留用员工，两人有关古文知识和典故，常有争论，互不服气，但多半是张占上风，引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让马很光火，时间一长，马的心中忿忿不平，就向干警揭发张的反改造言论，其实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张一贯谨慎，说话出不了大格，但警察队长按惯例要开会批判张的反动言行。其实这队长外号叫陈疙瘩，因脑后壳上有一个肉包凸出而得名，也是经常光顾张处进行按摩正骨的，所以批判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张的脑子死板，以为这下要拿他开刀了，朱永信的事还记忆犹新，关在严管班里遭受毒打，令他毛骨悚然，晚上乘大伙睡了，起身逃跑。当时已是寒冬腊月，室外北风凛冽，冰天雪地，他能跑哪里去？第二天干部派人到蓟县各处寻找，未见踪影，大家心中虽然挂念着他，但逃跑的人很多，也见怪不怪了。过了大约三周，一天下午，我们收工回宿舍，却见他肮脏不堪、满头乱发，半躺在铺上，脸色冻得像猪肝，右耳朵只剩一半，一半冻掉了。问他为何逃跑，这几周在何处混迹，他说怕整死他就逃了，可是跑到外面既没熟人也没朋友，还不敢住小店，怕被警察抓住，再说身上也没几元钱，头几天晚上都是在田野里稻草堆旁度过的，没几天耳朵就冻坏

了，右耳冻掉一半也未见有血流出来，耳边的血也一样冻成疙瘩。后来钱也花光了，不会偷不会抢，只能找人家要吃的，最后实在冻饿得受不了，心想不如回来送进大牢还强一些，所以只好老着脸回来了，至今已有三天没吃到东西。我们看着都不是滋味，把他臭骂一顿：

“你的脑子真是榆木疙瘩，谁要整你，无非是过过形式，什么事也没有，你跑什么！”

有热心的要到食堂去买一些饭菜给他，我嘱咐说：

“给他买稀的、软的，他三天没吃，别把胃撑破了。”

事后警察干部也当一件笑话来传，批判会也就算了。

71 或 72 年，劳改犯太多，留用员工也挤满了，上面有文件下来，可以把农村有老家，或籍贯在农村的，转送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警察查到张芝伦祖籍在河北省沧县农村，虽并无任何亲戚朋友在那里，他也硬被遣送到那里去了，从此以后再无下落，大家心中都暗暗为他担忧，他还是清朝秀才的脑子，如何去适应农村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他一直牵挂着他年幼的儿子，儿子长大了不知能否想到他，认他？

警察干部常教训我们说劳改、劳教、留用场所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这里斗争最激烈。为了营造出这种气氛，不断鼓动互相揭发批判，打小报告，所谓的批判会，大大小小的斗争会更是三天两头有，这样才能造成大家的压力和恐惧。我保存着一份名叫张釜写的揭发马魁（即上述与张芝伦闹矛盾的马老头）。附录在此，可见全是些鸡毛蒜皮琐事。实际上这里也不可能时时有大的问题发生。这也确切地反映出改造场所庸俗低下的政治情调，让人从早到晚不是干苦力就是人与人的相互揭发斗争。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报告情况

我遇到如下几个问题，特向领导汇报。分析考虑，也不见得正确，这也是我的想法和看法。

在三月份时，贾吉武结婚时写对联，由他出词，我也把主席诗词找出来，提说黑手举起霸主鞭，这首诗来，他说不行，不行。好！这全成了“大药味了”。也不知这是怎么（什么）态度。

在 5.25 晚，刘克鹏帮助王怀元学习老三篇，连（练）学习写字和认字。他一劲给“泼冷水”，遭到刘反击，还说对这种混蛋，早晚得吃亏。他是很有经验，说自己的脑袋碰钉子碰的（得）已经成了软硬木的了。人家帮助学习，他不满意，这是不是挑拨打击的态度。

在 5.26，有张以敬、张德丰、王金铭，还有我，在下午三点左右，他说公公 X 儿媳妇，公公调戏儿媳妇的流氓语来了，就讲说牧霓关旧京剧来，唱起高老爷来了，连说带唱，很为得意，如何调戏，说的（得）津津有味，唱的（得）很高兴，不知他这是什么态度。

这以上完全是马魁所说得过去原话和情况！

张奎

5.27

一个叫张林荪的，外号张极右，似乎张极右比张林荪叫起

来响亮，因此警察队长也都叫他张极右。张原是志愿军的副营级军官，党员，复员后在天津百货公司任一部门经理，他脾气直率，在百货公司以右倾出名，58年定为极右分子，送劳教，接着妻离子散，期满后来到采石场，在石灰窑上干推车的活。他开口就骂共产党的劳改政策，说劳改把人改造成废人、死人，劳改就是让你不死不活苟延残喘。一提朝鲜战争，总说志愿军全是炮灰，死人无数，他侥幸活下来了，拣来的一条命送来劳改也无所谓。这个口无遮拦的人，不知为什么，警察队长却对他网开一面，也许因为他是营级干部，闯荡过朝鲜战场，当过百货公司经理，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的那种豁得出去的人，也许因为不知他将来是否会出头，总之始终对他比较客气。警察们的顾忌倒是应验了，78年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得到改正，回到百货公司当经理，党籍也恢复了。据他说，原来把他打成右派、送他去劳教的上级干部变成了反党分子，下台了，所以他得到一个好成绩。以后有好几次警察干部找他帮忙给子女安排工作，买紧俏商品。

一留用职工叫顾金声，他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邵力子是国共和谈代表，谈判后一直留在解放区，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外孙，邵力子的儿子早就死了，他的小女儿嫁给天津顾家。顾金声中专毕业后在天津一工厂当小技术员，因为他对大跃进、大饥荒不满，60年从天津跑到广东想越境去香港，被逮住后在广东劳教矿场劳教三年，这时他才20岁，期满留用期间，又与几个人商量再度越境，又是事未成而先成了阶下囚，这次押回天津劳教，在板桥农场就和我一个班，后一起调来采石场。回天津劳教后，他曾两次写信给外祖父请求搭救，帮助他离开劳改单位。邵力子拖了一段时间后通过他母亲

给他回信说：

“我虽位居高职，但确实有职无权，救不了自己的亲外孙，你只有好自为之，好好接受改造，争取从宽处理。”

顾金声也不保密，还把此信给我看过，他想让场里领导知道他是邵力子的外孙而有所照顾，或许可以提前释放。一次全场开大会，场长讲话说：

“有人想走歪门邪道，想提前放回社会，这是做梦！别说你是国民党的元老，就是共产党的元老也不能徇私枉法，你只有老老实实地改造，立功赎罪，才有可能提前回归社会。”

从此顾金声就不敢再提了，期满后和我一样戴上反革命帽留用。其实，板桥农场也好，采石场也好，其它劳改单位也好，没有听说有一个共产党高干的子女，邵力子自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放在那里不过是一个摆设，早有自知之明，更何况后来的文革，就是郭沫若也要彻底否定自己，连自己的儿子也拯救不了。我对顾金声说：

“糊涂的是你自己，你实在太没出息了！”

众所周知，全国有十大右派，有谴责党天下的诸安平、有提出政治设计院的章伯钧，有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罗隆基，有呼吁向资本主义学习长处的章乃器等等，而提出轮流执政的大右派黄心平也是其中之一。

67年我来到采石场后，一天有人给我介绍说：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右派黄心平。”

我看这是一个 40 岁左右的中年人，和我的想象差距很大，原以为罗隆基、章伯钧这样的大右派都是学问很高、早已著名的老头，所以才会提得出敏感的政治问题，而这个人在反右时最多将近 30 岁，是不是采石场的人在揶揄他，十分怀疑，后来

警察队长证实他就是提出轮流执政的，他提到了国家制度的实质问题而成为当时全国十大右派之一。

黄对自己的问题始终没有“认识”，有时对国内形势还要在留用人员的学习会上发表一下不入流的想法，每当运动来时场部常拿他当活靶子，召开声势浩大的全场批判会，黄已久经锻炼，我行我素，只是默不作声，听从批判而已。也许他算全国闻名的大右派，给采石场添加了一些身价，所以每次都是“批判从严”，没有把他再送去劳改回炉。

我与黄相处十余年，深感他实在是一位十分上进好学，有钻研精神，坚持自己理念的典型知识分子。黄多次给我讲他如何成为一个主张轮流执政、要共产党下台的大右派的。黄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某中学教书，整风开始时，天津市教育局要黄所在中学派两名教师参加局里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一些年龄大的老教师都不感兴趣，没有人愿意去，黄是一名青年教师，也不想去，经校长再三动员，他才答应前去充数，校长还一再告诉他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建议尽量提。开会时，黄本来也不想发言，但每个人都必须谈一谈，黄是历史教员，就随便提了一下说：

“像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是两党制或多党制，定期选举，各党轮流执政，有互相监督和促进作用。而且周恩来总理早在国民党时期就提出要求两党轮流执政，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

黄说他的发言只几分钟，不过是对国外多党制政体的一种介绍，根本没有提要共产党下台一说，且轮流执政也要全民选举，那个党好，老百姓拥护，自然就执政，这是很公平的事。但第二天，《天津日报》报导了天津市教育局这次帮助整风的鸣放会议，提及某中学黄心平建议我国采用多党制，像西方政

党那样轮流执政。反右开始后，这一轮流执政就成了要共产党下台的典型右派言论，与“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等都定为恶毒攻击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的极右言论。不久黄就在学校中被批斗，定为极右分子。黄后来了解到那天在教育局发言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原单位受批斗并定为右派分子。黄心中不服，一再说明他去开会在校长动员去的，发言仅说明了一下西方的多党制，没有要求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更没有说过要共产党下台。但《人民日报》已在批判说有的右派分子叫嚣要实行多党制，要轮流执政，已形成全国性的批判形势。由于黄不认错，不认罪，天津市教育局和他所在学校再拿他当活靶子送板桥农场劳动教养。在板桥多年，黄始终心中不平，一再私下里说鲜花毒草必须由历史检验，反右是政治大阴谋，经常受到大会小会批斗，最后又以他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判劳改管制一年。一年也好，十年也好，期满后一律留场就业，因黄改造期间表现很差，始终坚持反动立场，就调来采石场留用改造。

79年右派改正，黄心平得以回到原中学，仍然教历史。57年整风时他已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友，正要筹备结婚，由于他成了大右派，又送劳动教养，在组织的不断威迫下，大哭一场离他而去。改正后，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都改善了，周围来介绍女友的很多，但黄说他对天津已无好感，整天还在做着反右批斗和劳改囚犯的恶梦，他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改正两年后，他在成都老家的妹妹为他介绍了一位农村长大的小姑娘，朴实、美丽，因为出身富农家庭，希望离开老家免受歧视。结婚不久，黄的妹妹为他联系调回成都郊区一所中学，该校校长一听是改正的大右派，居然十分欣赏，说：右派都有真才实学，太好了！马上开出商调函。这样黄很快就去了该中学，仍

然教他的历史课，过着清心寡欲、少有结交的小家庭生活，大右派黄心平总算有了一个归宿。黄的妹妹正好与我的一个哥哥同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时而相互有些间接的信息，我出国后就很少来往了，现在应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

采石场中有一个医务所，一个医学中专毕业的姓高的干部当主任，下管两名留用医师，一名是姓宋的原是国民党军医，解放后被判刑后留用。另一名姓辛，北满医大毕业，原是天津铁路医院主任医师，因读大学时曾经集体报名参加三青团，虽无任何反动活动，但交过团费，1957 年被劳教三年，戴反革命帽留用。他太太原在同一医院当医师，他关进来了，医院党组织就怂恿她离



难友辛石夫妇，93 年回国探亲摄。辛为医师因在大学时曾加入过国民党，虽后早已脱离，仍被送劳教（1957 年）辛夫人也是因学生右派被送劳教，其原夫因右派劳教死亡，与辛同为难友，后结为夫妇。

婚，后代替了辛的主任职位，也算“肥水不外流”。宋、辛两人资格老，医术不错，所有警察干部生病都要他们来诊治，那位高主任大多给我们留用人员看病，反正离不开阿斯匹林、感冒退烧药和外伤用的红药水、紫药水之类，不会出医疗事故，如果留用人员有大病、急病，就得由宋、辛两位来诊断，但他们开药有严格的限制，开好药或建议送医院必须得到高主任的批准。

劳教期间和留用期间，大家都是一天熬过一天，根本无法

顾及个人卫生，比如刷牙，每天早晨在疲劳的睡梦中被哨声惊醒，赶快起来擦一把脸，醒一醒神，急急忙忙喝了粥，就上班了，刷牙已属奢侈，买一支牙膏也是一笔大开支，再说也没有时间。晚上要学习，学习结束想刷牙，可是没有水，水管在几十米以外，即使端来了水，也无法倒水，住房外面是泥地，冬天倒水结成一片冰，夏天倒水满地泥泞，所以住房外面是不准倒水的。我已尽量注意，早上有可能就挤出时间刷一刷，它的作用多半是自我安慰罢了，长此以往，牙齿就接二连三地出问题了。劳教期间，牙痛剧烈时只能用块破布塞在嘴里，咬紧牙关，有几次痛得彻夜难眠，早上起来半个脸都肿了，还得照常出工，完成定额，警察队长说，牙痛不是病，医务所的医师也是被劳教的人员，他们最多给几片消炎片，绝对不敢给你开病假条。

到了蓟县采石场，属于留用人员了，周日有了进城的自由，遇到剧烈牙痛可到城关边上的一家牙医诊所去自费看病，那里的两位牙医都是“野郎中”出身，一位原是部队卫生兵，转业复员下来的，另一位是父亲家传的，在医专进修过，他们的技术仅限于补补小洞，你要是去诊治，除了小洞可以给你补一补外，就建议拔除，他们本来就是拔牙郎中，我们留用员工的命都不值什么钱，一颗牙就和一只虱子一样不值一提，就由他们去拔了，他们也知道采石场来的都是刑满犯人，对于他们来说，无须区别劳改还是劳教，服刑期间还是期满留用，反正都是牛鬼蛇神，对我们态度相当恶劣。我多年来一直在他们那里诊治，为巴结他们，让他们尽量多保留几颗牙，每次从上海探亲回来，都送他们一些时兴的弹性巧克力和上海点心，在当地都是希物。他们看我还有些文化，长得也不算贼眉鼠眼，再加多次“进贡”，所以对我还算客气，要拔的时候尽量先解释

一下，就是这样，我在蓟县的十年间拔掉了 9 颗牙，当我得到平反离开蓟县的时候，走在马路上常被尊称为“老伯伯”，虽 40 刚出头而头发已见白，牙少嘴瘪，皱纹纵横，犹是一个老翁了！

劳教算行政处分，宣称有工资，有半公民权，所以一切生活用品要自备，没有工作服等劳保福利，每天繁重的露天劳动，衣服磨损得很快，补了又补，一层叠一层，北方天气，一年 365 天，几乎天天不穿也要带上棉袄，我的一件破棉袄，每天出工带着，不知补了多少次，后期在采石场劳动时，因生产“工业产品”，发有单工作服和鞋，但这件棉袄还是天天带着，刮风、下雨、落雪、严寒都离不开它，十余年下来，补丁叠补丁已找不到哪块是原来的本色布了。有时撕破一角，棉花中居然掉出稻粒来。这件破棉袄是我艰难岁月的见证，它伴随我近廿年，我平反后曾想把它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后几次搬房，它占了半个箱子，确实又重又脏又油腻，无法和其它物品放在一起，两年后我忍痛把它丢进了垃圾桶，抛弃它前特地称了一下：八斤半整。这可能也是一个吉尼斯纪录了！

劳教中吃饭问题是最大的，衣服不管怎么破还可以补，补了仍可保暖，而维系生命的吃，却无法打补丁。“饥饿疗法”是政府的重要改造方法之一，让你在饥饿中不死不活地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让你的思想变成空白，头脑中只有食物和饥饿。有一个叫潘家衍的同学，原是南开大学数学教师，因为他不是天津人，无人接见，人又老实，饿得饥不择食，田埂上的野菜、拣来的白菜梆子都往嘴里送。一次一位刚解教的就业人员为庆幸解教，看他可怜，想送他一些吃的，问他要什么。

“你送我大饼油条只能吃饱一次，”他想了一下说，“倒不如给我一些食油，我现在就是缺油水，一瓶油可以吃不少时间。”

这个解教人员不久就买了一瓶麻油给潘，潘感谢不已，当天就吃了两次，每次一匙，临睡前，忍不住又偷偷喝了一匙，他想让他干涩的胃滋润一下，不料胃已长久未见油腥，这三匙油下去犹如加入了过多的润滑剂，肚子里白天吃的窝头、白菜渣子全部从屁股流了出来，他刚躺下睡觉，就赶快跑茅房，裤子上已有一大片麻油渍和粪便，又臭又香说不出什么味，才回到统铺，没过 5 分钟，又要去茅房，整整闹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已站不起来，大家把他抬到医务所，他说出前因后果，大家哭笑不得。他在统铺上躺了两天才能出工，肚子里的糟粕连带人的元气一并让这麻油带走了。干部队长又气又恨，他未犯法犯罪，不便处分，只好把他臭骂一顿，躺着休息的两天算作旷工，说他咎由自取。

偶尔有家属探望或有人回家带来一些旧报纸，它们就成了场里的宝贝，有文化的人都抢来看，因为场里除了毛选别无其它书刊，只有报纸还能带来一点新闻和消息。报纸看过了是不会扔掉的，会被整齐地叠放在统铺褥子的下面，到了冬天可以用来糊窗户和墙上的裂缝，以防室内有限的热气泄漏出去。报纸还可以卷烟，香烟贵，专用的卷烟纸也不便宜，所以都用报纸裁成小块来卷烟叶。报纸还有一个用途是代替草纸擦屁股。由此可见旧报纸的可贵，如此利用，已把它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劳改场所，菜根碎纸，破衣零布都自有归宿，只有偶尔打破的碗碟才会随便扔了。

农场的茅房（即厕所）也是可以列入吉尼斯记录的，每个

茅房挖有七、八个长方形的坑，人蹲在上面，此坑与后面的长沟相通，粪便满了就推到后面的长沟中，茅房四周是半墙，上面有茅草顶，以挡雨雪。冬天刺骨的寒风从坑下窜上来，刚蹲下，屁股就冻僵了。一到夏天，则臭气熏天，粪蛆满地满墙地爬。我实在无法时才会到这茅房去，一般尽量在白天作业时间，找有树丛草堆处方便了事，既可清静片刻，也避免了恶臭和粪蛆之扰。一切厕所、茅房都归老弱病残班管理，每天由专门拣粪的把小坑中的粪使用耙子推到长沟中，长沟满了再用粪车装运到粪肥堆积场，让它自然发酵，作为来年的肥料。拾粪这个工种虽是臭气冲天，但却是劳教场所肥缺，因为无定额，挑了粪筐可到处走动，顺便还可偷偷到小卖部买些食物之类，所以只有老弱班中与干部队长有特殊关系的才被安排。一般老弱病残还无法抓到这块“天鹅肉”。

冬天的火炉
值得一提。北方
的冬天很冷，尤
其是我们劳教犯
住的大泥房，房
顶、窗户、门框
全透风，有的墙
上还有穿透的裂
缝，更何况每个
人都营养不良，
枯干的身体特别



蓟县采石场的冬天。

怕冷，所以当室内装了火炉后，人人自觉照料。发下的煤块有定量，都是劣质煤，带有很多不能燃烧的煤石，炉子常因燃烧

不良而熄灭。后来有人想出了办法，干部院中所有宿舍的烤火用煤都堆在一处，且都是优质煤，干部与家属是随便取的，班里就委派挑水和病休在家的去干部院中偷几大块夹在破棉袄中带回来，后来到了采石场就更方便了，烧石灰的窑上必须用好煤，乘上山干活时每人在棉袄中夹带 1~2 大块，这样宿舍中的火炉就经久不熄了，外带来的和偷带来的食物可以煮着吃个热乎乎。这也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活学活用吧！

76 年 7 月 28 日，那时我在开采班机器房看管两台大型空压机，供山上风钻的空气动力。住一个小宿舍，共六个人。半夜，床突然猛烈地摇晃起来，因常做恶梦，所以只感到梦中有什么不正常，而睡在靠墙的大秦已一窜身子、光着上身往外跑了，边跑边大喊：

“快跑！地震！”

这时我和其他几人才觉醒过来，跌跌撞撞连跑带爬到了外面大院中，院中已聚集了各个宿舍的人。房屋不住地摇动，食堂的山墙很高，犹如一个长腿女人在扭曲地跳舞，像要倒下又摇了回去，四处传来东倒西塌的声音。不一会儿，警察队长都来了，宣布谁也不许离开大院，就地坐着，警惕坏分子捣乱。

第二天没有出工，在露天开会，场长宣布这两天不出工，到仓库领木料、竹子，搭窝棚，晚间一律住进窝棚，后来几天余震不断，直到周末才允许我们出去走走。我和辛石大夫一起跑到城里，原来的长途汽车站早已关闭，大厅成了停尸房，大热天里，一股尸臭迎面扑来，听到小道消息说，整个唐山市成了一片废墟，瘟疫弥漫。回到采石场，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传说老天震怒，正巧，两个月后，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故世，采石场也设了一个大灵堂，不论带反革命帽子还是带坏分子帽子的留用人员都要去灵堂祭拜瞻仰，大厅中间摆着大幅照片以代替遗体，四周摆满花草水果之类的祭品，管教干部事先已经关照好，一定要严肃悲伤，可以痛哭出声。轮到我们这些留用员工去瞻仰时，也是一片唏嘘哀痛之声，但大家都用眼神互相偷视，却看不到丝毫泪影，只有一个叫李××的青年人居然嚎啕大哭，久久不能平静，事后唐场长在大会上表扬李××说：

“毛主席的逝世是我国人民的最大损失，人人都伤心悲痛。我看你们当中只有李××真正有所触动，痛哭流涕，悔恨过去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有悔改表现，而你们中的大多数肯定在暗地里幸灾乐祸，表面上装得悲痛，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

他讲得也对，不正是毛泽东的专制统治造成冤狱遍地，全国有多少劳改、劳教和强制留用的改造人员一直在受着无限期的煎熬，怎么会为毛的死亡悲痛？后来有相好的哥们问李××怎么回事，李说：

“我一到灵堂就想起了我自己，毛一死，全国各地处处摆起了灵堂，而我快要死无葬身之地，有谁来怜惜我？我痛苦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世，年纪轻轻已毁了一生。”

我们恍然大悟。

刘广春是一个很风趣的家伙，我在采石场见到他时年仅二十七、八岁，但已有 8~9 年长的劳教历史，未满 17 岁就进了少年管教所，起因是几个青少年邻居一起胡闹，偷了粮店的粮票，到 18 岁升级进入劳教所，以后当然留用继续改造。他喜欢武侠小说和评书，记住不少典故。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休

息天，他给大家讲笑话，说到金瓶梅中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事，他说西门庆事前曾问王婆一个男人如何才能讨得小女子的喜爱并乐于成就好事，这时刘广春卖一关子，叫大家猜，我们没有一个猜得出，他就说：

“很简单，五个字，”他伸出手掌得意地说，“潘驴邓宵闲。就是你要长有潘安之貌，或有驴子一样大的鸡巴，再或如邓通那样有钱，如果这三者都不具备，那你就天天围着这小女子转，给她办事，不让她有空闲和别的男子接近，也就是闲着无事耗着她，那一样能办成。”

当时我以为他说书胡编，后来我看到金瓶梅全书，这个情节和这五个字确是出于金瓶梅真本。刘广春讲三国、水浒等都头头是道，常有噱头引人大笑，所以也深受我们这伙戴反革命帽的欢迎。

刘广春是一个颇有礼貌和道德的人，凶的不怕，善的不欺，从未听说他在劳改场所又犯过什么新的错误，但他还得呆在这个似人非人的场所，他给自己起了个代号叫“1157”。

“我进了少年管教所就给了牢号 1157，”他说，“我当时认为这牢号也当不了饭吃，随便什么都行，谁知我这号犯了天意，1157 就是遥遥无期的谐音，我终于明白我这辈子是完了。”

后来大家就叫他“1157”，而不喊他的名字。

2002 年，一位获得平反的反字号同学曾返回采石场，看看当年劳动改造的地方，看看一起劳改的同学现在的处境，回来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次见到了一些熟人，过去还很年轻，现在都变成干瘪老头了，真作孽！”还特别提到了“1157”，“我已忘了他的姓名，但‘1157’忘不了，他也成了一个枯干老头，一身病

痛，算是照顾他，安排他看大门了。他见了我还喃喃地说，我们是遥遥无期啊，不知何日就死在这里了，我死后，只要在木牌上写上 1157 就满足了，这四个数字跟了我一辈子，聊作纪念了。”

1157 从 17 岁为了一些小错送进劳改单位，现今已有 60 多岁，还在那里继续改造，不知“改造成新人”的目标何时才能达到，这就是中国劳动改造政策的一个缩影，也是当年劳改劳教犯们的明鉴，想到这些，我不寒而栗、虚汗满背，庆幸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倒行逆施推向顶点，从而达到否定之否定的境界，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闪现，历史的流程稍一偏差，我现在也就是 1157 了，而历史的机遇阴差阳错地呈现，这一线生机让我从地缝中逃了出来。

在劳改、劳教及其留用场所，不论农场、采石场或盐场，劳教犯的身份名目繁多，按原犯罪性质分有反革命案犯和刑事案犯，劳改、劳教期满留用时大多数人要戴上帽子，原反字号的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原刑事案的戴坏分子帽子，还有少数人原案情很轻的可不戴帽。其等级划分是：不戴帽的高于坏分子，坏分子高于反革命，不戴帽的和戴坏分子帽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每年由市公安局统一布置，一切劳改、劳教留用单位在同一日召开奖惩大会，宣布摘掉一小部分人的帽子，同时给某些改造不好而又不够再次劳改或劳教的人戴上帽子。大约 76 年前后，场部说要落实给出路的政策，把改造好的留用人员提升为正式工人，给予和干部院中的工人同样的待遇，有些人很兴奋，以为有了出头的日子，酝酿了一个多月，场长宣布杨某和梁某两人提升为正式基本工人，全场 600 多留用人员只有这两人被转为工人。他俩十分年

轻，原案也十分简单，其实也不够劳教条件。他们成为基本工人后可以到干部食堂去吃饭了，调换了一个开铲车的“轻松”工作，其它一切都没变。于是留用场所又多了一个等级：基本工人。“基本”者疑似工人，当属于社会上的工人阶级吧，殊不知它只是一个特定的帽子，如同摘帽右派一样，仍是右派，“花色”不同而已，它只是等级的细分。这样在留用场所有了五个等级，依次为：基本工人、不戴帽留用员工、摘帽留用员工、戴坏分子帽留用员工和戴反革命帽留用员工，倒也和社会上的所谓五类分子相对称。第二年，又有一个姓刘的被评为基本工人，一年 1~2 人。大多数人对基本工人的称谓不再感到兴趣，一方面，人数很少，轮不到自己，另一方面，评上了也不过如此。评上的人一开始有些兴奋感，但昙花一现，马上恢复到原状，他们除了调换一个“技术性”工作和可以到干部食堂吃饭之外，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去干部是他们的主管，是代表政府的主人，现在要在一起吃饭，反而十分别扭，一个转为基本工人的说：

“吃了也消化不了，打了饭赶快回宿舍，在宿舍吃还图个心里不烦。”

这个等级的细分也没起到任何作用，过了几年也就无人再提了。

采石场生产的石灰除了按合同提供给天津市建材公司，更多的是供应当地或天津附近的其他散户，很多是现金交易。起先有两个留用员工负责称重、记帐和收款等事，几年下来一直清清楚楚。后来场方党支部认为这不符阶级斗争新动向，牛鬼蛇神怎能掌管物资进出和现金来往？！所以就由警察队长来管每天石灰销售，仅把粉尘迷漫的装车清理工作让留用人员来做，因这粉尘，矽肺的危害他们很清楚。不到两年三位警察队

长被发现严重贪污而被判刑，其中一个采石场一把手唐场长的女婿，他认为自己有一把手庇护，于是肆无忌惮，却被有矛盾的另一副场长正黄雀在后的盯着呢！大家讽刺这些劳改干部心黑如墨，思想、道德比我们这些劳改分子坏得多！黑得多！都像这些人当权我们国家怎么能好！

写日记、相亲和学英语

劳教以前我是一个青年学生，思想单纯，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怀着真诚的期望，以为苦难的中国从此走上一条强国富民的路，虽然对于各种整人运动感到过分、残酷、缺乏人性，但也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温情。自从进了劳教大门，由一个清白学生变成了一个阶下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发现很多人具有善良、耿直的秉性，绝大多数都是顺民，没有谋反的罪行，然而一个个都被判处为终生改造的“小无期”。我也见到众多党员官吏、解放军军管干部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欺压民众，只要有了党员证，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拥护党中央，就捧得了一个铁饭碗，高官待遇终生享用。我对这个社会感到悲哀、感到无奈，我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实质有了深切的了解，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深切的了解，我相信这套鼓动人们互相斗争、互相残杀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绝对反科学、反人类的，迟早会被历史清算。我坚信对我的处理完全是违背常理的，总有一天会云开见日。而且，几乎每个劳教人员都有一个故事，值得深思，有些让我感触特别深。只有亲身进入劳改场所才能真正感受人间的不平和苦难，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黑暗面，才能真正体会触及灵魂的改造是怎么回事，从 49 年解放到 79 年有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整整 30 年，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回到社会大多已经身心俱废，头脑发呆，这就是劳动改造造就的新人。我在改造的后半段，特别是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心灵已

经得到一定的升华，不要谈什么正义和真理，都像演戏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把自己的遭遇看作上帝对我的磨炼，要我体验人间的邪恶和凶险。

这么多匪夷所思的冤情，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不平和黑暗，激发我写书的愿望，我相信书写出来将使世人大开眼界，使人们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甚至想写一本中国自杀大全，单在采石场就可采集足够的资料。

进到板桥农场，我就偷偷找了一本空白的账本来记周记，也许三、五日，也许一周多，把自己以为值得写下的所见所闻，简单地记录下来，只记事件过程，没有评论、没有感想，即便别人发现，也看不出是一本“变天账”。到采石场的后期，有较长时间在开采班的空压机房管两台大空压



因为管理机房，被优待在两人一屋宿舍住。吃、睡、看书、写字均用此床。

机，经常只有我一人值班，有较多时间来思索和记录。平时我把这本子放在机房无人查看的盛废零件的木箱中。前后已记了三个本子，我还照了一些很“正常”的照片，来展示平日的生活情景和采石场的各个工种的劳动状况。但是文革后期，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公安六条”公布后，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杀气，蓟县城门口几乎每天都张贴出天津市和蓟县公判枪决的布告，罪名都是反革命、书写反动文章、反动标语，或行凶报复等，去天津探亲回来的人也讲到全国各地到处枪毙人，红色

恐怖席卷神州大地，再看看采石场内，熟悉的员工中也不断有人被逮捕法办，像朱永信这样的，竟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十年牢狱，经多日犹豫，最后还是把这三本周记烧掉了。后来我十分后悔，很多人事已记不周全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已在劳改场所度过了十来个春秋，今后怎么办？如何才能跳出牢笼？劳改留用员工要求到农村去阻力较小，通门路可以酌情批准，因为农村是分散的，是艰苦的，活动余地很小，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四类分子翻不了天。于是，我和处于这种条件下的许多人一样，想到了一个通常的办法，就是到市郊或农村去物色一个老婆。在我姐姐的帮助下，利用探亲的机会，我到了江苏城郊的两个农村去相亲。但对方顿生疑问，为什么一个城市长大的人要到农村来物色对象？此人不是身体有病就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一家见了面，介绍人来回话说：

“我们要弄清楚来人的底细再说，历史有没有问题，身体怎么样。”

从此没有回音。第二家听说我曾劳教过，现在又在天津郊区，简直吓了一跳，

“劳改过的人怎么还想结婚？将来谁养活谁？”一句话就回绝了。

介绍人打算略过我的历史情况，我坚持要说清楚，我遵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原则，否则白花精力，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两次尝试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农村人也不是白吃饭的，都有政治头脑，从此我和家人都死心了。

75、76年，社会上已在叫喊落实干部政策，我衡量自己，觉得轮到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是文革前处理的，但总想脱离劳改队，不甘心呆一辈子，因而抱有幻想。想到自己劳改十

余年，一切学业都荒废了，没有条件再跟上我的专业，何况任何技术性工作必须要有合适的环境，但我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像许多喝酒解愁、混沌度日的人一样，我要打下一点基础，万一将来返回社会，可以有一技之长，挣得一个与好人平起平坐的饭碗。再三思量，觉得唯有加紧学习英语，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文革中一切外语都已被禁，懂英语的人正好奇缺，学英语只要花时间进去就能见效，不需要工具，不需要投资。公开学是不可能的，别人会打小报告，会挨整。我托人在天津买了一套英文版毛选，反正中文版到处都有，不懂可以对照。我读毛选，虽然是英文版，也没人敢来指责，谁敢阻拦学毛选？没人有这个胆。我也美其名曰：“我学了中文版，再看英文版，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和伟大思想！”名正言顺。

我一有时间就读，难句和不理解的地方对照中文版，慢慢我的词汇量和文法都有很大长进。

大约 75 年年底我被调到场里唯一的机器房看管几台大型空压机，工作轻松了，自由时间也多了。我又托人到天津买了几本中英文对照的机械书籍和物理书，即使别人看到了也没大问题，都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与反革命无关。利用一个人在机房值班的时间，静心阅读，一本接着一本，坚持从第一页序言到最后的后记一页不漏地全部读懂，搞不清的地方可以翻后面的中文对照，逐渐很少用字典了。接着读两本英文名著，《天方夜谭》和《双城记》，读完这两本书，日常生活词汇大增，但毕竟只是阅读，所谓哑巴英语，发音得不到纠正，所以至今虽然来美已有 20 余年，可还是一口中国腔英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歪打正着，算是摸对了，平反以后，我进入制造钻井平台的石油公司工作，当时从国外引进很多技术，而

偌大的公司懂英语的技术人员竟寥寥无几，我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主要的技术翻译者，从而促使我的技术翻译水平愈益提高，使我后来在美国当留学生时受益匪浅，很快通过语言关，进入专业学习。



蓟县三八水库距采石场半里，
常偷空去闷坐。



休息日只能在荒静处坐坐。



蓟县城关休息日照。



枯树、白塔常陪伴在侧，
休息日常坐在那里呆望。



蓟县独乐寺后景。



为难友老肖祝寿时的留
影。1977年。



中坐者肖开全，曾参加八路军，因无法查明身份而被退役。他是孤儿，找不到老家，被以无业游民为名收容劳教。60岁，光棍一人。一些留用员工为他祝“寿”。1977年。



为肖老祝寿后，去到采石场山坡下拍照留念。1977年。

漫漫平反路

1971 年秋，自被判处劳教之后已经六、七年过去了，我当然不甘心在采石场当终身苦力，我决定为我的前程奔走，但申诉翻案就是不服罪，就是抗拒改造，那是自讨苦吃，不是关禁闭室就是挨批斗。我决定不提翻案，而利用当初宣布我的处分时的一款承诺，即劳教期满另行分配工作，来试图改变环境。另外我要利用劳教法规中这样的规定，期满后无家可归或无业可就的可申请留场就业，就是说留场就业要满足两个条件，一，必须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没有工作技能没有单位的人；二，必须经本人申请。虽然这一条从来没有执行，但总是白纸黑字写着的。找到这样的托词，我的胆子大了一点，当然，风险依然很大。

听说我原工作的部队在文革中派别很多，情况很乱，已被上级解散，所以我决定到总政治部干部部去申诉，当年负责大学生分配的也是总政干部部。然而上北京也困难重重，劳教人员是不允许上北京的，去北京要介绍信，住旅馆要单位证明。我思索很久，如果不冒这个风险，只有一辈子留在劳改单位，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冒险一试了。

我设法和北京的薛德镛联系上了。薛德镛是我的老同学，也是牵连进宋光汉一案的人员之一，事发后遭单位整肃，从国防五院研究导弹的军事单位调到北京六铺炕煤矿设计院，只是没有送入劳改单位。文革时照例逃不掉，67 年定为漏网右派，在单位监督劳动，投入研究院中的专政对象队，每天扫厕所、

楼梯、大厅。吃饭要挂着反革命的牌子到食堂里 5 分钱的窗口去买饭菜，5 分钱是最低价的窗口，专供专政队的人和买不起好菜的职工，只有烧白菜和萝卜一类。68 年送黑龙江五七干校劳动。后因肺结核回上海家中养病，70 年底回到煤矿设计院，仍然挂着劳动。我通过另一朋友和他联系，这时他的景况稍有好转，不再挂牌子，饭菜可自选，定为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等待处理。他依然是单身，宿舍中原来有另一单身技术干部同住，薛打成“阶级敌人”后，就坚决搬出去了，于是薛单独住一间宿舍。他一听我要来北京，很高兴，要见我。宋光汉事发后，我们一直未见过，也未通信息。

薛叫我住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问题比他严重的人还很多，所以他倒相对自在一些，敢于让我留宿。我在采石场以去天津看病为由请假四天。吃过午饭，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我盘算天津到北京的路程，事先我已打听到，乘火车去北京是不行的，买火车票进北京要证明，而郊区的长途汽车会松一些。到达天津是午后三、四点钟，在长途汽车站我买了张到三河县的票，第二天开车，车上很挤，各站上下的旅客十分频繁，正和我预先打听的情况一样，乘着繁忙的时刻，我要求补票到北京，售票员没有要我出示进北京的证明信，他顾不过来，也不感兴趣。午后顺利到达北京，在行色匆忙的人群中，我放下了紧张的心情，悠然地走出汽车站，然后直奔总政治部大院。我在劳教前曾多次来过总政，那时是要求调到专业合适的单位，虽然从来没有结果，但对总政各部门的情况已很熟悉。干部部的一个军官接待了我，因我只要求安置工作，所以他的态度还算客气，答应我调查处理，收下了我事先写好的材料，允诺很快给我回音。

我觉得事情有些希望，兴匆匆地跑去找薛德镛。我们约好

等他们院中的人下班后，在大门口碰头。现在暮色已经降临，该不致被人看到，如果有人发觉一个劳改犯和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偷偷会面，那是反革命串联，后果十分严重。我在设计院的门口转了几圈，再回过来时看见薛在向我招呼，于是尾随着他来到他的房间。薛仍然顾虑重重，他叫我呆在房间里不要出去，他独自到食堂买了一些晚饭带回来，我们边吃边谈。薛大骂宋光汉不是人，自己做事为何要牵涉别人，害得那么多人倒霉，也对当局大为不满，株连九族等等。薛是一个老实怕事的人，从不关心政治，也从议论朝政，但他和宋光汉曾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同在北京工作，就是因为有老同学来京时，大家聚在一起而拖进宋光汉案，正因为他平时从不议论国事，找不到太多毛病，所以没有被送劳改或劳教。但他已涉及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允许留在高度保密的导弹部门工作，给他剥去军籍，以严重政治错误从轻发落来处理，调入煤矿部门。薛对我说，他在北京也呆不长了，院里被罚劳动的人很多，都说要下放到煤矿去。我们一直聊到几乎黎明，为怕被人看到，天刚朦朦胧亮时，薛出去观察了一下动静，走廊里一片寂静，大院里雾气缭绕，我悄无声息地匆匆离去。

离开北京后，还有两天假期。我先到天津看望几位难友，他们原来和我在板桥一起劳教，解教后调进市区劳改留用单位干活，一些去铸造管子接头的玛钢厂，另一些去了烧制砖瓦的二窑。前面提到的包文达就在玛钢厂。我在一位姓高的难友家中吃了一顿晚饭，又有三位“同学”来到高的家中，大家一起叹叹苦经，交流一些小道消息，也算欢聚一次。第四天晚我回到蓟县采石场。转天早晨，陈指导员（每个队除了两位队长，还有一名指导员，算作“党代表”吧，担任留用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唐某某，听说你竟跑到北京去了，你胆子不小啊！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坦白讲讲看。”

我一听就有些发傻了，总政治部不可能这么快来函，转念一想，我走前曾对食堂班长方颐令提过，说想去北京上访试试，但未讲得很肯定，所以陈指导员也只是听说，他是在试探，然而我想也许以后总政会来函，还是直说为妙。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后因历史问题被调到粮食局，做发放粮票之类的简单工作，最后还是由于历史问题以及粮票数字核对不清送劳教，期满后留用，他是能说会道、八面玲珑的那种人，经常给干警花里胡哨说一通，人称老狐狸。我当时警惕性不高，认为他一贯待我不错，经常问长问短，给我出些主意，交换一下小道消息，大家都有些文化，共同语言多些，所以我走前透露给他我此行的目的，除了他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只有他会捅出我的这件事，好在我讲得也不多。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这些前因后果飞快地在我的脑子中掠过，我马上冷静下来，对陈指导员承认此事，并解释说：

“我是去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了，我只是为我个人前途考虑，并不是去翻案，也不是去申诉，只是当初部队明令宣布，在我劳教期满后要另行分配工作，我刚解教时正值文革高潮，不好提出来，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了，中央也在讲要落实政策，劳改单位不可能为我提出此事，所以我只能自己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早上去，晚上走人，北京那里也没去，旅店要证明，我没有证明，也不可能住旅店。”

“总政负责干部已答应给我书面回音，”我又补充说，想用总政的名义堵住他的嘴，“我想很快会有回复的信件。”

陈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当兵转业的下层指导员，总政在那里都不清楚，所以我讲完后他的脸色也好看一些了。最后他

说：

“你没有隐瞒，态度还好，这事也就算了。但不许你再对别人讲你去北京的事，此事影响很不好，中央三令五申不许你们这些劳改劳教释放犯到北京去上访和串联，大家都到北京去，我们就有麻烦，你们被抓住了也没有好果子吃！”

我悬着的心总算平静下来。

当然总政方面没有任何回音。总政干部对上访者一概都是和颜悦色的，说他们会调查处理的，是绝对负责的，把你打发走后，合上文件袋束之高阁，下次再来，是另一个和颜悦色的新脸孔，他的回答一样让你抱有希望，一样让你回去听候消息，一样杳无音讯，你走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其实我在劳教前为了我的工作问题去过总政多次，也都是这样的结果，只是这次我深陷劳改地狱，每天听着干警的训斥，难得见到总政干部那样的和颜悦色，才徒生幻想，当几周几月过去之后，杳无音讯，方知这次又是一个肥皂泡影而已。

我对方颐令十分不满，想了几天，决定不能假装不知道，周末晚上，我跑到他的宿舍对他说：

“我只是随便讲讲我的想法，去北京是要单位证明信的，你怎么真以为我要去北京，马上报告队长要我好看！”我装得没有去过北京。

方听了一脸尴尬，忙说：

“我可没有说什么，我怎么会讲呢，你是否对别人讲过？”

“我对谁也没讲，就对你讲了。”我斩钉截铁地说。“今天队长已找我算帐，我对他说我只去了天津，这北京是没影儿的事，不知谁要编把造毛、欺骗领导，唯恐天下不乱，领导要好好核查，揪出这样的人才行。”

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没再多说，让他知道就行。

过几天我把这事给“哥儿们”说了，有一位年轻哥儿找到方颐令说：

“方头（方是班长，下面都尊称班长为头），你怎么这个德性，虚报军情，想要把唐哥这样的好人送进禁闭室，再这样我们哥儿们可不饶你。”

以后方看见我就点头哈腰，请我不要再多疑，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了。此事就算了结。

1975 年底，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消息传到采石场内，大家议论起来，干部们说：

“那仅限于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你们别做梦！”

1978 年年中，中央发布了正式文件，要平反冤、假、错案，在我们这些因政治问题而判刑和劳教的就业人员中，又多少升起些许盼望，但我们知道受“四人帮”迫害的许多高干、教授、著名文艺工作者都未轮到落实，要轮到我们这些文革前的“犯罪分子”不知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再说共产党的政策三天两头在变，今天说要平反冤、假、错案，说不定还未开始“平”，一阵逆风吹来，平反变成严厉镇压，所以大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起，“啊，中央要平反冤假错案了。”从不谈论是否会落实到自己头上，否则难免被人臭骂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梦想，要真是逆风刮来，必定死路一条。

然而我们真的迎来了采石场第一个得到平反的人。一天早晨，大家正三三两两扛着工具准备上山干活，管教科长从干部院中出来，在门口喊道：

“张××，你不要上山了，市局来通知，叫你今天就回原单位报到，具体情况你回去就知道了。上午在宿舍整理整理行李，下午就坐火车回天津去吧。”

张×× 可能激动过分，思想无准备，也因在劳改队锻炼多年，张口先呼万岁已成习惯。

“报告队长，我不急。”张回答说，“今天我照旧上山干活好了，收工后再收拾行李，明天走，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张×× 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小老头，已留用十余年，只知他有些牢骚话和原领导关系不好，也不知被什么藉口送了劳教，平时他总带着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独来独往，想不到他竟是采石场第一个落实政策的幸运者。因为正好在出工的时候，很多留用员工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在上山的路上议论纷纷。

“这人真是傻帽，”有人说，“让你走你还不走，假装积极，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要是换了我，立马回宿舍换一身逛衣，”又有人说，“其它铺盖行李，锅盘碗勺全不要啦！哥儿们谁要就给谁了！赶快走，到县城弄二两猫尿（酒），炒两只菜，边喝边等，开车时间一到马上上火车走人！”

也有人在琢磨这老张头到底是什么来头，也许儿子、女婿当了大官了？还是有什么歪道？采石场的大右派、大作家，天津有名气的人物也不少，怎么会第一个落实到这个无名小老头身上？看不懂。

采石场每天都要用炸药放炮，以炸开山头大石，通常放大排炮是在全体干活人员下班后，先按警报器，再合电闸接通导线，而放散炮是在白天作业时间，把山顶蹦下的大石块再炸成小石块，这种散炮威力较小，只吹哨示警，不用警报器，这时干活的人尽量躲到几十米外的隐蔽地方。无巧不成书，那天上午十点左右，连续几声巨响，震得远离山头的房屋直摇晃，这是大排炮，是电炮，是用来炸破山体的大炮。当时我在机房工

作，另有一些职工在周围，大家都感到不对头，放大炮，先要发警报，提醒人们躲开，然后放炮，但我们都没有听到警报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山上一定出事了！”

响声一停都往山上跑去看个究竟。

原来那天东边的山石已运走，山坡已清理得差不多了，炸山的人等待其他人下班后放大炮的来炸顶部的山体，山下干活的人都集中在西边的山坡下，清理出一些大石块，准备放些散炮。十点多到了休息时间，张××和另外几个人跑到东边山坡下，以躲避西边放散炮。谁知鬼使神差，这天开采班班长因长期起早摸黑，每天扛几十斤重的钻机山顶、山下地跑，疲劳不堪，一时头脑糊涂，听到山上吹哨声，就把接通东边大排炮的电闸合上了，山体炸开，大批石块蹦落下来，堆积在东边的山坡脚下。这时这位班长方才震醒，知道闯了大祸，顾不得打听山上惨景，飞也似的直向县公安局跑去投案自首。后来，因这班长平时吃苦肯干，不是反革命出身，属于一时疏忽，且死的都是留场就业人员，所以从轻判处五年徒刑。

躲在东边山坡下的几个人，包括张××都被巨石埋在下面，全场干部都来了，所有大功率铲土机、挖掘机，一切年青力壮的留用员工都集中起来，日夜三班竭力搬运石块、土方，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搬，见到了这位张××，他抱着铁锹直立着，半截埋在染血的土石堆中，山土清到山根才发现其它几人，都卷曲着身子僵卧在已经凝固的血泥地上。

“站好最后一班岗”，他是如愿了。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经历，只是张××平时生活极低调，很少与人交流，总是无声无息，所以都记不起他的名字。如此巧合应该也是一大怪事，发生在自由国家，早成了抢手新闻，发生在这里，当然不

会有媒体来报道。采石场的工伤事故很多，很快，人们也就淡忘了，采石场第一个获平反的人就以这样奇特的方式终结了人生。

79 年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已全面展开，右派分子全部得到改正（除了几个人），采石场里又议论纷纷，一天召开全场大会，场长训话说：

“你们要规规矩矩接受改造，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是指在文革中社会上发生的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局限于右派分子，与你们这些人毫无关系，你们都是铁定的案子，想藉机翻案是痴心梦想。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出路。”

同时警告留用人员不要到社会上和原单位去申诉、翻案，并宣布一经查出严加管教。

我想什么事情都是一股风，不抓紧在这个时机提出申诉，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运动过去，再没有人理你了。所以我不管场长的警告，偷偷利用休假日到天津原部队的地址去察看情况。离开部队的这个驻地十几年了，院落里当年稀疏的小树已经蔚然成林，大门两则竖起了一些新楼，我正在东张西望，走过来一个身穿褪色军装的老兵，

“我原是这个部队的，我叫唐××。”我拦住了他。

“啊！唐××，我知道，我知道。”显然十几年前的那场批判，使我大为出名。

他告诉我原部队因在文革中闹得太厉害，已被解散，大多数人都转业了，但还有一个落实政策小组在办公，解决一些善后遗留问题，叫我赶快去。

走过过去的教学楼，在那里我曾经教过新兵识图，又走过过去的礼堂，那里开过批斗我的大会并宣布给我的处分，在一栋小楼的底层我找到落实办。我一眼认出来开门的是高承彬，

原来是同一教研组的教员，里面还有三位，一位是原来宣传科的秦科长，另两位面熟但叫不出名字了。显然他们都认出了我，非常惊讶我的到来，热情地与我握手问候，告诉我负责落实办的主任是李勇。李勇那时外出了。我悬着的心顿时安定下来，因为这几位都是过去我在时的“运动员”，是常常挨批判的思想右倾者，由他们主持落实政策，我放心不少。他们对我说：

“我们议论过你的事好多次了，你完全是冤案，只是找不到你的档案，不知道你在哪里。这会你来得太巧太及时了，否则我们这个小组再有两周就要结束了。”

他们问了我这多年的情况，纷纷表示同情，说左倾政策让我吃了大苦，其实他们都清楚，当年部队存心整我，无非是为了我坚持不参军，坚决要离开部队，也是为杀鸡给猴看。

“我们马上派人去把你的档案要回来，销毁过去的黑材料，给你重新联系工作单位。”秦科长立即表态说。“你如有自己物色的接受单位也可以提出来，部队在天津地区，联系天津地区比较容易而且快，如果你想回上海或其他地方也没问题，不过书信联系或去人联系都会费一些时间，你考虑后再决定好了。”

高承彬建议说：“去海洋石油公司吧，这是一个待开发的新公司，急需技术人才，我的老战友正在那里负责人事工作。”他又热情地劝我说，“老唐，要尽快决定，你也知道，我们国家的政策多变，你已经受苦这么多年了，不能再错失机会了。”

他的意见正合我意，夜长梦多，第一重要的是离开劳改单位，出来后再考虑其他的问题。我见他们如此热情并直言相告，非常感动，立即想到采石场那些干部的嘴脸，对比之下天

差地别。主要问题谈妥之后，就聊起了阔别多年的那些话题，他们又好奇地详细地询问我劳改场所的生活和劳动情况，我的故事使他们为之动容。

我着重问了三个人的情况，他们与我在部队的生活和遭到整肃关系极大。第一个是程肖松，他们说程是一贯的左派，党性强，因工作出色，已调升到军医大学当保卫部领导了，程和其他党员同志话也不多，对谁都有职业性的警惕。我知道落实办的干部中就有当年被程整了材料挨过批判的，程在文革中也是左派，整人整了不少，所以他们不愿多提他。

第二个是当年我所在系的系主任张青武，一开始就因为他把人管得死死的，周六也不愿意放我回家，我就和他发生了矛盾。后来因不批准我和郑瑛谈恋爱，我请求对调工作，他就借口革命工作需要，坚决不放我走，看我怎么办。之后，我生病在家休养并想据此辞职时，他就扣压我的粮票，这一手很厉害，没有粮票，吃不饱，无法生活下去。总之，我所以对部队生活深恶痛绝，与他这种军阀兵痞作风有很大关系。我被停职反省后，他又协同保卫科长给我上纲上线，使我的问题升级，还多次对系里的干部宣称：

“唐××就是不听我的话，才弄得如此下场。”

落实办的一个干部轻描淡写地对我说：

“别提他了，他奸污了女电话兵，弄大了肚子，已作离休处理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的印象中，张一贯以正统、左倾、党性强的面貌出现，连问：

“什么，这可能吗？”

另一干部讲了详情：

“女电话兵都是十八、九岁入伍不久的小姑娘，张是中校

级高级军官，办公室和家中都要装电话，一个漂亮的女电话兵到办公室装电话时，被他‘办’了，女的也不敢伸张，后来张乘老婆不在家时，又把女兵带到家中‘办事’，几个月后，该电话兵怀孕了，起先部队想把此事压下来，让该女兵复员走人算了，但女的父母不甘心女儿白白受辱，还要复员，告到上级部队。”

那干部又说：“张是红得发紫的人，想不到做出如此见不得人的事。女兵的年龄比他的女儿还小得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搞女兵了，过去无人追究他，所以一样升官，这次瞒不过去，算作离休处理，但照样拿原级别工资，只是没有人再听他的吆喝，真是便宜他了。”

在部队，政治是大节，诱奸、通奸都是生活问题，是小节，只要高喊左的口号，步步紧跟上级，保证年年高升。像程肖松那样人整得多，表明阶级立场特别坚定，高升就特别快。而张青武那样奸污小姑娘，在社会上起码要判十年，但是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还可享受离休待遇。

想起劳改留用场所有一个叫徐平的建筑工程师，他的罪行就是在单位里看电影时，手碰摸了坐在旁边的保卫科长六岁女儿的裤裆，徐说是无意的，但徐是设计院的白专典型，常与领导顶牛，关系很僵，结果就以猥亵幼女未遂之最，送劳教两年，期满后留用成了“小无期”。两者的处理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第三个叫杨理成，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修汽车的技工，后留在解放军的汽车大队当修理技师并教学员，他因这个历史问题不能参军，作为穿便服的技工教员对待，我因不愿参军，也穿便服，和他编在一个宿舍，平时什么都谈，比较投机。他已 50 多岁，部队中有不少他教过的学员，所以消息灵通，有很广的

人事关系网。我被隔离反省的前一周，他突然不再理我，原来吃饭总坐在同一饭桌，现在他坐到角落的饭桌上和别人一起吃饭，我几次主动和他说话，他都假装没听见。我还问他：

“老杨，你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完赶快调头走到另一边去了。

在处理我的批判大会上，有几个军官受命发言，无非声讨我的罪行，给我上纲上线，警告我必须老实交代，否则死路一条等八股式批判，唯独这个杨理成上台批判我时，几次用手指点到我的鼻子，捅我的脑袋，把我臭骂一顿，还编造了一些我没有说过的反动言论。我理解他的表现，由于他的历史原因，他要竭力表现立场坚定，和我划清界线，但他的动作实在太过分，而无中生有就是恶毒了，我心中非常不满，原来你是个这么卑劣的角色。文革高潮时，杨成了部队中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被批斗、挨整，挨打也没少受。部队派了一名军官到采石场来找我核实杨的许多“反动”言行，我立即想起了他批斗我时的情景，一点不客气地给他写了好几页。以后，我平静下来，也检讨自己做得是否合适，我找不到答案，不过我想我们俩是两清了，你不欠我的了。

落实办的干部告诉我：“杨知道自己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一直小心谨慎，部队中又有不少人是他的学员，关系还不错，所以运动后期，就按国民党留用人员不适合在部队工作，令他辞职回家了，虽然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挨打挨斗不少受罪，但也算有了一个善终。”

离开部队十几年，人事全非，十分感慨，也庆幸自己早被整肃，混在牛鬼蛇神中间安然度过了文革的恶斗期，如果留在部队，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遭遇。我们一直聊到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回绝了他们要我住下的好意，乘天色还亮，回到了天津

市区。一路上我在想，真是好险啊，再过几天，落实办撤销，我一个身陷牢笼的人，何处去寻找原部队？上苍保佑，让我当机立断，在千钧一发之际找到了落实办。我在天津市区干活的难友家中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赶回蓟县。

回到采石场，我只把情况告诉了政治部杨主任，以前在追谣危机中是他解救了我，他安慰我说：

“到时一定帮忙，让一切都顺利。”

对其他人我什么也没说，怕生意外。虽然在落实办的半天谈话使我怀有希望，但心中仍然存有疑虑，这次真的能办成吗？又在盘算如果真的得到平反，如何与难友告别，这里鱼龙混杂，但也有不少肝胆相照的患难知交，我出去后一定要想法帮助他们。同时发了一些信给原来交大的老同学，他们都已是单位的骨干力量，任总工程师、厂长职务的很多，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可以接纳我的工作单位，供落实办联系安排我工作时参考。

第二周，落实办就派了一名干部来取我的档案，找到场部，那位宣布我们没有资格平反的唐场长推说我的档案在天津市公安局，想把来人支走，他不敢公开不给，怕被扣上反落实政策的帽子。我就陪同这位军人找到杨主任，他对落实办的军人说：



平反前夕时祝贺聚餐。

“唐场长不了解情况，档案在这里，我陪你去取。”

又叫我放心回队里去。

当天我的一大捆档案就带回到落实办。这时有两个船厂表示欢迎我去，但我考虑再三，还是以尽快离开采石场为第一要事，特别是落实办的人来取档案还受到唐场长的阻拦，更使我急于离开采石场，因此决定选择海洋石油公司，有高承斌和落实办的帮助，去海洋石油公司可以更快落实办成，同时也考虑到我已脱离造船十余年，不知道当今的新技术、新东西了，而海洋石油是新兴行业，大家都要从头学起，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再说海洋石油平台制造也是船的变种和发展，能发挥造船专业的基础。档案取走后，我立即给落实办的高承彬、秦科长打电话，希望他们先联系海洋石油。他们接到电话后，由高承彬亲自到塘沽去落实。过了两周左右，落实办打电话通知采石场，不日派人派车来接我，要我做好准备。

我得到平反的消息很快在采石场里传开，干部、留用人员全知道了。干部们，包括场长，见了我不再喊我名字，一变阴沉的面孔，满脸笑容地改称老唐了，深有世态炎凉之感。周围留用员工都来向我祝贺，天天有人要为我饯行，我一下子从十八层地狱升到了九重天，五味具陈，是苦是甜？对于这么多年共同受难的难友，当然不能再让他们破费，我分几次在蓟县城里的饭店请大伙吃一顿离别饭，患难见知己，患难见真情。每次只是一桌，我怕人多了太招摇，临走之前，还是小心谨慎为好，防止出现意外。部队答应补我一些钱，所以我把大多物品、衣服分送难友，我对几个喜欢打小报告，对队长屈意奉承的人也诚恳劝道：

“这些干部只是政府派来管住你的，打小报告，溜须拍马一点用也没有，倒不如用点心思为自己前途多想想。”

当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时，户口就转移到部队营地，而部队属特殊编制，只有花名册，没有户口簿，我被送劳教时，并没有转户口，只吃囚粮。现在落实办给我联系海洋石油公司，正式办理调动手续，必须有户口转移证，上面应有我的出生年月，籍贯等等细则，落实办要赶快办理，而我还在劳改留用场所，电话也打不通，结果他们想当然地估计了我的出生年代，也不知从那里“发现”了我的生日，就给我想当然的填上 1939 年 12 月 6 日出生。事实上我是 1938 年初出生。等我发现这一错误时，我已在海洋石油公司上班多时，要改出生日期手续非常麻烦，而且落实办已经撤销，有人劝我不必再计较，户籍上年轻两岁，还可晚退休两年，岂不更好！我也就将错就错，不去更正了。至今我的护照、驾驶执照、其它一切证件都是这个时日，让我年轻了近两岁。来美后还闹了不少笑话：多年后我在美国公司工作了，第二年的 12 月 6 日上午办公室秘书通知我到公司会议室去，我也不知开什么会就立即去了，到后看到公司总裁夫妇，每部门经理和办公室人员已都在，会议桌上放了一个大蛋糕和生日卡。我才恍然大悟，不知那位经理生日？我刚进门，一片鼓掌声。随即唱着：“Happy birthday, Peter...”我嘴里却不自由的喊着：不是我生日、不是我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这时我才想起今日是我文件上的生日，不宜再解释扫了大家的好意，开始切蛋糕并表示感谢。这也是我所在美公司的惯例，每人生日时总裁夫人会订蛋糕在会议室庆贺，让人感到温暖和亲情。这样我就有了两个生日，由于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已早就没有过生日的一思一想了，我自己再也无兴趣来庆贺生日。我已“重新做人”，干脆忘了我的真正生日，把 12 月 6 日作为我的“重新做人”生日吧，反正每年这日公司都会为我庆贺。这也算平反新生后的一个后遗插曲。

随后落实办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现在吉普车载着我向部队驻地驶去，而十多年前，同样也是吉普车，不过那次是把我押往劳教收容所。我 1964 年 26 岁进入劳教场所，今天已是 1979 年，41 岁了，在劳教场所整整关押了 15 年。十多年的苦难历程在脑海中翻滚，使我心情沉重，随着车辆的颠簸，我沉入回忆的殿堂，一幕幕悲惨的景象又重显现，好像还过的债再还一次。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师鹿士举饥饿不堪，在田间生吞活咽癞蛤蟆；雕塑一头红牛而被毒打成招，判刑十年的朱永信；揪反革命集团，双手反绑关进一米宽、一米多高的泥地囚笼，像狗一样地舔食；在石灰窑的出料口扒出的烧成焦炭的窑工；还有那些砸死、自杀的惨象。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簌簌流下。我的思想迷糊了，我真的逃离了那个可怕的地方吗？还是好梦一场？我下意识地拧了一下大腿，痛觉尚在，该是真实的世界吧。

我在部队招待所住了几天，等待海洋石油公司的手续，趁此，我和天津的已经平反的前难友一起聚聚，互相庆贺真正得到新生。海洋石油公司的接受手续落实后，部队又派车送我回蓟县采石场，取人事调动介绍信，因为我的工资指标、人事关系还都在采石场，省得先转部队，再转海洋石油耽误时间，就由采石场直接把这些关系、指标转往海洋石油。不到半天时间就都办完了，在场的警察队长都过来和我寒暄，我只对几位平时比较正派、有同情心的干部真情地谈了谈，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傍晚，杨主任已关照干部食堂厨子做几个好菜，送到他家中，为我接风。这位杨主任为人正派，别人看了有些右倾，原任采石场政治处主任，文革中，下到留用职工队里当指导员，在追谣风潮中，为我开脱，落实办来调档案，唐场长刁难扣压时，挺身而出，亲自领着来人找到我的档案，所以我心中

一直很感激，希望今后能为他做点什么。后来他女儿在天津一中专学地质化验，毕业时想托我在石油系统安排一个工作，但我只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托了几个人也没有成功，一直很遗憾。

落实办给我补了 3000 元，秦科长对我说：

“落实办只有这么多钱可以补给你了，按你当年的工资算，是远远不够的，请你将就了，好在今后会更好起来的。”

我已十分知足，添置一些衣物，请所有有惠于我的亲戚、朋友吃吃饭，给父母一些孝敬，也够了。本想平反后回家休息几周，养养身体，会会朋友，也算是庆贺一个苦难年代的结束，但我已是惊弓之鸟，总怕夜长梦多，所以立即去海洋石油公司报到上班，我想等一切落实稳当再考虑其他问题。我六月份到海洋石油公司，等到这年的春节，才另外多请两周假，回上海父母处探亲。

落实办很快为我作了安排，落实了石油公司的工作也就解散了，我的平反结论和善后问题就又移交给了新成立的解放军运输技术学校政治部，大多是新干部，对我过去情况根本不了解而且左倾思潮也仍严重。他们仍参考了过去整我的材料，以政治部名义寄给我一份复查改正。结论如下：

“一、唐××同志，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间，由于个人主义严重，多次与自己思想观点相同的人在一起议论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政策时，讲了一些错话，尤其在宋光汉暴露出想逃往香港时，唐未向组织反映并表示同情是错误的，但原处理报告中将唐××同志定为‘反动分子’、

‘敌我矛盾’是不妥的，应予更正，给予劳教二年的行政处分是不当的，应予撤销。

二、关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唐××同志解除劳教时，所在单位又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错误的，已经天津市公安局六处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决定给予纠正。

三、关于唐××同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解除劳教后，应该妥善安置，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原天津运校撤销等影响，致使其本人在劳教单位就业至今，属于安排不当。现根据本人交大毕业，有专业知识，为落实干部政策，商请地方党委重新安排适当工作，恢复原工资待遇。撤销原档案中所有劳教的材料。

中共运输技术学校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我见了这份复查改正结论十分气忿，还把个人主义的大帽子扣在我头上，这时我已获知当年肇事者宋光汉和金旭升等的改正结论都写得恰当，实事求是让人能接受。渤海石油公司一党委副书记看了也说这太不像话了，还是极左一套。这样我又写了几次申诉信寄给运输技术学校党委和总后的政治部。姗姗来迟，直到 1986 年才又收到了运输技术学校新的平反复查结论——运党字第 110 号：

一、唐 xx 同志在同学中谈论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处理报告中以此为主要依据，按敌我矛盾定为”反动分子”，给予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理都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二、唐 xx 同志在 1966 年 8 月解除劳教后，应回原单位妥善安置。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教单位就业多年。现按中办发(1986)6

号文件给予补发从 1966 年 8 月至 1979 年 5 月的工资差额 3755 元。(注：因落实办已补了我 3000 元在前，所以再补我差额 755 元)。

三、撤消我校 1979 年 5 月 28 日作出的复查结论，即 (79)运党字第 136 号”决定”，以本结论为准。

这个复查结论的改正拖了近七年，虽我是终于签字同意，但我真的是身心俱疲，不愿回顾和再去申诉交涉了。



2002 年在杭州与已满头白发的右派难友王树荣合影。



1978 年底，两名右派留用员工平反后路过上海，在外滩合影。

第三章 劫后余生

海洋石油公司

79年6月，我来到海洋石油勘探局，这里地处天津塘沽，是一个类似石油会战那样的组织，从事海上石油勘探，大部分员工都是从全国各地的石油行业调来的，一部分工人和干部是海军部队转业复员的。海洋石油开发是一个新行业，公司处于组建和发展阶段，急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我就是冲着它是新行业而来的，在这里大家都是新手，我虽荒废了十余年，但我是学造船的，基础知识还行，应该不会落后于人。事前落实办的高承彬特别拔高我，对公司介绍我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基础扎实。然而干部处还是认为我十余年来脱离了技术工作一直在劳改，只能当一般干部使用，按当时国家政策，大学毕业生先要下放车间劳动一年，所以就把我分配到修船厂的管子工段当一名下放干部，教工段中的技术工人认机械图，给他们补文化课。我在劳改场所这么多年，当一名工人已喜出望外，所以心理上非常坦然。公司有各种船舶几十艘，维修、保养工作很多，管子工段是修船的骨干工段，段里的技术员是从旱地石油调来的，船上知识差一些，我就帮他们解决了好几个修船中的“难题”，这样，厂里领导对我有所器重，半年后，修船厂改为海上石油平台制造厂，准备自己建造海上钻井平台，就把我调到了技术科。副科长姓颜，是海军转业的，大连海校轮机专业毕业，他在部队待长了，技术全忘光了，所以名为科长，实则一切技术问题都由下面的技术员做主，他仅签字上报而已，科里私下都称他为“签字科长”。

由于上面决定海洋石油开发要上马，而国内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所以石油部采取了一个明智的举措：所有海上石油的开发都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工程项目，一般由外方出资、出设备，中国出人力、出地域，将来开采出来的石油按合同比例分成。这样，中国方做的是相当保险的无本买卖，如果一事无成，至多赔上一些绰绰有余的劳动力。一时间，与英、美、法、日都有了合作区或合作项目，与英、美、法的合作都以勘探油区为主，制造渤海湾内的钻井采油平台则以日本为主，日本还派了一个 TAG 团（技术顾问团）常驻海上石油平台制造厂。因为是国际招标，采用国外技术，当然要用国际通用标准，不能另搞有中国特色的一套。这些有关海洋石油开发、平台建造的标准全是英文版，然而诺大一个海洋石油公司，拥有一万多员工，懂英语、能做笔译的竟没有几个。平台厂里，除一名李厂长是留苏的，掌握流利的俄语外，其余都没有外语基础。在采石场的后期，我在空压机房看管机器，有较多的空闲时间，除了装修装修半导体收音机，剩下的全部心思都花在英语上了，现在亮出我的英语功夫恰逢其时，其实，技术规范、技术文件是比较容易翻译的，我找了两名送出去培训过英语的人，设立了一个翻译组，陆续把主要规范、主要标准翻译成中文文本，供全公司使用。

我翻译的文本陆续流通到了其它设计部门和其它工程部门，而我在平台厂又连续解决了一些修船中的技术难点，现在不仅是平台厂，甚至整个海洋石油公司都对我刮目相看了，可说名扬全公司，其原因除了我表现出一定的业务能力之外，更在于我的特殊身份。这个劳改十几年的释放犯，居然能力很强、英文拔尖！对大家来讲，什么劳改、劳教、留用、摘帽都没有区别，事实也是如此。一次开会休息时，公司刘副总经理

对我说：

“恕我直言，我见过一些在那种地方（劳改单位是一个难听的字眼，他怕刺激我，用了这个代名词）待过的人，都变得目光迟钝、脑子呆板、脸无笑容，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怎么你倒是意气风发、脑子灵活、经常笑容满面？你是一个异数，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不要见怪，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刘总经理，我是早就看破红尘了。”我笑着说。“劳改地方有一句话，叫做‘不可不来，不宜常待。’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社会和人生，得到了磨炼，所以说不可不来；但在这种场所长期待着，饥饿、劳累和沉重的精神压力就会把人弄傻、饥饿劳累而死去，所以不能长。我始终相信世道总要回复到公正。我当自己在炼狱走一遭，给我一个磨炼。我只是没有太悲观失望而已。”

然而我想起了经历漫长劳改的芸芸众生，想起了 1157，想起了朱永信，的确很多人都像刘经理描述的那样滞呆和麻木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经典名言“人是可以改造好的”现成的标准样本。最近看到 2005 年在中国评为优秀中篇小说的《姑父》一书，一个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青年，因在国民党时代做过一段政府公务员，就发配去常年改造，平反后已是一个只知抓吃、神经紧张、身体变形、目光滞呆的废人，改造后的新人大概与此八九不离十吧，我和他们不一样，只能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人，是有着花岗石脑袋的人。

半年后，由于我解决了几个较大工程项目的关键问题，花费少，效果佳，所以晋升为技术科副科长，与颜副科长并列，他管行政、签字，我管技术工艺。技术科最多的时候有 52 人，包罗了工程技术人员、英语日语翻译和绘图描图人员。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怪现象，因为石油部只设了多位副部长，无正部

长，所以下属的所有机关都只设副职，无正职，海洋石油公司只有副总经理，各个处只有副处长，科也一样，不论技术科、行政科、会计科都只任命副科长。对于我来说，正职、副职，还是无职，都无所谓，我没有一点名利欲望，只想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有工资、有业余生活、有自由度就可以了，周日常去天津市区与得到平反和落实政策安排在天津的难友聚聚。

石油系统搞惯了会战，提倡军事化、集体化生活，石油部前后任副部长康世恩、余秋里等都是老红军出身，大批转业军人也素有军事化的习惯，大庆油田搞的就是军事化，海洋石油公司虽说是公司，也继承了会战的遗风。我们吃饭都在大食堂里吃，炊事员是北方的退伍士兵，做菜大多粗放，不合南方人的口味，而公司附近的塘沽地区还是一片盐碱荒地，没有饭店、小摊可以换换口味。饮食虽然不好，尚可忍耐，最烦恼的是住宿，我是老光棍，已 40 多岁了，还只能分配到四人一间的单身宿舍去，单身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是没有结婚的小青年，或者是家在农村的青年职工。石油行业有一个独特的景象，石油企业都在附近设立农场，主要招纳家在外地农村的职工家属，平时这些农村来的职工住在单身宿舍里，每周末公司派大卡车把这些职工送到农场的家中去，使企业内的职工和家属团聚。我和三个年青人住一个宿舍，和大学里的学生宿舍一样，这些年青人每天晚上开着大灯，打牌、喝酒，吵吵闹闹，不到半夜不会罢休，我为此长期连续不能入睡，精神萎靡不振。我也反问自己：为何在劳教或留用期间，30 人一屋，为防止有人逃跑或出现什么意外，房顶上的电灯总是通宵达旦地亮着，我却百无禁忌，毫无感觉，每天一觉睡到天亮，从未有过失眠之时，这倒保证了我白天的劳动效率。平反了，工作轻松了，住宿条件比起那时也好多了，可是晚间开着灯就睡不着，什么原因，

我不得而知。我想长此下去，身体要垮，所以要到附近居民区租一间屋单独住，但张厂长告诉我：

“我们是军事化组织，不允许任何职工到外面去租房住，只有结婚成家，可以在厂里分到一间屋，否则只能住单身宿舍。”

军事化，军事化！吃了十几年苦，又缠上了军事，就凭这军事化组织，睡不好觉，我就想离开这个场所。

我已经 41 岁，在公司似乎正崭露头角，所以来介绍女朋友的很多，党委书记是一位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的转业军官，经常找我谈谈，要我在婚姻问题上把好关，他说我以前就是因为找女朋友时政治上不把关，吃了大亏，劝我找一个共产党员，保证政治上不会出问题。言下之意我的平反不过是沾了政策放宽的光，当然从他的立场来看也是好意，我也揶揄地回答说：

“实在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但女共产党员不好找，何况一个党员如果找一个像我这样的被改正的反革命分子，岂非成了她的政治问题！”

“你的政治问题早过去了。”他说。“对象也不难找，组织上就可以帮你找。怎么样，我们公司内就有好几个很好的女党员同志，年龄合适，工作积极。”

他还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认识，是公司里的几个大龄女职工，长得一般，年龄也大了，都是党员，有的还年年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但这样反而不易找到对象，拖到了现在。我只好哼哼哈哈不表态，才算退出这尴尬的境地。又常有什么领导、什么头头来介绍女朋友，他们介绍以后，就有书记同志来“帮助”、“开导”，如果介绍来的是一名女党员，游说的人更多，他们说这样我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虽然他们出于好意，但我十分不舒服。这一时期来介绍女

朋友的似有应接不暇的局面，回顾留用期间寻访乡间也无人问津的狼狈相，使我常想起那句老话：“富在深山有远亲，穷落街头无人问。”而劳改场所的生活又远比穷落街头悲惨得多了。

81 年时，有天津朋友给我介绍一个上山下乡回市的赵姓姑娘，她总有一种哀怨的目光和忧郁的神态，引起我很大的同情感。她父母家在北京，因户口控制太严，回不去，正好天津有她的一位从未结婚的老姑妈，她们姑女两人就相依而过，周末我常去天津她的处所盘桓，我也说不出多少爱，只有往日的经历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希望帮助她，给她安慰。一来两去，也想进一步结婚算了，然而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阻碍了最后的决定。那时塘沽到天津的火车班次很少，上下班时只有一趟车，公司到火车站还够远，先要步行 20 分钟到公共汽车站，等候公共汽车再开到火车站也要 20 多分钟，周六下班已 5 点多了，到得天津市内至少要 9 点以后，在塘沽工作的人很多，车站人潮滚滚，车上拥挤不堪，周日返回塘沽，下午就得动身，也有不少天津人等到周一赶早车回来上班，但凌晨 4 点就得起床，赶 6 点发出的火车，冬天完全是受罪，许多人在门窗封闭的车厢中猛抽香烟，烟雾弥漫，公共汽车下来还要走 20 多分钟才能到办公室，时间一长，成了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最后我意识到我对她的同情心多于爱，只能开诚布公地对她说出我的真实感受，我们就此分手。

大约 82 年的时候，公司决定制造我国第一台海上石油平台导管架，就是平台在海面下的钢支座架，把钢管用桩打入海底十余米，然后把导管固定在海床上，采油和钻井平台就座落在此导管架上面和导管架固定住，导管架有 20 多米高，长宽各 20~30 米，由许多一米多直径的钢管作为横梁和纵梁焊接而

成，因为它长期处于海底寒冷的冰水中，既要承受风浪的不断冲击，还要承受上面机械设备的振动和冲击，所以要求非常严格。设计图纸由日本提供，建造时由于太高太大，分作两大片制作，做好以后再在船厂坞中对接，规范规定对接时上下左右误差不能超过 6 毫米，这是非常严峻的工程施工。如何把上千吨重的两大片导管架拉到船坞按标准对接起来是一个难题，日本顾问团也从未做过，总公司指定设计院、平台公司和日本方面共同拟定几个方案，最后我的方案获得一致肯定，日本顾问团也认为有创见，后来确实顺利圆满地对接成功，公差全部达到标准要求。这个工程的完成给我贴了不少金，日本顾问团对公司总经理表示钦佩，不久钟副总经理在党委会上提议提升我为平台厂副厂长，我们隔壁的新港船厂是全国红旗单位，厂长（第一把手）是交大高我两级的学长，大概钟总由此想到要提拔我，但一位熟悉我的厂长说：

“老唐这人技术上很出色，就是太随和，特别同情下层职工，以后谁来闹奖金、工资、福利，他会一律批准，这样就不妙了，何况他有一段特殊的历史问题。”

我也一再对领导说明，我不想当官，我也当不了官。我一个非党人士，还是劳改释放犯，我才不会来当一个行政官僚。最后党委讨论给我提升为副主任工程师，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

当了副主任工程师，收入待遇高人一头了，不愁衣食，还有不少免费宴请和福利。海洋石油公司和多个国家有合作关系，外国代表团三天两头地来，来了按惯例我们先要宴请，他们再回请，因此时时有宴会，天津和北京的大饭店几乎都跑遍了。由于工程业务的需要，我两次带队分别去了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去日本的那次，要检验我们购买的海底钢管的质量，日

方屈意奉承，生怕查出毛病罚巨款，所以住最高级的旅店，午饭都由高档饭店专送，天天晚上宴会接待，回想劳改时的窝头、咸菜、棒棒粥，真是今非昔比。人生起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当年我和郑瑛交往，舅舅说如果跟了郑家到香港去，早就是坐汽车阶级了，然而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却为此打入十八层地狱，孰之过？只是为了追求些微的自由，评说了几句本是荒谬的时政。不料几十年后，绝境逢生，竟有今天这样辉煌的日子，竟有今天这样一阵风光，但青春年华已去不再回来，还有多少人没有等到转折的机遇，永远沉寂了！

不过我的心情并不十分轻松愉快，许多事情让我捉摸不透。虽说文革以后社会空气一新，人们说话可以放开一点，不必事事拿出“最高指示”，句句不离阶级斗争，但整个政治气氛并没有彻底改变，对私生活的管束依旧，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海洋石油系统有不少人是全家都在公



1984年去日本验收钢材。在神户留影。

司工作的，还有很多人是同一油田、同一部队调来的，谋求家族利益、拉帮结伙、请客送礼，这种风气比一般单位更加突出。我是孤身一人，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个朋友，我得到的一切待遇都是公事公办，而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几乎一个不漏地用种种理由派出国去学习或作国外常驻代表，有的只有中学程度，就安排出国进修英语或日语，一般青年技术人员，考分再高，要不是党员，最后很少批准成行。我在劳改单位听惯了吆喝，习惯了服从管教，对金钱、地位早已看透，所以心理上倒也平平，没什么怨气。但我始终感到无名的政治压力，我当然不是党员，许多重要技术问题的决策不能参加，有时我提出的合理方案不知何故被排除在外，出国技术考察必须等到党政要人和党员工程师轮番出去之后，才算照顾我一次，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仍然是一个异类，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不可靠者。

石油部为了加快对外合作和技术改造，每年都招考公费出国进修生和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要由工作单位党委推荐批准。82年我通过平台厂推荐参加了考试，谁知我竟以高分获石油部录取，但我的名额却一直被海洋石油公司扣住不宣，后来我向石油部查询，才知早已批准，通知报到的函件早已发到公司，那时距报到日期还有几周，我找到公司书记，他的答复让我哭笑不得，他说：

“你要求出国进修当然很好，但当初我们认为你不大容易考上，因为英文和数理基础课程都要通过，为了不影响你的情绪，就同意你试试。”接着又给我戴些高帽，“你的技术能力很强，基础也很好，这里工作这样忙，离不开你，还是给公司多做些贡献吧。”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名额转给了一位领导的儿子。这就是不讲出身、学历，公开招考的公平原则！不过我也很平静，这次

只想测试一下自己的知识水平，然而深感我们的社会依旧如此，党即联国，无奈！

劳改单位人与人钩心斗角，是因为警察队长故意挑拨，以加强管理机制，现在我看到社会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台厂有三位副厂长，一位留苏学石油的可说是正宗出身，他是石油部下来的人，和部里关系密切，是实际的正职，另一位刘姓厂长是从船厂支援石油行业来的，原是工程师，在石油行业尚无荫庇，还有一位姚姓厂长原是石油油田的工程师。这三位互不服气，经常暗斗。我只顾自己的工作，一般只听李厂长的安排，后来李提升回石油部了，刘厂长认为我是李的人，一直想贬压我，公司总经理要我当平台厂副厂长时，就是这位刘厂长去为我推托，我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去计较，通过劳改的洗礼，我的耐心，我处理问题的火候已有独到之处。

公司里的政治思想工作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交女朋友的事不断来关心，重提政治好对我有帮助。我来往信件很多，几乎每天都有十来封来信，因为我有不少难友平反后到了各地，十余年来在同一屋檐下的苦难生活，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大学、中学的同学自我劳教后不再联系，怕连累别人，现在我平反了，很多人在找我。公司名下有一万多职工，分门别类的各个部门不计其数，但每天的信件全送到总部收发室，由他们再分拣，公司收发室比当地的新港邮局还要庞大，有的朋友不知我的详细地址，光写海洋石油公司，照样一封不差地送到平台厂来，有一封信写了新港船厂，也送到了。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副书记找我，婉转地劝我不要联系太多人，容易出问题。我当然回答他我会注意的，也解释了上述的缘故，但一个阴影留在心中，监管你的人无处不在！

1983年我带了三个人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 Thibodaux，一

家制造浅滩两栖作业车的公司学习，准备以后合作制造这种车辆，在山东浅海勘探中使用。实际上，这种车类似于坦克，用履带代替车轮，车体下加两个浮筒似的钢结构物，使车辆在水中浮起。所有费用，包括住宿、吃饭，都由美方承担，石油公司只负担每人每天一美元的饮料费。我们是第一次到美国来，为了看看美国的大城市，订的机票是从北京到纽约，住一天，再到新奥尔良机场。纽约下飞机后已是夜间，坐出租车到 42 街中国总领事馆接待处，路上只见摩天大厦栉次鳞比，霓虹灯光千姿百态，令人赞叹不已。第二天到达新奥尔良机场，美方老板已携夫人在出机口等候我们，他十分奇怪，为何我们要从东北的纽约折回南部的新奥尔良，从加州转机既省时又省大笔机票钱，我们无以回答，以必须去中国领事馆报到来搪塞。

老板为我们租了一个三房一厅的公寓，团内有一个姓蒲的女同志住一间，我们三个男的分住两间。老板又给了一张超市信用卡，所有吃食这超级市场全有，走过去只要 10 分钟，我们买回来在公寓中自己做饭，非常方便。公司离公寓约 10 分钟车程，每天早上，美国公司的人接我们去公司上班，中午接我们回公寓吃午饭，吃过饭再接我们去公司，下班接我们回公寓，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因为我们没有美元，又是第一次到美国来，回去时总要带些礼品送给家人和亲友，我们四人商量后，决定每次去购买食品时尽量多买一点巧克力、饼干和可以储存的美国食品，两个多月下来，每人都分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食品，回去可以作为礼品分发。我总叮咛不要买得太多，要是老板知道太没意思了，也有损国格，但我是名义上的团长，另外两人都是党员，出来前书记对他俩有关照，给了他们顺便监看我的任务，所以我也只好由这两位党员同志做主，他俩还不时埋怨我管得太严，大有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之嫌。我懂了，叫

我当团长，因为我的行政职务是副总，给我点面子，实际上，党内指示他俩要多负责任，特别是原则问题。回国时，他俩坚持在纽约住几天，到处看看。我还想国内公司一再有文件下达，出国不能超出任务范围，不能多留一天，这两位党员同志为何比我胆子大得多？以后出国多了，慢慢我也明白了，凡是能出国的大多是领导的关系户，或者会溜须拍马的，这些大官小官轮批走，无一团组例外，出国后尽量多玩多看，有的一大半时间在逛大城市，在著名旅游区转悠，所谓任务不过蜻蜓点水，露一下面即可，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种，尤其在开放之初。

我们在纽约停留了四天，住在 42 街的中领馆，那里走几分钟就到了商店林立的繁华地区，街上有很多家性用品商店，也有各种成人杂志。一天下午，我们约好各自自由活动，可用自带的私房钱购买一些纪念品，我跑过一家大的性用品商店，看见团内吴党员同志正背对着街看一本裸体杂志，我跑进去对他大喝一声：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啊，随便翻翻。”他支支吾吾、面红耳赤。

我跟着他到了里屋，又是一惊，女孩蒲同志也正聚精会神地读着书呢！蒲是大专刚毕业的女孩，很漂亮，与公司的领导有些特殊的关系，是以翻译的名义硬塞到团里来的，其实她英语根本不会讲。我们三人刚要出店，只见还有一位邓同志正从另一扇门走进来，我开玩笑说：

“以后不要成群结伙来了，还是单打一，以免影响不好。”

那时国内对性是禁谈的，认为都是黄色的东西，后来我知道，出国考察也好，培训也好，几乎没有人不到这种店里“学

习”，还有想找“洋鸡”开荤的。

我们住的 Thibodaux 是个小城，才 5 万人口，倒有家中国餐馆，我们认识了在那里做油锅的小潘，他是华裔越南难民，没有专门技术，就一直在餐馆中当油锅，每月 1000 美元收入，自己有辆很好的车，近 30 岁了，还找不到女朋友，因为当地中国人和越南人很少，见到我们的蒲小姐，一见钟情，每周末都来找我们，当然是为蒲小姐来的，他开车带我们到新奥尔良去玩、去吃饭。我在公司的工资是 120 元人民币，已是高薪阶层了，小蒲这样的 50 元人民币不到，一听这个油锅工可挣 1000 美元，合 10000 人民币，住房还由餐馆提供，简直不敢想象。一次，小潘要餐馆老板娘来请我们三个男的吃饭，我们奇怪为何只请我们三个人，原来小潘约蒲小姐到别的外国餐馆吃饭，以回避我们。老板娘直截了当，介绍小潘为人好，工作卖力，收入不错，请我们开导蒲小姐同意和小潘交朋友，还说，如果蒲小姐同意，就可留下不回国了。我们只好对她说，此事要蒲小姐自己决定，不过即使她同意，也至少先要回国，以后考虑出来和小潘结合。我们三人出于对小蒲的前途考虑，觉得这里可以挣那么多钱，劝小蒲不妨先做个朋友。小蒲是个聪明的女孩，没有表态，只表示慢慢再说，在 Thibodaux 她和小潘一直有来往，临走前，小潘买了不少珍贵礼品送她，回国后她就不和小潘来往了，追求她的小伙子很多，有些头头也喜欢她，她有自己目光，小潘还不够格。后来据说小蒲和公司某部门的头头关系特殊，几次带出国去旅游，下面反映很大，但有头头保护，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周末我们常到新奥尔良去，多次在中国餐馆就餐，老板和老板娘主动来搭讪，问我们要不要在他们餐馆找个工作，告诉我们即使打杂，也可拿 800 美元一月，我们还看到他们餐馆中

男女侍员和打杂的都有漂亮的汽车，工作也轻松，十分羡慕，颇为犹豫，只是考虑到由公司派出，不能随便溜走，总要讲一点信用和诚信，所以并未留下。

我知道周围的领导们对我过去被劳教还另有看法，这与对我的复查结论中留有尾巴关系密切，复查结论中说我个人主义严重，讲过错话，自 80 年起我多次向部队反映，直到 1986 年 3 月才给我更新复查结论(见前漫漫平反路一节)，那时我已在渤海石油工作近七年且准备自费出国留学了。

由于我的复查结论中留有尾巴，仍对我影响很大，出国、进修等一系列事情上都碰到一座无形的墙。“他过去的问题不清楚，有错误，以后弄清了再说。”“他这人只能使用，不能信任重用。”我常听到如此的“内部精神”。事实也如此，出国考察、技术培训都要其他人轮了一圈才照顾我一次，党内人士好言告我：“可能你过去的问题还有尾巴。”我刻苦学习，考取了出国进修生，却被瞒着不通知，硬卡下来，虽然我是主任工程师，但政治上的阴影始终脱不开，离不了。

我知道左倾思潮还深深地留在人的脑海中，可靠等级依然存在，恋爱婚姻总要论及政治因素，权力和利益争斗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家族势力膨胀，任何事情都要靠人际关系，公司内贪污渎职和裙带风盛行，这些都使我很无奈，小规模运动不断，批判目标时有转移，虽不提阶级斗争，许多做法和内部控制还是一样，现在邓小平时代了，虽然默认了毛泽东的错误，但仍然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文化大革命这样残忍恐怖的浩劫并没有彻底清算，国家元首的世袭制或钦定制依然如故，世界上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少了。这一切使人感到文革后的场面不过是领导的世袭交替，换人革面而宗旨不变，我已经把最美好的年代丢失在劳改中，真怕又来第二次，说不定那年那月又一

个人斗人的潮流汹涌而来。也许劳改时间长了，劳改油子的品性不易去掉，心灵的创痛时隐时现，经常有莫名的忧虑悄然袭来，不知何时又会滚到社会的最底层，过去是祸从天降，今后也许会从地下震出来！因此从 85 年初起，我酝酿着自费到美国留学的事，我希望找到一个没有政治压力、公平生存的环境，我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发财欲望，只想后半生自由自在轻松一些，以弥补前半生的沉沦艰涩。

不少同事、亲友要我慎重考虑，有的人认为我是傻子，放着三天两头宴请，满桌山珍海味不要，宁愿打工洗碗！我也犹豫，现在已是公司级领导层主任工程师，也算一个小官，和国内相比，工资收入也不少，出国、宴请机会很多，吃福眼福都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何况我已 47 岁，诺大年龄到美国留学，还要靠做苦工来挣学费和养活自己，学出来又如何呢，也是一个未知数，而混在碧眼黄发的洋人群中，孤独无聊之感在所难免，我能接受这个挑战吗？也许是我多年劳改生涯的磨炼，使我渐移默化，名利的欲望十分淡薄，艰苦的条件承受得起，但求心灵的自由舒畅。我心想出外几年，至少学一些新技术、新东西，如果国内情况安定好转，再回来也不晚，最后决定试试。

经过努力，我找到几所美国大学接收我当研究生，我就开始向领导申请自费留学。对于这个申请的艰难曲折，我早有思想准备。国家规定，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人必须办理自费公派，首先要由工作单位同意批准，我担心又会像上次考石油部公费出国留学一样被卡住，所以几次找了公司党委书记和局长，申述当年被卡一事不公，当年他们曾经敷衍我说：

“现在工作很忙，离不开你，今后出国留学的机会多得很，一定不会忘记你。”

我把这些话扔还给他们，而那时国家的政策也放宽了，所以他们不便再加以阻挡，于是厂里一关就算通过。第二个难关是办护照，护照由公安局审批，他们常无缘无故地不批或拖延时间，总推说正在处理，不回绝也不告知何时可批，有的人等了一年也没有回音，问办事员，只说已报上去了，其中是否有什么内部精神就不得而知了。后来经明人指点，说找关系就行，我花了一笔钱买了礼品，转托公司内的公安人员送到护照申办处他的朋友处，这才拿到护照。最后办理美国签证，这就需要美国的担保人做经济担保，我有一远房表叔，住在美国，过去他妈在上海时我常去看望她，帮她写信、办事，所以该表叔对我颇有好感，我就请他给我担保。我知道中国去美自费留学的学生大多是自己承担学费生活费，边打工边上学，亲友的经济担保只是一个法律文件。我父亲年岁大了，搞不清现今的惯例，他为了帮助我办成此事，以他的名义给我表叔写了一封恳切的长信，表示请他们帮忙，今后一定重谢等等，父亲还把此信复印了一份寄给我，让我记住以后要报答他们。我一看就知不妙，因为信中有这样的话：“有关小儿来美后所需学费及生活费用等，还望大力借予，以后一定加倍奉还……。”我深知大学研究生学费昂贵，一般人家根本负担不起，何况是一个远亲，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父亲，想修改此信，说明我若出国留学，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向别人借贷，但为时已晚，父亲早把信寄出了。从此我表叔处就杳无音讯，他肯定因为借款而犹豫退却了。后来由我大哥出面，找到另一个远亲，说明绝不借钱，担保书只是手续之一，这样才办好了签证。

出国前，厂里领导在天津宾馆摆了一桌酒席为我饯行，我是石油公司第一个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有的领导托我出国后为他们的子女探探路，虽然石油部每年都有公费留学的名额，但

都要通过考试，自费则只需要有熟人在美国联系沟通，容易得多，我一一答应，此后，我到了美国都为他们尽力办理了。

1986年12月中旬，我办完了一切离职手续后就立即回到上海，准备行装。我把积蓄的存款悉数取出，购置了能用几年的衣服、用品，并按规定在中国银行兑换了45美元，剩余的人民币又在黑市换得155美元，母亲有100美元私房钱，是一个亲戚从国外回来时送她的，全给了我。

长期生活在动荡恐怖的环境之中，政策朝秦暮楚，精神紧张已经形成惯性，生怕突然公布一条新的规定，所有的计划全部落空。亲友和同学之中就有因为一时疏忽大意晚了几天前功尽弃的事例。我甚至害怕政局突变，左倾的残酷镇压重新袭来，那就别说出国，恐怕又要身陷囹圄，所以不敢陶醉在出国前的喜悦之中。我没有多看一眼这块生我、养我的国土，游览一下祖国的美景，没有和父母、亲友多呆几天，休整一下长期疲劳的身体，在上海总共逗留十天，就在亲友们的催促中，于1987年1月5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匆匆登上了飞往美国底特律的飞机。

通过海关，登上飞机，找好座位，我因激动而喘息，我闭上了眼睛，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中。别了，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别了，我的父母亲友，我将孤独地奋斗，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47年的坎坷历程，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的心中掠过一阵迷茫，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年青人的雄心勃勃了，一切美丽的幻想在劳教农场和采石场的劳累、惊慌、恐惧中磨灭殆尽，美好时光已经流逝而去，但我依然留有足够的勇气，几十年的磨炼使我坚忍不拔，没有过不去的河，我愿意带着好奇闯荡一个新世界，只要那里没有禁锢心灵的枷锁。

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旁座和我说话也没有听见，直到他推搡我，提醒我系好安全带才醒悟过来，只得支支吾吾地自我解嘲说：

“喔，我有些困倦了。”

现在飞机正在离地，继之冲入云霄，一股控制不住的激动在我心中升起。

“我自由了！我终于离开了这个使我胆战心惊的出生地！终于挣脱了全身的枷锁！”

困难也是明摆着的，独处异国他乡，无亲可靠，囊中羞涩，但为争取自由，值得冒险。

当我步出底特律机场时，口袋中的 300 美元就是我的全部现金家当，但我不会再从人变成地狱中的鬼，我终于来到这个久仰的自由国家，我感到呼吸畅通和舒坦。



1985 年访问北大荒农场。



作者（后排左一）来美留学前在家门口与父母兄嫂侄子女合影。1986 年底。

自费留学

1987年1月5日，我口袋里揣着300美元，带着两只大箱子，装满衣服、日用品，甚至还有牙膏、肥皂，在上海机场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当时我姐姐正在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作针刺麻醉的访问学者，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底特律大学作为我读研究生的学校。一周以后，我到学校去报到，立即意识到我的处境十分困难，学校一年分三学期，外国学生至少要上满两学期，有一个学期，通常是暑期，可以想法去打工，当时每学期的学费至少5000多美元，幸好我的英语根底尚可，考试后确定我只需再上一个学期的英语课，重点在口语听说，英语课比专业课便宜一些，第一学期，我着重读英语，另外读一门基础课，只要付4000多美元，但这和我的全部家当300美元还有天渊之别，何况还要吃饭、住宿，幸好学校体谅外国学生，允许延后交付学费。

我和另外五个大陆来的留学生合租了附近一个黑人家庭的地下室，大陆来的都带有被褥，而街上、路旁很容易找到美国家庭扔出来的旧床垫、旧家具等物，所以我们全部睡在捡来的床垫上，好与潮湿的地下室水泥地有一隔离物。学校在底特律市区，周围黑人很多，夹杂少数穷白人。我们六人自动组织起来，每天一人轮流值班，负责做早、中、晚三餐，像食堂吃饭一样。为了省钱，超级市场的处理食品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那里鸡腿、鸡膀骨和鸡杂最便宜，过期的处理面包是我们的主食。早餐总是牛奶、面包、花生酱，加上少许廉价黄油。中

午、晚上千篇一律炖鸡腿，烤鸡肉，或鸡肉素菜汤。黄油面包、鸡腿、鸡汤在国内是贵族们的上等食品，开始时，我们十分欣赏，吃得津津有味，吃饭时互相调侃，热闹得很，2~3个月下来，就变成食不知味了，以后条件好了一点，看见鸡腿就有恶心的感觉。

大家都为付学费绞尽脑汁，有的人去中国饭店当了侍者，我则由人介绍到了一中餐馆厨房当打杂工。餐馆老板都尽量选年轻漂亮的女士做接待员以吸引顾客，我已是快近 50、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只能在厨房当下手。那时一周只有四天课，我周五一早就去餐馆，十点开始工作，拣菜、切菜、包饺子、油炸、轧面什么都做，没有停下来的时间，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餐馆打烊，然后清洁厨房，吃饭，十一点才能回到餐馆老板给员工准备的一间租来的屋中打地铺睡觉，白天太累，总是一觉睡到第二天 9 点以后才爬得起，周日晚上回学校附近的地下室。一天工作十三小时，手指、脚趾都干到发麻，这个工作是熟人介绍的，我也只想积累一些餐馆工作的经验，为以后打工做准备，所以也没讲工资是多少，心想即使给最低工资，即 4.5 美元，也可以。老板娘的嘴歪了，我姐还免费给她扎针灸，想拍拍马屁，多给我开一点工资，我干了三周，第三周末正是月底，餐馆一般都是月底发工资，老板付我 234 元，他说：

“你是新手，一共干了三周，每周三天，共九天，我付你 26 元一天不算亏待你了。”

我一算，13 小时一天，合下来每小时才 2 元，回去对地下室同伴一说，大家都为我打抱不平，劝我绝对不要再去了，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 4.5 元低很多，都骂中国餐馆老板心太黑，黑得离谱。后来我看到电影《北京人在纽约》，不禁为自己没有王起明那样的艳遇而嗟叹，怎么我就碰不到阿春这样财色俱

全的老板娘？我可也是单身啊！在美的第一次打工留下一个恶劣的印象，繁重劳累、体力难支、老板克扣，似乎又进入了下三层的行列，只是没有劳改队里警察队长的管教而已。不久我姐姐在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一白人家庭要雇一个每天工作几小时的管家，且提供住宿，我也很想住到美国人的家中，好逼我用英语交流，尽快掌握语言工具，否则几个中国人挤在一个地下室，天天讲国语，吃中国饭，永远适应不了美国社会，当即决定去应聘，约定了面谈时间。周末由我姐开车送我去，有一小时车程，这是一个白人中上层家庭，男的有自己的公司，女的没有固定工作，家有三个小孩，五、六岁到十几岁，偌大一个家，需要有人帮忙，要清洁、要割草等，他们愿意让我自由安排时间，可以边读书边工作，每天工作 3~4 个小时即可。我的工作是在花园割草、室内吸尘清洁。他们喜欢吃中国菜，我就发挥我的中国特长，每周负责做 3~4 次晚餐。他们供我免费吃住，每月付我 450 元。当他们知道我还没有汽车，他家距我学校有 60 英里时，老板主动借我一辆几乎全新的车，我只要自己加油。后来我知道他们原有一个美国管家，30 多岁还是光棍，前不久追女朋友去了德州，不想回来了，这辆汽车原来是专供他用的。第一次住到美国人家中，英语还不很通，想想可笑，一下子成了美国佣人，从高级工程师直线下降为侍候人的下人。不过我倒没有沮丧，只感到有些陌生，怎样在洋人中间生活，怎样扮演一个佣人的角色，是否要低三下四、察言观色、手脚不停地干活？没几天，我发觉他们对我像朋友、客人一样，吃饭都要等我从学校回来一起吃，说话非常客气，女主人对我特别友好，一直想从各方面帮助我。我一周只有四天有课，有时仅为半天，男主人叫汤姆，要我记下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四小时的，另外给我按小时计，女主人汤姆太太常给

我多记时间，最后汤姆一看，完全超出了可能，他也知道这是女主人的善意，没有说穿，干脆不提，只给我 450 元一月就算了。有时与汤姆太太闲聊，谈起我父母年龄大了，她问谁在家照顾，我说：

“家中请了一个女佣人，想不到我不在中国家中当佣人，反而跑到美国来做佣人了。”

说完彼此哈哈大笑，她说：

“It is so funny!(这真是太滑稽了!)”

她看我身材消瘦，就问我：

“你怎么会保持这样好的体重标准，怎样能使身体不发胖？”

我只好在心中苦笑了，那是我长期的炼狱生活的另类奇迹，劳教期间长期的饥饿，过重的劳动加上偶而的暴食，在我解教时病痛全爆发开了。严重的胃溃疡而使我消化吸收能力极差，病根深沉已无法回复，廿多年来我始终只能有着如此瘦薄的身材，我身高一米八，但体重一直只有 140 磅。这个实情不好说，只好隐瞒收藏起来，我告诉她：

“我们中国人多以米饭素菜为食，少吃你们的甜甜圈和汉堡包，自然会让你保持细瘦苗条的身材。”

至今我工作的美国公司同事们还经常在向我取经：“彼得，你有什么秘招？能一直保持瘦长身材，从不发胖！”他们



在 Tom 家打工的厨房一景。

那知道我的心酸史和这种病态瘦。有时我只好忽悠他们说：像我一样吃中国饭吧！如不是有所顾忌，我真想建议这些美国胖男、胖女能自愿发配到中国劳改场所与中国难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只需三同半年，保证他们一次性减肥成功，永不复发、受益终生！

我在他家干了大约四个月，我每次开车来回，约 2 小时路程，开车技术就练出来了。7 月底，有一个中国教会的人，介绍我到一家中餐馆去当油锅。厨房中除了大厨、炒锅外，第三就是油锅了，大厨负责全面安排，调好料、配好主要菜肴，炒锅简单一些，把菜放入锅中烹炒，放进大厨做好的调味料就行了。基本上所有的菜都用同样的调味料，另外再按菜名加上辣椒、糖醋等等。美国人喜欢油炸的春卷、鸡腿、排骨、鸭子和各种油炸点心，甚至肉圆、素菜也要炸一下，所以比国内餐馆多了一个“油锅”的职位，再加上打杂的、洗碗的就组成厨房的一班人马。大厨为首领，很多餐馆由老板兼大厨。国内的厨师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还要实习一段时间，或者是家传几辈，有独到的功夫的，菜肴自然鲜美，而美国这里开中餐馆的人，大多是半路出家，以此谋生，开始的时候打苦工，从跑堂打杂做起，然后升到炒锅、大厨。一般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一个外行人就可以到中、小型饭店里混个大厨了。介绍我去的这家饭店叫新北京餐馆，老板是山东籍，是从韩国过来的，也是餐馆打杂出身，逐渐积蓄了一点钱后，起先开了一家小饭铺，早年美国的中餐馆很少，所以生意兴隆，以致逐渐扩大，当时已经成为拥有 180 座的一家中餐馆，在当地颇有名气。厨房的一个油锅刚辞职，自己去开小饭店了，所以找到了我，答应开头给我每月 900 元，以后再加，供吃住。我想暑假到了，必须多挣些钱，因此辞去了汤姆家的管家职务，介绍了一位台

湾女同学去接替我，她只要在暑假中稍许挣一点钱，工作不忙就可以了。

新北京餐馆当然卖北京菜，一个大厨年龄不大，也是韩国华侨，早先来美后在饭店打工，慢慢当了大厨。饭店老板也在中午、晚上忙碌时过来帮忙炒菜，另外一名二厨兼炒锅，原是台湾货船上的船员，跳船下来在饭店里已混了三年，到新北京成了二厨。他们教了我一些油锅应做的事，比如把肉包上团粉酱等，第一天晚上就正式干开了。我是看中了 900 元薪水和包吃包住的待遇而来的，这第一天就领教了油锅这个活的繁重，一上来就忙碌不堪，春卷、馄饨、鸡翅膀、烤鸭全要炸透，另外不少炒菜中的肉片、肉丸、鸡丁等也需先过油，饭店还把韩国出名的什么炒马面、韩国汤面也列入菜谱中以增加特色。为了好吃，面条全部要现轧，轧面的工作也由油锅负责。餐馆生意很好，晚上几乎天天满座，两个大油锅同时操作，还要轧面条，真是应接不暇，好我在劳改场久经考验，动作够快，经常同时应付四、五个侍者需要油炸东西的要求。像鸭子、杏仁鸡等还必须切成小条放入盘中，再加上炸龙虾片、黄瓜片等装饰品。油锅的爪篱很大很重，一个爪篱有十斤重，炸春卷、鸡翅膀等必须抖动爪篱来翻身，使各个面都炸得均匀，与推动轧面机的摇把同样费力。第一晚，斩烤鸭时不知为何刀会砍到旁边漂亮的菜盘上，咣当一声菜盘四分五裂，旁边老板和在厨房帮着炒菜的儿子马上怒气冲冲地问我：

“刀怎么会砍到半尺外的盘子上？知道这盘子多贵吗！”

很多中餐馆虽然菜味很差，但为场面好看，都配以高档菜盘，我只好连连说：

“我赔，我赔。”

我也不知为何会砍到半尺外的盘子上去，只能是肌肉过分

劳累紧张已不听大脑指挥了。当时大家都忙着客人点的菜，就分头干自己的活去了。

因是七、八月份大热天，餐厅当然冷气充足，但厨房炎热不堪，我又在两个大油锅之前，整天满身大汗，几次差点昏厥倒地。因为手腕不断抖动铁爪篱，爪篱盛着油炸鸡或大春卷，至少 10 多斤，超出了肌肉和关节的承受力，两周后，我的手腕关节疼痛、肿胀。没有办法，还要赚钱凑学费，必须忍着，幸好来美时带足了伤湿止痛膏、狗皮膏、云南白药之类药品，只好每天在手肘部关节处贴上膏药，继续我的油锅工作。拜谢长期劳改的筋骨磨炼，对于这点困难，我倒没有多少烦恼。有一个从北京来读博士的刘某，他刚来还没有拿到奖学金，也来此厨房帮忙当下手，下班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有不少聊头，忘了白天的辛劳。

做着这种下等的体力工作，每天早晨醒来，浑身筋骨酸痛，懒得起来，有时我也犹豫，是否走错了路，自讨苦吃？但现在已无退路，总不能再回到中国去，再说来美后，精神上、思想上感到舒畅，没有任何政治压力，没有人与人的钩心斗角，目前只不过是孟子说的“劳其筋骨”而已，有劳筋骨的事我已做过十余年，什么苦也比不上过去的多重压力，而且拿到学位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犹豫、沮丧总是一闪而过，重新回归自信和坚定。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读到英文报上一则寻找管家的广告，要求能开车、能做饭，另外做一部分室内室外的保洁工作，一周工作六天，供住宿，周薪 500 元。周薪 500 元，一月就是 2000 元，我即使拿到学位，找到公司的白领工作，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多，所以这条广告吸引了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情，随便写了一份履历自荐，说明我是一个外国学生，但平均每天可以做 8

小时。发信后，我也没有在意，仍在新北京做油锅，约两周后，我意外地收到要我去面试的信。这是富豪居住区（Bloomfield）的一个犹太人家庭，Bloomfield 曾列入全美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社区，周围小型湖泊众多，风景优美，老板娘见我 would 做中国菜，是学生，比较可靠，而且犹太人对中国人有天生的好感，当时就对我说：

“你的情况很合适，过一周我给你回音，我还要侧面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和背景。”

她让我写下 2~3 个当地熟悉我的人的姓名、电话。我报出一对原先在中国教过我英语的美国夫妇，他们正好住在密西根州；一个我来美的担保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有一个是我姐姐。一周后我就接到电话要我去她家做工。这时新北京老板已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一再挽留，并答应把我的薪水涨到每月 1200 元，我考虑到油锅工作太辛苦，开学以后根本干不了，所以婉言推辞了，答应多做一周，把新手带出来，那位博士生刘某就是接替我的，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几年后大家情况好了，逢年过节中国朋友常在一起聚聚，这时刘总是调侃，宣称我是他的油锅师傅。不过他因身材瘦小，也没有当过苦力的经历，老板不甚满意，又找来了人，他干了一个月就回学校去申领资助了。

我到犹太人阿尔诺夫的家



在美国犹太富豪家当司机、厨师和家庭派对服务生。

中报到后，才领教到美国富人家的生活。这家中仅阿尔诺夫夫妇居住，一个儿子在外地读博士，很少回来，一个女儿在邻近城市读大学，至多周末回来一天。雇工中有一位女管家作领班，负责安排佣人每天的工作，以及买菜、吃饭等事，一位退休白人做室内清洁和简单维修，两名波兰妇女做室内清洁，夏天另有两名花匠做室外花园、草坪的种植和维护，这几个人都是八小时工作制，早来晚归。他们希望夜间有人住在那里，同时给他们准备晚餐，我是学生，单身，犹如晚间有一个保卫，他们又喜欢吃中国菜，所以我正合适填补这个空缺。他们住的是一栋很大的老式两层楼房，大小房间 20 多间，房前是一个大花园，花园进口处是一栋小洋房，楼上是装修十分讲究的居室，两房一厅，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楼下用来停车。当初建造这栋小房就是作为门房之用，所以老板娘就叫我住在那里，我带着随身包裹由管家领着去看，当然十分满意，全部家具、厨房用品、床上被褥枕头，都已准备好，是管家前几天去买好、准备好的。

我的工作，如果白天没有课，可以帮着另外两个搞室内清洁的做些事，晚上有时做晚饭，他们旅行较多，而且有自备飞机，我有时需开车到机场接送。老板娘说明：

“你仍在上课，不能算全职，又是刚来，需要观察和熟练一段时间，所以先付你每周 300 元。”

我当然十分满意，无话可说，接受了一切。

后来阿尔诺夫太太告我，她的管家征聘广告中，因条件确实优越，应征的信件有 200 多封。最后选中了我，也算幸运。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者多，也是一个原因。不少要打工的同学也很羡慕，后我也曾介绍过两位去阿尔诺夫女儿家做，但均未做长。

对于这个环境我是知足了，有足够的时间去学校上课做作业，晚上房中十分清静，电视、电话都是配备好的。阿尔诺夫夫妇经常出外休假，冬天常常住到佛罗里达的房子里，他们不在时，女管家就是头，中午常让我们这些佣工聚在厨房开派对，有时让我们每人做一个拿手菜、或一个拿手的点心。阿尔诺夫夫妇出门时间长一些的话，阿尔诺夫太太就给我一张商店信用卡，让我自己去买每天要吃的食物，如果他们在家吃晚饭，总要留一份好菜给我，如龙虾、牛排，想起中国的佣人，只能吃剩菜，从早到晚忙不停，工钱很低，确是天壤之别。

阿尔诺夫夫妇也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他们为我定做了一套黑色西服，一双黑皮鞋和一项黑色大盖帽，如有派对，或开车去机场接送，我就必须穿上西服革履，打好领带，戴好大盖帽，全副武装，犹如解放前大使馆门前的印度阿三一样。我在劳改单位早就训练有素，“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干得有模有样，因此我似唱戏一样，对此并无任何负担和压力。

我平时也喜好学一些特别菜肴的烹饪方法，上大学时和毕业后的一段时间，老同学常在各家轮流会餐，学到一些同学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家传菜肴。来美时我也带了些烹饪资料，有中国名菜谱、各地方菜谱，还有录像带。这本来也是考虑到，在美国万一生存有问题，这些菜谱也许能打开一条生路。来到阿尔诺夫家，倒是有了发挥我的烹饪“专长”的舞台了，他们常邀请朋友到家中来吃中国餐，还介绍说请了一位很好的中国菜管家。有一次从纽约飞过来七、八个高贵客人，和主人一起凑成一桌，我挖空心思，烧出来什么冬瓜盅，八宝鸭，葱油饼等，这些客人吃完后列队来到厨房，夸赞我的厨艺，并表示感谢说：

“在纽约这么多年，没有吃过如此可口的中国菜。”

我大吃一惊，我有这么高强的手艺吗？其实我有自知之明，就这两下子，万万比不上纽约的中国厨师，这些客人无非出于礼貌，出于对女主人的敬意，但阿尔诺夫夫妇却信以为真，认为我确是厨房高手，连纽约的客人也如此称赞，必定名不虚传。自此，她大女儿家请客也常叫我去服务，有时还把我借到他们的朋友家，为派对烧中国菜。我每次都细阅菜谱，小心谨慎，有的新款菜肴，事前还烧一点，尝一下，不足之处加以改进。这种时候我总是汗流浹背，有一半是为紧张而流的，好在每次都慎重对待，没有出现大的洋相。逐渐地，我在狭小的当地犹太人圈子里有了些名气，常有人为开派队来与阿尔诺夫夫人商借彼得一天。我则常是以同样的几种拿手菜从这家循环到下一家，也就没有多少压力了。

为了减少作业，我读的是工业管理，一周只要上三个半天课，不会影响打工，现在吃住已经全包了，每月 1200 元收入，没有其他开销，存下半年，正好够下一学期的学费，每次账面上还有几百元剩余，比起餐馆打工的其他同学宽松不少。学成后怎么办，能否找到工作，我现在都顾不上，只能到时再说了。

在阿尔诺夫家中，我接触到不少美国工人，因为阿尔诺夫家的房子大，常年有油漆工轮流粉刷和清洁各个房间和外墙。整理花园草坪的是波兰移民，他们放弃了在波兰当律师、工程师的职位，宁愿设法移民来美，在大热天干这种很累的花园工，这种情形我倒感觉很亲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同样的贫困和专制，他们渴望自由的勇气和我是一样的。至今我有不少经常来往、相互帮忙的波兰朋友，大多是在阿尔诺夫家认识的。

我在阿尔诺夫家做了两年，直到我通过论文考试，取得工

业管理硕士学位。那时阿尔诺夫夫人对我和对中国人有了更好的印象，她主动劝我不要到外面找工作，希望留在她家，答应付我与一般公司相等的薪水和福利，可以为我买健康保险，每年两周休假，并让阿尔诺夫以公司的名义为我办绿卡，先前她已请了移民律师在帮我办手续。

90~91 年，美国经济十分萧条，连学计算机的学生都难以找到工作，何况我这个完全是从“管理”混出来的外国人！所以我只好仍留在她家打工。数月后，北边的海湾市（Bay City）有一家做钢结构工程的德国公司愿意要我，面谈时老板知道我有钢结构背景，又是管理出身，很满意。但这是一个小城，工资水平低，当时我已结婚，太太在底特律公立学校教书，一个女儿刚一岁多，而海湾市离底特律有 74 英里，开车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我犹豫了几周，阿尔诺夫夫人又一再劝我留下，让我放心，保证只要她活着，就有我的工作，工资年年加。我犹豫多日，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海湾市就职，工作难找，机会难得，在阿尔诺夫家总是一个佣人的地位，生活也枯燥乏味，时间一长，就一辈子当佣人了。我很无奈地搬出了阿尔诺夫家。



为美国富人家负责中餐派对。领带、围裙是必须的。
(1987—1990)



在阿尔诺夫家中，唐彼得既是厨师又是派对服务生。

从动荡到稳定

离开阿尔诺夫家，我在一个平民区贷款买了一栋很小的房子作为我们的家，但冬天的密州几乎天天有风雪，路面结冰，每天来回辛苦且危险，我在广告上看见海湾市有一个有多余房间出租的户主，我就把它租下了，天冷不便就住在海湾市。房东是个 30 多岁、单身白种女人，她常有男朋友来住宿，每当她的男友来时，我只好紧闭在自己的小房间中。不过小城也有它的优越性，宁静、友好、纯朴，所以我太太放了暑假就带着女儿一起过来。平时下班后，特别是周末，我们推着婴儿车，沿街散步，看看减价衣服、用品，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逛自售旧货摊（yard sale）。小城居民保留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小商品，价钱犹如白送你一样。可是好景不长，这家德国公司也受到美国经济萧条的影响，无法继续维持，我在这里上班将近一年的时候，关门迁回德国去了，我不得不回到底特律的小屋中，准备寻找新的工作。这时阿尔诺夫家已经找到一对英国夫妇为他家打工，住进我原先住的两房一厅中了。由于经济萧条，我有近两年时间不断变换临时工作。

在阿尔诺夫家做清洁的两个波兰妇女，他们的丈夫都是以开出租车为业的，一个原来在波兰当律师，另一个原来是工厂技师，都是因亲属关系移民到美国，几次聚会和我很谈得来，因为我们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知识分子，现在又都在做工，他们建议我去当出租车司机。美国人家中都有汽车，市区还有公共汽车，我担心没人坐出租车，接不到客人。其实不

然，一开始我试了几天，反正汽车是租出租公司的，每天付租金就是了，他们告诉我一些招揽客人的诀窍，和等待客人的几个最好的地方。我考了出租车驾驶执照就正式上路了。我总共干了半年多，因那时失业人多，专开出租车的人也多，时常入不敷出，才停下了。这期间也有难忘的经历。

底特律市区居民以黑人为主，贫穷黑人聚居于市区周围，有些黑人所以贫穷是因为生活没有计划，有钱就花，不顾往后的日子。很多贫穷黑人是没有汽车的，这些无车阶级要外出就要坐出租车，出租车的主要顾客就是这种黑人。

我开出租车没过几周，一个 30 岁左右的黑人，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夹着一个公文包，要我送他回家，也就是 20 分钟的路程。他上车后，看我是中国人，就和我聊中国的情况，问长问短，似乎很有兴趣，我也肃然起敬，因为黑人中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不多，何况他西装笔挺，像个成功生意人。一会儿开到他所指的一个住家门口，他指着那栋房说：

“我身边没有现金，请等一下，我进门拿现金付你。”

他推开车门，大步快速走过房前的大草坪，将近门口时，突然飞跑起来，从这房子边的夹弄中窜出去了，我坐在驾驶座上看着，见他飞跑而去，意识到他要赖账逃跑，但为时已晚，我开门想追上去时，他已经跑到第二排房屋边，很快消失了。车费最多也只有廿元，穿西装、系领带的客人也会做出这种不屑之举，让我十分惊讶，当然只好自认倒霉。后来同行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追，追急了说不定他会给你一枪，或给你一刀，白白送命。

还有一次，在一条繁忙的街上，一个 20 多岁的黑人青年，手上拿着一件皮夹克和一个皮鞋盒子，叫我开到五、六里外的一个商场去，生意来了我当然礼貌地开门让座，到了下车地

点，我先下车为他开门并要车费，也不过十余元车资，计费表上都有显示，但他一下车就说：

“我没有钱付你！”

我一听就火了，责问他：

“你没有钱为何要车？我可以白贴劳力，汽油费你总得付！”

他还是说没钱，并把口袋翻给我看。这是在商场门口的热闹区，我的胆子也上来了，拉住他不让他走。正在互相推桑时，突然边上一个警察现身了，警察见到我俩推桑，又看见我的出租车牌，就过来问什么事，我把经过说了一下，那黑小子自知理亏，一再说：

“我没带钱，没钱可付。”

“你没钱为什么叫车？”警察训他。

黑人不说话，警察看见他手上拿着皮夹克和皮鞋盒，“这是什么？”警察问黑人。

“这是我的皮夹克和在前面店里买的鞋。”黑小子回答，并把买鞋的发票递给警察看。

警察把鞋盒打开，是一双年轻人热衷的高腰皮鞋，大约要50~60美元。我想警察对这种事见得多了，肯定处理有数，我只在一旁看着。随即这警察把这双鞋放回了鞋盒，转身就递给了我。

“这归你了，抵你的车费。”警察对我说，同时把那件夹克也拿过来，“这一件旧衣服也归你了。”

说完警察就叫我开车先走。我倒有些犹豫和不好意思，因车费也只十余元，这太多了。警察看出我的意思，用手推我快走，我估计是他不要那黑小子再来纠缠于我。我只好跨进车里，把鞋和皮衣扔在旁坐，慢慢开离停车场。约开出20多米时

我回头再看，这警案还在对这黑小子训话呢！我迅即踩下油门快速离开了那里。

简直是电影情节！其实我和那黑小子推搡时，只是凭着一腔怒气，心中也忽上忽下，没了主意，不知道这年轻黑人会怎样对付我，另外出租车生意也很差，一天最多挣几十元钱，也就豁出去了。一直到开出几里路后，我才平静下来，才有了安全感。回家一看这双鞋太小，我穿不了，夹克衫已很脏，上有花纹图案，是年轻人穿的，我已是老人，穿上它就怪模怪样了，最后这两件东西，在后来搬家时，Yard sale 卖掉了，皮鞋 10 元，夹克 5 元，正好抵消了那次车费，不赔不赚。我想起那黑小子可能经常出此招式，免费乘车，而这一次是赔大了。上帝是公正的，这黑小子贪心，想拣便宜，受到了惩罚，赔了不少钱。而我付出了的劳力仍然得到了相等的报偿，没有让我得过多的外快。这确是奇异恩典的事。

由于出租车生意很差，还常听说出租车司机被抢、被杀，所以我开了半年左右就洗手不干了。

这段时间我还做过一些其他工作。如大俱乐部的晚餐服务生，穿戴西装、领结、黑皮鞋，准备饮料、上菜、端盘，最后清洁打扫，当然免费供应晚餐，常到半夜才结束，拿的是最低计时工资；还应聘做过医疗中心的推车工，因为不少私人诊所和小诊所没有自己的设备，比如做心电图的仪器，他们和医疗中心约定一周或一月若干次，由医疗中心派出化验师随同设备到各诊所去巡回诊断，我负责把设备装到专门的车上，然后把化验师和设备送达各个诊所，属临时合同工，拿最低工资。

在这过程中接触到不少中、下层人士，真正了解了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情趣和人生，也结交了一些美国朋友，不算一无收获。我离开阿尔诺夫家后，每年圣诞节前，阿尔诺夫夫妇都

会从佛罗里达州用特快邮件寄给我两箱树上刚摘下的桔子、柚子，一直寄了十年，这样的情谊使我至今依然保持着甜蜜的回忆。

我还到一个同性恋的老头家做了一段时间管家，对美国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这老头叫朴玛特(Pulmater)，一个 60 多岁的白人，一个艺术品和室内装饰公司的老板，很有钱，三名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多年前和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和自己公司的一位叫丹尼尔(Daniel)的男性室内装饰家同居，丹尼尔 50 岁左右，长得俊秀漂亮，我在中国劳改营中和不少同性恋的龙阳君们打过多年交道，所以我一看丹尼尔的许多女性动作，就知道了这种关系，他们没有对我明言，我则心照不宣。他们住一套很高级的公寓(Condo)，即两、三套房子建在一起的联体别墅，中间的墙共用，每套房子有自己的门户、庭园，朴玛特和他原来的太太一直保持电话来往，子女生日他也前去祝贺，晚上则抱着“现夫人”丹尼尔，倒也相安无事。

我负责每天的室内清洁，有时开车送他们去机场或谈生意的地方，也偶然做一些晚饭，晚上自己回家睡觉。有两件事让我深有感触、一直记忆在心。当时我女儿才 3 岁多，我太太晚上经常要上课进修，以取得教师执照。一天，朴玛特要我晚上去他家烫衣服和领带，以便他第二天早晨远出，我只好带了女儿一起去，好几箱衣服我足足烫了近三个小时，女儿晚上通常很早就上床睡觉，现在在这很小的洗衣房里，无处可玩，无物可看，一会儿就困了，哭着要回家，我怎么哄她也不行，使我心里很烦，一狠心把她关到了漆黑一团的汽车房里，我还威胁她说，再哭就一直呆在那里，不哭了就带回洗衣房。但不到十分钟，她又忍耐不住，哭着要回家，我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能走，只得再送她进汽车房，见她害怕的眼神，我心中很不忍，

女儿太小，不知生活的艰辛，用黑暗的车房来恐吓她，会在小孩的心灵上烙下阴影，好不容易干完一切，已是十点多钟，觉得很对不起小小的女儿，心中掠过阵阵悲凉。今天她已是一个高中学生，有时贪玩，有时要买时髦衣物，但我一想到过去关她进汽车房的情景，就马上感到愧疚，感到对她有亏欠，明知不该也就迁就她了。过去看到狱中朋友思念他们的子女，有的人逃到国外，总想尽快把子女带出来，我理解不了，现在我才体会到骨肉情深的含意。

夏天到了，朴玛特和我商量，他要在棕榈海滩（Palm Beach）开一个大派对，棕榈海滩是佛州海边一个著名的度假城市，他在那里有一套别墅，当时我太太正逢暑假，我女儿已去中国姥姥家，所以他希望我和太太都去那里做派对的服务人员。朴玛特是很会算计的人，他要我自己开车去，贴我 450 美元，如果坐飞机去，我和太太两人光机票就要 600 多美元，他说这是双方有利的事，他省下一些，我则赚一些。我想也行，辛苦些，赚一点外快。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一个同性恋派对，近 40 人，各地来的都有，大多是男同性恋，也有两对女同性恋，倒是各有所好，互不干扰。他的别墅很大，光是房间就有十余间，再加上客厅、饭厅、电视室等足够容纳这么多人，我和太太则被安排住到一单身邻居家中，临时租了一个睡房。扮演女性的男同性恋者都涂脂抹粉，身穿性感女服，与男伴一对一对饮酒、唱歌、游泳、跳舞，一连热闹了三天。我是提前两天到的，做清洁、安排、布置的工作，事后又是清洁，物归原位，多住了两天才开车回底特律。朴玛特告诉我，他每年开一次，来的人中还有很多名流、歌星。每天闹得乌烟瘴气，但没有警察来干扰。我见识到了美国社会中那些畸形的高档人物，后来听到有些名人，甚至是牧师、主教，做出猥亵男女幼童的

荒诞罪行，就见怪不怪了。

自 87 年来美进入学校半工半读，一直到 94 年中，进入现今服务的汽车行业才稳定下来。有 7 年多时间在艰苦中奋斗，打工大多是单纯的劳力活，苦闷和压力是难免的，但外在的大环境，使人感到自由，不管什么工作，总能维持生活，吃住不会有大的压力，由于我在劳改营的多年磨炼，这里的劳力活，不过是小菜一碟，美国人叫做 *piece of cake*（一块蛋糕），开头两年我挣的钱全交了学费，毕业后虽然挣得少了，反而有了积余。在替阿尔诺夫打工时，阿尔诺夫夫人几次对我说：

“彼得，不要灰心，在美国只要肯干，就会有机会，你的知识迟早会用上。”

她介绍说，她的祖父早年从俄国经过欧洲再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无亲无故，以拣垃圾为生，以后逐渐积蓄了一点钱，买了一辆卡车做运输，家中仍很穷。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发展成一家运输公司，成了中产阶级，能供她读大学了。她又说阿尔诺夫先生只有高中毕业程度，年青时去朝鲜战场只是一名士兵，回来后赤手空拳，先做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多年以后改做房地产经纪人，至今成了地产商，已是千万富翁，出入外州都有自备飞机，可以说够富了，但他仍要自己的子女独立生活，读大学起就住到外面去，大学毕业后也要求他们自己去找工作，以经受锻炼，取得生活、工作的经验。他的发家史也正是早年美国移民的一个缩影。

我一直受到这个榜样的鼓舞，多年来没有任何后悔，工作之余常出外旅游，开阔人生的眼界，直到后来我进入汽车公司当了一名经理，至此工作压力就释然了，八小时以外没有任何政治压力、工作压力，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安排业余生活。虽然时常回国探亲，也看到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每次回国几天

后，就惦记着底特律的家园，另外国内的居住环境噪音很大，政治限制依然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办事都要凭关系，实在不能适应了。而且我回国时，即使住进星级饭店，也是恶梦不断，早晨醒来往往搞不清在哪里，是在劳改场所还是在美国家中，这种后遗症也促使我很早就入籍成了美国公民，我入美国籍别无它求，只想为自己增加一把保护伞，不再无缘无故地送进“改造”场所。有时想想很心酸，我是一个中国人，自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摸着泥巴、花草长大，亲朋好友、铁哥儿们都在那里，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割不断的情。在美国，吃的是中国菜，看的是中国电视，唱的是中国的卡拉 ok，每周要去中国店多次，联系密切、经常接触聚会的也都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是一个中国人，躯体中始终跳动着一颗中国心，这个中国情是难以磨灭的，美国公民不过是一个浅淡的标记而已。有时在家中也情有独钟地跟着卡拉 Ok 机唱着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唱着唱着眼睛就湿润了，但我已经很久没有滚滚而流的眼泪了，我父母过世都没有流出眼泪，记得一次我女儿问我：

“爸爸，怎么从来没有看见你流出过眼泪？”

“爸爸的眼泪早在你出世前就流干了，”我苦笑着说，“你没见爸爸每天要滴人工泪液放进眼中吗！”



第一辆锈渍斑斑的自备车。



1991 年取得学位找到工作。



2003 年秋冬在居所门口。



在家中。

第四章 尾声

宋光汉案的终结

21 世纪之初我回上海探亲，静安寺附近面貌全新，不久前落成的久百城市广场，造型别致，宽敞亮丽，静安寺庙收回了原先的房产，扩大重建一新，整个地块上的居民几乎悉数迁移，只有常德公寓还在，据说张爱玲原先居住于此，原名爱丁顿公寓。顺着南京西路望东走去，一路耸立着豪华商厦和酒店，恒隆广场、中信泰富广场、梅龙镇广场、波特曼大酒店、上海展览馆、锦仓文华大酒店等等，顺着华山路走去，有上海宾馆、希儿顿宾馆、贵都大酒店等。我家的老宅居然在夹缝中偷生，但也几次议及拆迁了。

回到上海自然要和老友们聚聚，在久百广场的楼上，要了一间包房。

“宋光汉现在怎样了？”大家记挂起当年遭灾的首犯。

“宋光汉被判十年徒刑，在北大荒服刑，期满后，留场继续改造。当时他姊姊正下放河北农村医疗队，她给宋在当地农村‘买’了一个廿多岁的小姑娘作老婆。河北农村非常苦，不少女孩争着要嫁给这个未见过面的劳改留用分子，因为结婚后户口可以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每月有 30 斤商品粮可买来吃。宋姊姊代他挑了一个身体健壮，家境特穷困的姑娘，说这样的人能吃苦，不易后悔。宋在北大荒一直呆到 1979 年，之后作为错案改正，回到北京工业大学任教，这时宋已有了一个儿子，一家三人随宋一起迁入北京。后来宋在科研和学术上都作出不少成绩，并有一些杰出著作，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一

员。1988年他到南京开会，在开完会议乘火车回北京时，心脏病突发，死于车上。他过世后，由于他成绩突出，创新颇多，《光明日报》以头版整版报道他的优秀事迹，当然北大荒服刑十余年的情节被‘合理删去’，一笔带过。”

“他的病根也是在北大荒劳改时过度劳累、饥饿而种下的，要是没有十几年的劳改生涯他还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从中学到大学有好些学业优异、才华出众的同学，不幸遭到残酷镇压，打入另类，多少人才与智慧被糟蹋了！”

“薛德镛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在座的只有我最清楚薛德镛的传奇故事了，我讲述了薛被革除军籍，调往北京六铺炕煤矿，文革中挂牌吃饭，以及我到总政申诉与他碰头等情节后，又说：

“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我和薛会见后不久，薛就以犯“严重错误”的身份下放到河南一煤矿，安排在井下操作。他的身体一直很瘦弱，两个月后肺部大出血，随后调到地面做些较轻松的劳动。他说，煤矿三天两头有井塌伤亡事故，幸好上天保佑让他大出血，从而因祸得福，调到井上工作，否则早已埋在井下了。

有一年他回上海探亲，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女朋友，山东人，是康生的近亲，这位姑娘一定要找上海出生的男朋友，认为上海人漂亮、细心、会照顾女人。当时她恰好到上海旅游，连带物色男友。一见面，薛居然就把她吸引住了，她坚决要嫁给薛，康生家族当然势力很大，派人到薛的煤矿调查，结论是：该人非党非团，还有严重政治错误，接近的朋友、同学非劳改即劳教，还有很多右派分子。女方父母和家族大吃一惊，一致坚决反对，要这姑娘断绝和薛的关系，谁知这位党员姑娘信奉爱情至上，不再有阶级斗争观念，自己一人跑到河南去找

薛同学了，而且对家里发誓非薛不嫁。那时薛也私下和一些朋友商量过，还征求过我的意见。薛说：

‘我是无所谓，但如此真挚的爱情，我深为感动。她家中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反正我就是这么个身份，我不主动去她家求婚和商讨就是了。’

我一再鼓动他尽快结婚，让生米煮成熟饭，看他康大人如何办。其实我也存有私心，薛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同学之一，他要是和张家小姐结婚，他的政治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我等也许可以沾点光。

张家思量多时，还是以女儿为重，其实，反革命帽子都是人为制造的，档案也是由人抄写和编排的。

一天早晨，煤矿干部处通知他，调他到青岛某一海军直属研究机关，对方的调令已到，让他一周后即去青岛报到。青岛正是这位张小姐的父母与家庭所在。薛大吃一惊，百思不解，他有严重政治错误，是不允许从事与军事技术有关的工作的，是被部队强制调往煤矿工作、劳动的，怎么可能又回到如此保密的海军科研机关？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后来这位薛太太向他透露，青岛海军科研所听说是张家的女婿，就说：

‘你们家的人还用问吗，先开调令，赶快把人调来，调档手续等人来了后再办好了。’

后薛的档案由他们家族派人去调来，档案在他岳家还不容易清理和编辑吗？当然是清清白白的，谁也不会来了解和探察个究竟。薛就这样一夜之间由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摇身一变成成为中央首长家属的乘龙快婿，这使我想到了四川的变脸戏。”

大家都说薛交了好运，命中注定有福分。我又补充说：

“我在 79 年得到原部队平反改正时，也告知以前档案中的

诬陷不实之词已全部撤下销毁，只是薛比我幸运，早了好几年，而且是自己的岳家给他做的，比我部队落实办的人说的更能信得过，清理得更干净。”

“康生后来被打倒了，对我们的幸运者有影响吗？”

“当然，张家也不那么显赫了，”我回答说，“总算没有株连九族，只是大官变小官而已。我的这位薛同学才智很高，又一直搞技术工作，所以仍然做他的科研，他一再对我说：政治没搞头，我是看多了。”

“我们年级有一位姓陈的女同学你们记得吗，长得很漂亮，在我们年级中数一数二。”一位交大的同学关于档案有故事要讲。

“当然记得，有什么故事？”

“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位高年级留校的教师陆××看上了她，陆还是系党支部组织委员，陆查看了陈的档案，发现陈的哥哥在台湾，还是原回乡团成员，还有一叔父是台湾国民党的高官，陈有这样的社会关系，陆知道党组织不会批准他和陈结婚，于是采用了狸猫换太子的办法，利用他管理学生档案的职权，把陈的这两个亲属的材料塞进了另一个姓陈的男学生的档案袋中，还加上了组织审查意见之类。不久陆就和陈结婚了，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位男学生后来则倒了大霉，毕业时他分配到南方一大学当教师，一开始教专业课，不久因查出社会关系复杂，调到基础课程教研室当一般教师，文革中又说他为国民党派遣特务的嫌疑，下放监督劳动，他家中父母、兄弟都因隐瞒反革命特务的社会关系，有特嫌背景，受到批斗、抄家，发配监督劳动。这位姓陈的男同学在下放劳动时，遇到该校组织部的一位党员，他也挨整，在一起劳动，同在患难之中，这党员问起陈同学的海外关系，陈感到莫名其妙，坚称自己没有

任何海外关系，何来国民党党员、回乡团、高官一说，当即要求去申诉，请求调查。但那时正处于阶级斗争高潮，反革命要翻案，只有罪加一等，也无人为你立案调查。后来该党员得到落实政策，回到校组织部，陈同学也因自身没有问题，回校上课了。这时，该党员告诉陈，可以写申诉书给组织部，由他去陈原来读书的交大联系调查。最后查出，是错把陈姓女同学的档案放进了陈姓男同学的档案袋中，至于怎么搞错的，当事人心照不宣，只把大事化小事，告诉陈姓男同学，十余年前的案子已无法查清，按一笔糊涂账了结了。十多年来陈姓男同学和他的家庭遭受那么多的折磨，仅为档案袋中一张来历不明的小纸片，没有人问问它的来龙去脉，本人还蒙在鼓里，真是可悲！”

“共产党从来就不奉行西方的人生来平等的思想，等级的划分名目繁多，地主、工商地主、资本家、小业主、工人、农民，农民中又有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还有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变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这些分子之外，也要划分出可靠等级。这种标签放进你的档案袋中，一辈子跟着你转。记得北大右派言论中有一张标题为‘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就描述了这种现象，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发展成为人种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还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场合都要划分等级，左、中、右，积极、中游、落后，依靠对象、争取对象、打击对象。就是劳改场所也要划分等级，带坏分子帽的属人民内部矛盾，带反革命帽的属敌我矛盾。共产党对等级的划分真是情有独钟。”

有人提起了金旭升，“谁知道金旭升的下落，他原来只受到留职察看的处分，不是被老唐的保卫科长跑到他们单位去搅

得重判成劳教吗？”

一位知情人说：

“他判了劳动教养三年，65年他到了北京所属的茶淀农场，在河北的塘沽和山海关之间，期满后在那里留用。后来中苏交恶，珍宝岛战役打响，发下了林彪的一号通令，要把东北一带的劳改和劳改留用人员尽量迁往内地，以防这些人在中苏交战中捣乱或充当奸细。大概72年前后，金旭升就随着其他留用人员一起迁到山西运城的劳改单位继续改造。还在茶淀农场时，他和一个姓马的留用女职工结婚了，据他说结婚是为了分到一间小屋，免得天天住在30多人的大草屋中，天天吃留用员工的食堂，有了一个小家，少受一点罪。79年受到落实政策的鼓动，他多次跑到北京的原单位去申诉，才得到改正，但他已结婚生子，他太太马女士还是留用员工身份，无法办回北京，所以只得在运城居住，好在全家离开了劳改单位。他是在航院学发动机的，对发动机有些专业知识，就开了一家专售发动机零件的小店，也算维持了一个简单的生活。他有次回上海探亲时说，运城毕竟是内地小城，他的小店常是门可罗雀，生活很艰苦，但与当地农村人相比，与劳教留用人员相比，他也知足了。”

“老唐，你们的保卫科长，是叫程肖松吧，他在自己单位整人还不够，硬要跑到金升旭的单位去把金升旭打入地狱，真够狠的。”

“还不是为了高升，他后来就提拔为中校，调到西安军医大学当保卫处长了。”当然我是最了解的。

“乔兄，你是怎样卷进宋光汉一案的呢，几十年来情况还好吗？”

“其实我和宋光汉根本不熟悉，只是朋友聚会时偶尔碰

到。”乔兄自我介绍。“宋光汉的父母早亡，一个姐姐在北京当医师，在上海的近亲只有一个年老的姑妈，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也大多在外地工作。当他要到广州去的时候，就要我发一份电报给他，说‘姑妈病重速返’，这份电报是他用来向学校请假的，我以为他要来上海看望姑妈或办些什么事，谁知他请了假就跑到广州去打探偷渡香港的路线。我是社会青年，是街道、派出所‘关照’的对象，这份六个字的电报就成了宋光汉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公安局把我拘留审讯了 30 余天。当时我已找到一份工作，等我放出来，公安局发函到我单位不许他们雇佣我，我又有好几年成了失业的社会青年。1968 年，文革中我又被上海公安局毫无理由地抓了进去，说我是宋光汉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上海地区骨干，剃了光头，坐牢 8 个半月。这 8 个半月不许通信，不许家属接见，后因查不出犯罪事实，于 69 年中释放，释放时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文件。我一直在家呆了整整 20 多年，找不到工作，由老父母养着。79 年宋光汉案改正，我得到北京法院的抄送件，找到上海公安局，答复说，此案不是我们经手的，找我们没用。我说，你们关我 8 个半月，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公安局的人说，错关的人那么多，已经放你出去了，你还罗嗦什么。这时政策宽松一些，我在一个中学食堂找到一个临时工的位置，管记账、卖饭票，这所学校中专毕业的教师很多，有的只有高中程度，有的还无学历，我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只能在食堂卖饭票，还是临时工，没有任何福利和劳动保障。就这样又混过十年，之后总算政策放宽，转为正式食堂工人。”

“我和宋光汉只是很淡的朋友关系，他要我帮忙发电报请假，我又不知道他要偷渡去香港，只是尽了朋友的义务，然而这六个字的电报改变了我的一生，毁灭了我的一生，大半辈子

都在精神紧张、生活落泊的景况下苦熬，现在虽已退休，但退休工资微薄，连贫贱的生活也安排不过来。”

我们都为乔兄叹息，这不仅是乔兄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老友们都是 60 多近 70 的人了，最终归宿虽各不相同，但坎坷的经历都是一样的，为了宋光汉一案都吃尽了苦头。宋光汉不就是想到香港去吗，今天党政高官的子女几乎人人迈出国门，多少人拿了绿卡，入了外国籍，同一件事，几十年前要杀头坐牢，今天却成了共产党人的时髦追求。我们只好叹生不逢时，时运不济。时势变化之大正如这静安寺地块的变迁，老居民回到这里已经不认识路了。

回 归

除了回上海探亲之外，近年来我因工作需要，也到过北京、青岛、天津、大连、武汉等地，会见了很多老同学，有交大的、航院的，还有中学的，既有当年的右派也有当年的左派，也会见了很多难友，我离开处处要讲主义的中国已经二十年了，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机会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修正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对于主义只留有出国前的那些印象，在国外不需要主义，因而这方面很少有所长进，倒是同学们的言谈使我大为惊奇，大长见识。有一次聚会时，一位口才很好、嗓音宏亮、当年还是比较左倾的同学不无幽默地向我们讲述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也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后，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人类的天堂，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消除了阶级的社会，一个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所有的财产归全人类所有，产品各取所需，所有的人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人们不再将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他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唤起了那些耳熟能详的词句。

“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不过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正像我们盼望一个大同世界一样，虽然冠以科学的美名，其实不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少空想。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一切的关键，那么实行公有制以后，大大小小的生产单位谁来经营和管理？恩格斯说：

‘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首先，计划能够涵盖千姿百态的经济活动吗？需要生产多少布，多少鞋，多少电，……，能一一计算出来吗？事实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写了厚厚三本书，中国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没有做出一个正式的计划，砍掉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人为地编造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只是文人的空想，以为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就不会有生产过剩，不会有经济危机，空想的美景总被现实的严酷所击破，事实上这样完美的计划是做不出来的，计划造成的失误、混乱和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即使计划制订出来了，这样的计划必然压制了个人的能动性和智慧，‘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不是我们听惯了的口号吗，每个人都成了完成计划的工具，不允许存在任何个人意愿，怎能各尽所能？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发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并不能激发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并不能走向富裕的道路，最终放弃了这个付出了沉重代价的试验，回归私有制，回归市场经济。”

“有一位高级首长曾经说过，‘我们选错了主义！’”一位同学插嘴说。

“无论社会财富如何丰富，各取所需也是不可能的，新产品层出不穷，一个新产品刚出现时，总是稀少的，电视机刚出现时，人人都能得到吗？现在又有了遨游太空的事，又有几个

人能上到太空？”另一位插嘴说。

“更严重的情况是公有制导致国家的专制体制，看看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吧，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通过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取得的，革命成功之后，这个党就具有了绝对的权威，资本家的管理经营权被剥夺后，自然转移到共产党的手中，共产党用专制统治来推行共产主义，一个官僚体制建立起来，一切社会财富集中在独裁者和官僚阶级手中，全社会共同经营变成这个官僚集团的发号施令。独裁体制强化到史无前例的高度，阶级斗争成为贯彻恐怖统治的手段，个人崇拜应运而生。”

话题转到中国的国情：

“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起先也附和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但没过几年，中国的个人崇拜就远远超过了老大哥，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忠字舞，把一个文明社会拉回到愚昧的中世纪。毛泽东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把苏联的专制统治和他创造的群众运动、思想改造相结合，建立了一个超过苏联的专制体制，由延安整风开创的思想改造的群众运动贯穿了他的整个统治思想，他要把全国人民改造成为服从他一个人的驯服工具，这种群众运动让人们互相监督，不要说行动，就是稍有越轨的思想就被打成反革命，残酷镇压。”

有人补充说：

“中国的恐怖统治比斯大林更胜一筹的就是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让群众斗群众，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这样事情办起来简单得多，什么公、检、法都不需要，起先斗地主，然后是资本家，知识分子、胡风、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最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过

三五年要来一次，就是过三五年就要划出一批人，运动群众斗起来，以维持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的恐怖气氛。”

“阶级斗争伴以改造人的响亮口号，一直在叫喊思想改造、劳动改造。把判徒刑叫做劳动改造，倒是一个好听的名词，可惜名不副实，叫做劳动惩罚，还缺少一点内涵，劳动改造除了惩罚之外，还有洗脑的内容，繁重的苦役固然艰难，而洗脑更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人是可以通过劳动改造好的，劳改、劳教名义上就是要用劳动把人改造成为新人，难道用强迫的手段进行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毛泽东自己也不信，否则劳改、劳教犯们不就可以回归社会？事实上，劳改、劳教期满之后，一律原地留用继续改造，一旦进入劳改场所，就是终生监禁，就是事实上的无期徒刑，劳动改造的实质就是把这些人圈起来，给以最低的生活条件，惩罚他们进行繁重劳动，劳动之余逼迫进行学习，让他们互相揭发、批斗，使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闲，时时刻刻生活在极度疲劳和诚惶诚恐的状态之下，这些被圈起来的人，与世隔绝，他们的肉体 and 思想逐步衰退，逐渐成为行尸走肉，没有思想、麻木迟钝、毫无抵抗斗争力的所谓新人，直到油干灯灭。劳动改造确是一箭三雕，既榨取了人最大的剩余价值；又把这些对党不满的人圈了起来、与社会隔绝；又大大吓唬了老百姓，造成阶级斗争的恐怖气氛。社会上一般人也要进行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要下放到农村工厂去锻炼。而工人农民也要思想改造，每天劳动之余就是大会、小会，学习、汇报。民间流传‘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劳改场所固然已经没有任何个人支配的时间，一般老百姓也没有多少个人支配的时间，工作之余也有报告、学习、讨论、批斗，人人学会一套流利的八股，‘形势大好，不是小

好，是大好。’ ‘党中央的决策英明、伟大，太及时了，是前进的里程碑。’ ‘党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坚决拥护党中央。’ 延安整风的那一套，写思想检查，把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开坦白大会，开改造思想会议，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不断的刑讯和受审，贯彻于全社会，直至文化大革命发挥到极致，旨在把一切民众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多少资源在开会、讨论、批斗和简单劳动中消耗掉了，不要说许多有才华的人被革职、被查办，被处决，就是一般老百姓，又消耗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在经济建设中运用这种统治方式却遭受到了重大失败。毛的科学技术知识是贫乏的，但他不乏幻想，他要创造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思想，走一条反常规的路，一步登天，创造一个奇迹。于是像阶级斗争一样，祭出群众运动这个法宝，一时间土高炉在田野间、机关里、校园中如雨后春笋般地竖立起来，全民炼钢，土法上马。粮食也要大跃进，全国农村大搞深翻地，虚报的产量一节高过一节。当然炼出的都是废铁，粮食空前紧张，饥荒蔓延，哀鸿遍野。毛的幻想破灭了，然而他是从来不认错的，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问题，资源浪费极大，几千万人饿死，不过是他的一个不成功的试验，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被打入地牢，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至死。”

“毛最讨厌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把他们叫做臭老九。文化艺术被严格控制，只能服从于政治的目的，只有歌功颂德的歌德派才能生存。科学技术他不懂，以为科学技术也能搞群众运动，让一年级的大学去搞科学攻关，自编教材，批判教授。甚至天真地发起打麻雀运动，不论工人、农民、教师、政府工作人员，在同一个时间，大家都要拿起锣鼓、脸盆、罐

头，敲打起来赶麻雀。能把人愚弄到这样的程度是一大奇迹。”

“这个改造人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就是摧毁人的意志，把有思想的人变成一个工具，让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这种改造人的工作从来没有达到提倡者所宣扬的境界，极端的集体主义在本质上是违背人性的，而领袖本身也没有做出这种集体主义的榜样，狂妄自大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社会最‘先进’的群体，共产党高官的子女今天不都成了大老板或外国侨民。老百姓成天斗私批修，时刻背诵老三篇，也并没有成为具有高尚理想、大公无私的人，而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眼看争斗之风愈演愈烈，上面争大权，下面夺小权，自私自利之心变本加厉，道德观念全面沉落，纯朴民风一扫而空。”

一次有人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

“在很多方面，西方和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大不相同。共产党认为不能作战俘，战俘是叛徒，战俘活着回来没有好日子。西方认为首要的是保存生命，无法战胜允许投降，二战中温莱特中将保全 3 万美军的生命，率部向日军投降，1945 年日本投降，温莱特将军仍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麦克阿瑟专门派飞机把他接到日本签字投降的现场，参加签字仪式。西方人遇到歹徒认为首先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共产党认为即使弱不敌强也要奋力搏斗，丢了性命才是英雄。起先还有德智体美的要求，后来美不见了，美是资产阶级的追求，于是只能穿灰色中山装或黄色军装，其它都是奇装异服，建筑物也都是灰色火柴盒，连摆弄花鸟也是资产阶级思想，中国成了一个没有色彩的国度，今天我们却又回归到‘资产阶级’的审美观。”

我陷入沉思之中。

生活安定后，我有幸可自由地到愿意去的世界各地去走

走、看看，我不必担心护照签证，也不用担心有人监视或噤声。我到了欧洲、澳洲不少国家常常浸润在人们的自由、欢乐之中，常会情不自禁地加入他们的跳舞、欢唱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猜疑、防范，只有相互的祝福、问候。更吸引我的则是去到现时或当年的共产主义国家，我非常想知道这些曾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阶级兄弟现状如何？人们生活如何？几年前我到了古巴，这个“同志加兄弟”的、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似乎回到了 60 年代中国所谓火红的年代。街上行驶的都是挤满了人的无棚卡车，很少见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许多商店、建筑物外墙上也是挂着不少标语条幅。每当我们这些外来客停车或下车时不少人围上来，想要一小块肥皂或一点零钱，起先我以为没听懂，肥皂怎与旅游客挂上钩？后来到商店才知道货架上的贫乏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连洗衣的肥皂也要凭票供应、且常常断货。如此一个小国，背后有中、苏大国的无私、兄弟般的援助，几十年的“建设”，竟会到这一地步！许多古巴人为逃离这个苦境千方百计，冒死乘小船渡过加勒比海去到美国的迈阿密。每年有多少人葬身海底或被古巴巡警击毙！

去年我到了苏联、波兰和德国，看看这些原是正宗的共产主义国家，更是感触良深！苏联集权制度虽已经解体，但它的后遗症则不是短期可以得根治的。物质的贫乏、欠缺到处可见。马路边上等着施钱的，请你帮忙给些零钱的老太、老头也比比皆是。给我难忘的印象则是沙皇年代金碧辉煌的宫殿城堡和社会主义制度下造福人民的千篇一律的鸽笼式宿舍大楼，还有就是遍布各地的灰暗色调，不仅建筑物、街市上，就连人们的衣着、车辆也是以灰暗色为主。

给我触动最大的则是柏林墙，这是原东德共产党的“举世杰作”，这是世上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专门防止和对付自己

本国老百姓外逃而设的有约 3 米高、100 多公里的长墙，它依河而筑，即使有人侥幸能躲过军警枪击、翻越高墙，宽深的河流也会是第二道葬身之地。历史上无论是中国的长城，古罗马的城堡和中外的古城墙无一不是筑来以抵御外患的，唯独这柏林墙是东德共产党对付自己劳工人民的创举，而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代表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党。

柏林墙建立 20 余年来有 800 多人在越墙时被枪杀，有 7 万多名东德人民因企图逃亡而被判刑坐牢，虽柏林墙在东德政体解体时已被推倒，但仍留有多处断墙来给德国人民凭吊。在我凝视着这些断墙时，似乎看到了墙上的无数冤魂与斑斑血渍！

从小我就听熟了的赞美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但我年轻时就在自问：社会主义这么好，为何那么多人想越境去香港？那么多古巴人要冒死渡海去美国？又是那么多东德人民拼死去攀越柏林墙？东欧的人民又是千方百计逃离家乡、宁愿去西欧当苦力？为何南北朝朝鲜仅三八线相隔，但成群成堆的北朝鲜人不惜绕道千里，冒着被枪击和抓回去送集中营的危险要往南韩跑？社会主义国家这么好，为何未见香港人偷渡去内地？为何未有西欧人、西柏林人越墙去东德？更未听说有美国人或古巴裔人渡海去古巴？！逃亡潮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各地，犹如一单向闸门，未见有逆向而来的。这是为什么？

劳改场所有一句口头禅：“我惹不起你，我总可躲得起吧！”但这也是没门！想离开国境，就是叛国投敌。不论古巴、东德、朝鲜和中国都是同一个标准来处理的，同志加兄弟嘛！我的当年“同案主犯”宋 xx 也仅仅只是想离开中国，并无何政治意图，如此即是十年牢狱再加终身留用。如没有邓小平等高官自身在文革中挨斗挨批，关入五七干校变相牢监，亲身体

了遍地冤狱的中国，再加上自己儿子都被整得跳楼自杀的切肤之痛才有了平反和后来的改革一说。否则宋与我等也早已是劳改坟场里的冤鬼了！

既往不可及，来者犹可追。从近代史来看，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又一个又一个的灾难、战乱，阵痛也是随时升级，到了文革时代达到了顶点，全国人民都处于疯狂的残酷斗争中，从中共的高官到低层的百姓都有了刻骨难忘的教训。我们应该觉醒了。我们的民族终究会在阵痛过后获得新生，我们也能从苏联的模式得到启示。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有惊人的相似。苏联 1917 年革命成功，17 年之后，即自 1934 年开始展开了一场肃反运动，17 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有 70% 遭逮捕和枪决，36 年之后，即 1953 年独裁者斯大林逝世，如果扣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距革命胜利约 30 年不到，钦定接班的马林可夫随即被赫鲁晓夫赶下台，并开始了反斯大林的时代，74 年之后，即 1991 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试验宣告失败。1949 年中国革命成功，也是 17 年之后，即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无数老革命被斗，27 年之后，即 1976 年独裁者毛泽东逝世，钦定接班的华国峰随即下台，进入邓小平时代，取消了毛泽东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了 74 年，扣除二战的六、七年，是 67 年，到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第 67 年，即 2016 年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显然，我们民族还没有升华到一个和平、自由、安详的福地，从疯狂回归理智的过程中，变革还在进行，但愿她不再动荡受苦，但愿她平稳进入一个光明的未来。

2004 年 4 月初稿

2007 年 3 月完稿

后 记

六十多年的苦涩人生总算熬过来了。人生 70 古来稀，这句话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也许不再适用，但对出生在 30 到 40 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该值得庆贺了，本是人生最美好、最辉煌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不少人早早夭折，剩下的胆战心惊、艰难地度了过来，时代在恶梦中回归，而恶梦萦绕在这些人的心中。

中华民族沉沦得太久了，人们渴望振兴，渴望一个新气象，这些年出生的人，一般来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知识启蒙、进入中学学习的，似乎生逢其时，应该和新的国家一起成长，朝气蓬勃地追赶世界进步的步伐，然而我们被引入共产主义的歧途，那里混杂着文人的幻想和独裁者的喜悦，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斗争的浪潮一浪又一浪，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粉碎胡风集团、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有的人在最初的浪潮中已经倒下，有的人躲过了前面的几个浪潮，但终被不断涌来的浪潮击中，有的人正在推波助澜，却不知后面的浪潮已经瞄准他而袭来，那些幸免于难的人，眼看着同类卷入深渊而惶惶不可终日，连毛泽东本人也在害怕被亲密战友暗杀的恐惧中沉沦了。难道中华民族的新生必须经历如此痛苦的阵痛？

我正好出生于这么一个时代，共和国成立那年我刚进入初中读书，目睹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残酷景象，又一贯受到家庭的

教育，因此从少年时代起，就不想参与政治，不想做官从政，但求学得一门技能，凭自己的能力从事一个合适的工作，过安定的生活，做人更是处处小心、逆来顺受。然而当我 17 岁迈进大学学府后，精神状态日趋紧张，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我侥幸地从政治气氛特别严峻的航空学院逃离出来，转入早已向往的交大，谁知好梦不长，又到了反右高潮，每天批判会、斗争会不停，才 18、9 岁的学生被划成右派，一个一个被揪出来。我虽未被点中，但每日都处在战战兢兢、心惊肉跳的精神状态之下，时时担心下一个批斗对象会否是自己！好不容易捱到大学毕业，心想也许到了工作单位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谁知我又被派入叫喊阶级斗争、敌我斗争最起劲的解放军部队，每天陷于政治学习、开会斗争的泥潭中，要想调换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不成，要和初恋的对象成婚不成，千方百计想离开，谈何容易！无粮票、无户口、何处可去？最后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被送劳动教养，无任何法律手续，无任何申辩机会，一呆十五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就在饥饿、苦役、和无尽的精神压力下消逝殆尽。古语曰：祸从口出，可是在那个时代即使你噤口也不能免，只要有一点不同思想就是犯罪！如果没有后来的毛死邓上，一辈子就横尸在劳改坟场了。

我这一辈子从多少懂点事的年龄开始，一直处于精神紧张、政治压力沉重的生活环境下，没有欢笑、没有幽默，有的就是所谓阶级斗争的风暴与恐怖。以后进了劳改场所，整整十五年更是终日处于紧张、超负荷的重劳役下，再加被严管、被吊打的精神恐惧，虽最后在时代变迁的缝隙中侥幸跑了出来，但留给我的伤痛、病患早已无法恢复。今天我在美国生活，确有自由自在的轻松，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时总有得心应手、心满

意足的良好感觉，但入晚后又常常回到劳改队去被罚做那些繁重、危险的苦役，并领受警察队长们冷酷无情的面孔和训话……，白天、黑夜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我不是英雄，没有改天换地的伟大抱负，对于那些为了理想而不屈奋斗的人，我只有怀着虔诚的心由衷敬佩。我是芸芸众生的一员，奉行“老老实实在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做事”的哲学，潮流把我推向苦难的深渊，潮流又让我在缝隙中逃生，人生苦短，谨以以上记述作为自己生命的记录，也为历史留下真实的一角。

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花旗梦别神州泪

唐彼得 著

作者简介

唐彼得生于1938年。1955年高中毕业，被学校指定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为了躲避学院过分浓烈的政治、军事气氛，1957年侥幸转入上海交通大学，不料1960年毕业时仍被分配到部队工作。由于专业不对口要求调动工作，及不肯和有海外关系的女友断绝关系，他被部队视为异类。他试图通过调动、辞职、病退离开部队都不被批准。1964年他的老同学偷渡去香港未遂，牵连几十人被抓，他也被部队藉此整肃，被关禁闭、批斗，最后送农场劳教，解教后被强制就业，在采石场做苦役。1979年获平反，到海洋石油公司工作。然心有余悸，后几经周折，终于在1987年获得自费来美留学的机会，学成后留居美国。

黑色文库 第二十集 劳改基金会

A Bittersweet Life for an American Chinese
By Peter Tang

Black Series, Volume 20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7
www.laogai.org

ISBN 978-1-931550-16-1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25.00

